

新视界

NEW VISION

学术讲堂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 P1

学术论文

人权因素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 P17

国关人物

阎学通 P45

他山之石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 P55

迎新特辑

..... P77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编者的话

秋高气爽的日子，我们迎来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思虑万千；放眼未来，豪情万丈。70 年前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为中国重新赢得了世界大国的地位；70 年来的不懈奋斗，让中国重新屹立于世界之巅！无论是浴血抗战还是建设祖国，南开学子都秉持“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宗旨奋斗在第一线。毫无疑问，蒸蒸日上的中国不可限量，朝气蓬勃的南开学子大有可为。值此风云际会之时，我们国关学子更应该心怀祖国、放眼世界！那么，《新视界》就是你学习与成长的第一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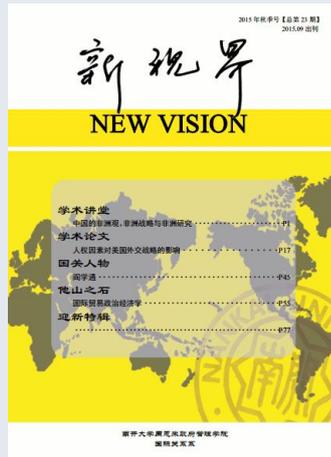
在这一期的《新视界》里，非洲研究泰斗刘鸿武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时事观察”带来了凌胜利老师对中美关系的深刻认知，“学术论文”分析了人权因素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国关人物”向我们展示了清华国关院长阎学通的卓然风姿……为了帮助“小鲜肉”们更好地融入国关学习中，我们还精心准备了“迎新特辑”等众多栏目。

新的学期，津南校区的入驻为南开大学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南开国关迎来了新一批学子，《新视界》也迎来了自己的第六个年头。这六年坚持的背后，是一届又一届国关师生对知识真理的不懈追求，是对服务同学的悉心奉献。我们感谢《新视界》所有工作人员的默默付出，也感谢老师同学们的参与和支持！为了适应现实发展的新要求，按照新章程的规划，《新视界》今后的主要业务都将在微信平台发布。届时，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关学子可以参与进来，您的点赞分享，我们都开心收下；您的质疑批评，我们会认真思考。《新视界》卧虎藏龙，《新视界》群英荟萃，我们也借此机会诚邀各位英豪的加入！我们相信，你的加入不仅会让《新视界》蒸蒸日上，也会让自己茁壮成长。让我们携手并肩，光耀百年南开；让我们扬帆起航，助力青青《新视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关学子，共勉！

刘志

2015 年 9 月



新视界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主办



2015年秋季号
【总第23期】
2015.09 出刊

主编：胡阳阳

本期执行主编：刘 志

副主编：赵姝婧 刘志（代）

副主任：

宁鹏举 李天翼 江昊宇

学术顾问：董柞壮 姜忆楠

编辑部成员：

杨 雪 刘 志 宋一宁

郭 超 赵天畅 马 刚

赵姝婧 胡阳阳 李安琪

李冰莹 李 漩 宁鹏举

裴 瑶 许译丹 江昊宇

李 萌 李天翼 丁敏潇

彭宁楠

实习生：

石悦人 周 扬 张路瑜

封面设计：刘 志

目录

编者的话..... (I)

学术讲堂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刘鸿武 (1)

时事观察

破除中美关系中“新冷战”的历史隐喻.....凌胜利 (17)

学术论文

人权因素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影响.....马垚粮 (19)

国关人物

阎学通..... (45)

他山之石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本杰明·J·科恩 (55)

海外南开人

乡村还是城市，不一样的美国生活.....谷天一 (70)

英采飞扬

《和平的幻想》评述.....刘志 (74)

均势外交简述.....张路瑜 (76)

目录

迎新特辑

- 我是爱南开的，我们是爱国政的..... (77)
-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81)
- 在南开..... (85)
-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87)

新书架 (三) (90)

院系活动

- 学术交流..... (93)
- 师生活动..... (95)
- 校外短讯..... (95)

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97)
-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99)
-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105)

读编往来..... (113)

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115)

征稿启事..... (121)

刊物简介

《新视界》(季刊)于2010年6月改版创刊,由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新视界》编辑部主办。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张睿壮教授语),在学院领导、教师的悉心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也得到院内外师生、校内外读者的关注与好评。

《新视界》编辑部下设学术组、宣传组、联络组和后勤组等部门,由不同专业、年级在校学生组成。编辑部成员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专注于做国际关系各年级的“连接器”,旨在以此为平台,活跃学术氛围、引导学术思辨、推动学术争鸣,为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者、学习者、关注者开启“新的视界”。

编辑部倡导“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师生来稿来函,为刊物发展提供宝贵意见和强劲动力。

通讯地址:

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38号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300350)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网址: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mewvision

注:未获本刊事先书面许可,任何媒体不得转载本刊原创内容。

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

【编者按】非洲大陆可能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块大陆，然而自 20 世纪 60 年代独立浪潮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非洲正在悄然发生巨变，其国际地位也不断上升。在这巨变过程中，中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的非洲观究竟有何特色？中国的非洲战略包含哪些内容？中国的非洲研究又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本期“学术讲堂”邀请了著名非洲研究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给南开学子带来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演讲。

主讲：刘鸿武

时间：2015 年 6 月 25 日

地点：南开大学范孙楼 116

主讲人简介：刘鸿武，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受聘担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非洲议程理事会理事、外交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理事，还兼任外交学院兼职教授、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导师、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09 年因在非洲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中非人民友好协会授予的“中非友好贡献奖”，当选“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

一、非洲研究正在成为一门显学

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与非洲研究。这三个问题可以依次地向前推进。吴院长刚才已经介绍了我们的学术团队——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院是 2007 年 9 月 1 日挂牌成立的，我本人是 1990 年第一次去非洲留学，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大学留学，回国以后在云南大学做非洲研究差不多 20 年左右，也培养了一些学生。2007 年受教育部和外交部的委托在浙江师范大学创立了非洲研究院。这几年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社会对这个学科的需求明显提升，但是我国的非洲研究还是比较滞后的。浙江的政策相对比较灵活，虽然浙江师范大学地处三线城市还是个师范大学，

但是当时的校领导还是很有这方面的意愿。因为 2000 年左右承接了对非的教育援助，学校在培训非洲的大学的校长的时候对我国的非洲研究有所了解，确实感觉国内做非洲研究的人很少。2007 年我就带了我的两位博士和一位硕士来到了浙江师范大学。我走之后，云南大学还留着一批我原来的学生，还有一个非洲研究中心。从 2008 年开始就开始大规模地招聘人才，到现在已经有一个 30 人的团队了，其中有一位南开世界史的博士。这是我十多年前在坦赞铁路做调研的资料，做非洲研究也 30 多年，也走了几十个国家。非洲是非常辽阔的，把非洲问题完全搞懂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要培养大批的年轻学者。这是在非洲的桑给巴尔岛上，当年郑和七下西洋有四次到过这个地方，这是六百

多年前的事情。“在这个岛上考古挖掘中国的瓷器可以一铲一铲地挖起来”，这是美国一个历史学家的原话。如此可见，六七百年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之大。近代西方的崛起也就是两三百年的事情，在那之前世界是另外一种图景。目前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一种新的历史状态当中去，所以说中非合作是一个重新回归历史传统但是开创新的世界的一个过程。

我们一直认为做国际问题研究不能从概念到概念，从论文到论文，因为它是一个确实生活当中问题。刚才薛书记讲得非常好，讲到我们南开的国际问题研究、经济学研究、APEC 的研究等，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中国现实生活当中的研究。观察中国现实发生的事情，去体验它感受它。我做非洲研究的一个感受就是：这块大陆对于中国来说太遥远了，所以研究者要对非洲有感性的认识。首先你情感上是要亲近这块大陆的，要对这块大陆上的自然山川、人文地理有一种欣赏的能力，你才能坚持下来。坚持下来就会发现这块大陆研究带来的快乐和视野的拓展是远远超出想象的。之前也见过一位中联部的部长助理曾在博茨瓦纳做过一任大使，他外交生涯主要是在欧美。他和我讲，在非洲做大使回来会怀念非洲，但是在欧美回来就回来了。所以我们以前做非洲有一句话就是：没有去过非洲怕非洲，去了非洲以后就喜欢非洲，离开非洲以后就怀念非洲。确实是因为这片大陆上几十个国家的老百姓保留了人类最本真、最具亲和力的本性。中国人本来就是比较看重人情关系的，所以中国人在非洲有一种被人善待、被人欣赏、被人尊重的感觉。去到非洲的感觉就是会变的简单起来，行走

于非洲是一种人生的快乐。当然你来研究这块大陆的发展问题，为这块大陆经济、政策做出当代中国学者的贡献，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做的工作。

这就是我在研究院建立的非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已经汇集了国内十几位捐赠者的一千多件展品。它们都是从遥远的非洲带回来的，非常珍贵，每一件展品都有自己背后的故事。非洲博物馆正在征集中非发展六十年的史料，包括修建坦赞铁路。这条铁路从 1971 年开始到 1976 年结束，最高峰的时候中国投入了五万人力在这个项目。当时我们没有大型设备，最大的推土机就是五吨重的，与欧美数十吨甚至上百吨的相比，我们的工具非常原始。用了 10 年的时间修建了这条铁路，1860 公里。很多北京铁道学院（现北京交通大学）的学生毕业了就去非洲三四年，修建完了这条史诗级的铁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时中国那么封闭，但是在那么遥远的地方修建了这样一条铁路，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现在中国在非洲已经今非昔比了，我们正帮助非洲大陆建设“三网一环”高速公路网、高速铁路网、区域的航空支线网。要把非洲大陆，3000 多万平方公里，54 个国家的首都连接起来，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这些工程都是和几十年前的坦赞铁路联系起来，是一个史诗般的过程。博物馆是小小的一个窗口，所以我们在建中非博物馆正在征集这方面的资料。这就是中国的故事，中国外交的故事，这需要年轻人去挖掘这些东西。

下面进入本次讲座的主题，今天的题目可以分为三个小问题。第一个就是怎么看非洲。中国人怎么看非洲，也就是中国人的非

洲观。中国人怎么看非洲其实涉及到中国人怎么看自己,因为你用不同的标准和观念,那么你对非洲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对非洲的理解下,中国要采取什么样的对非战略。你的观念不一样,你的战略也是不一样的。非洲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开展与非洲的合作。第三个就是你想要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需要能够支撑这些战略和思想的人才,所以要建立一个学科,要建立一个有中国思想气度的非洲学。

二、非洲发展现状:仍然落后但充满希望

今天我们说非洲这块大陆,有些时候是世界的边缘,有些时候是世界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焦点主要体现在未来,各种力量在非洲大陆上正在进行一场暗中角力。长远地看,这块大陆是世界现代化最后一块大陆,也许在未来三十年有很多方面可能会替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场,世界工业的成长地。中国也需要和非洲进行转移和对接,形成一个梯度地承接的关系,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把非洲带动起来。这就有一个国际间战略的一个博弈的关系在里面,所以非洲研究已经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发展模式竞争的一个场所,中国也是其中的一个竞争者。过去中国是不大有竞争的话语权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非洲的学者和精英现在越来越想了解西方以外的,宗主国以外的世界发展是怎么回事。这次非洲知识精英的觉醒,比起 19 世纪非洲在殖民之下,非洲精英寻求非洲国家独立的觉醒,更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因为非洲现在真正在思考未来非洲发展的道路,所以这个博弈的背后就是世界思想

的竞争和较量。给中国学者留下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非洲研究里确实包涵了当代中国的很多学科,民族自我创新,提炼自我话语体系的机会。

怎么看非洲,确实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件事情,主要是因为这块大陆实在是太大了。这是非洲的一张地图,目前非洲是 54 个国家,面积是 3020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的三倍大。我们把中国、欧洲、美国的面积加一起是 2900 万平方公里,非洲要比这三大块加起来都大。非洲有 10 亿人口,54 国都是发展中国家。我们把南非拉入金砖国家,它在非洲发展水平还是高的,但是体量还是很小。这块大陆发展还是非常滞后的,到去年为止,整个非洲 54 个国家制造业只占全球制造业的 2.5%。如果把南非和北非的几个国家拿掉的话,撒哈拉以南“黑非洲”45 个国家只占全球制造业的 0.7%。0.7% 只相当于我国中西部一个省份,像浙江、江苏、山东这些省份的制造业都是非洲几十个国家的十几倍。我国是世界工业制造业第一大国大概占 22% 左右,再过几年也许会适当提升,恢复到中国三百年前的一个体量。所以非洲是一块有待发展的大陆。

为什么在过去一两百年,特别是独立六十多年来这片大陆没有发展呢?这是一个很大的现实问题也是个学术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过去几十年,得出的结论是很多的,西方围绕着非洲问题形成了很多的学科。就人文社科而言,很多学科是与非洲相关的,比如 20 世纪兴起的人类学、社会学、人种制和各种各样兴起的所谓的传播理论,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后殖民主义、理性主义等,好多都与非洲有关系的。很多西方学

者在提出原创性的理论的时候，都会以非洲作为自己最初材料的来源，例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最初就是做乍得这个国家的，他研究多年以后发现不把非洲放在世界体系里是研究是不行的。还有像马利诺夫斯基现代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他也是通过非洲建构他的理论的。

那么谈到非洲的发展理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争论，这本《援助的死亡》的作者是一位赞比亚的经济学家。她在初中以后就去美国读书，在美国接受了完整的教育，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在世界银行、高盛集团工作很多年，在这些大的金融组织里做对非援助的。后来她就发现非洲在二战以后，特别是6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援助的对象。在过去六十年里，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各种多边和双边的形式一共向非洲提供了6000亿到10000亿美元的援助。但是这么巨大的援助，并没有让这块大陆发展起来，相反还留下许多的问题。她就完成了这样一本书——《援助的死亡》^①。她有三层意思：援助使得非洲走向“死亡”，这样的援助让非洲永远也不能发展起来，另外援助本身也走向了死胡同。我们把它翻译成了中文。边上的这一本《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②，是我和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的一位老师和一批学者完成的，主要是谈中国的对非和包括东南亚援助的问题。在过去30年里，中国对非的援助也在推进，现在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包括老百姓也在议论这样的事情，批评的

声音也有——中国目前也很落后，为什么要援助非洲，我们援助非洲是不是很多？所以这本书是回答这样问题的。总的来看，在非洲人看来中国过去30年，从坦赞铁路开始，我们的援助和西方的援助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援助是捐赠式的援助是自我标榜很高的是人道主义援助，是不求回报的，就是我很发达你很落后，我无偿的给你，是高高的捐赠者。但是会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要你搞政治体制改革，要多党选举；要搞经济体制改革，要搞市场化；要小政府等。但是这些要求都没有产生良好的疗效，还使得西方国家背上了沉重的援助负担。中国的援助是不一样的，我们把援助和发展结合起来，不是简单的施舍。我们要走合作的道路，坦赞铁路是中非之间一种合作的项目。我们现在谈合作比较多，现在也有援助，但是援助推动非洲发展能力的提升，后来我们把援助和中非经贸关系联系起来。商务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每增加一个单位额度的援助，都能带动中非之间六个单位额度的贸易增长。所以大家就发现从2000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后，仅仅八年时间中非贸易额就从100亿增加到1000亿，2014年就突破了2100亿。14年时间，中非贸易额就从100亿增加到2100亿，现在中国企业在非洲遍地开花。我们的援助就起到了推动中非之间贸易的作用，也带来了非洲自主能力的提升，这就是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模式，而且中国也不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者，而是合作者，这是我们提出的不同的理念。

那么中国为什么提出我们跟非洲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呢？这就牵扯到我们对非洲的看法，实际上非常简单，比如说现在中国

^① [赞比亚] 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编辑注）

^② 刘鸿武、黄海波等：《中国的对外援助与国际责任的战略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编辑注）

逐渐发展起来了,但是你们想想,过去几十年西方也是看不起中国的,觉得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是不是啊?东方国家只能走西方的道路,所以有西方很多很多的预言家一次一次的预言中国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这三十年来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就发展起来了。主要是确实中国国家很大,我们可能是保持自己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独立自主地去探索自己发展的道路可能是有条件的。中国毕竟是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国家很大,所以能够找到自己发展道路,但是非洲比较困难,更何况在过去两三百年西方已经给世界塑造了非洲的形象,而非洲本身也是四分五裂,所以它的自我认知也是有问题的。可以说西方的非洲观就成了世界的非洲观,最终也变成了非洲人的非洲观,非洲人看自己是什么,也是用西方的观点来看,那么你看西方人看非洲,其实这个表现了近代以来西方对世界的总体看法。我们把这个套过来,套到东方来看,套到其它地方,套在阿拉伯世界,大体上也是这样的。当然西方对中国人的看法有所不一样,黑格尔讲到历史的时候,他说中国是有历史的,非洲没有历史。但是后来他说,中国历史终结了,近代以后历史转移到了西方,转移到了德国,所以东方是成了过去的东西,非洲从来就没有过历史,不像中国,中国还有历史,但现在没有了。所以他说,非洲只有黑暗没有理性,是一个黑暗的大陆,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殖民主义观点。既然是这样没有历史、没有理性的一块大陆,那么它就不可能独立地来实现自身的发展,因为它必须依附于外部的东西。所以它要走向现代文明,就要移植西方的制度。二战结束以来,政治上获得

独立的非洲国家,其实经济上并没有真正获得独立。西方在提供援助的时候给非洲设置了一个没有办法冲破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高墙,以至于非洲几乎不可能形成独立自主的国家观念。有好多非洲人到中国来和我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感觉今天非洲最大的问题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知识精英和思想者,能够带领这块大陆去走一条自己的道路,因为它确实太分裂了,这几十个国家都太小,很难产生真正的自己的这种民族独立的观念和意识。由于这些种种原因吧,当然还有很多冷战时期的大国角力等,所以非洲过去几十年是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三、中国的非洲观:平等相待与相互借鉴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下就是中国怎么看非洲。我们要谈这块大陆,过去长期不能够发展起来,可以寻找很多原因,但是以中国的角度来看,结合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大概这样几条我觉得在非洲是比较突出的,而这几条也可能就是中国我们解决的比较好的,这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第一个就是国家认同的缺失,也可以说是文化认同历史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知道,西方最早走向民族国家,走出了中世纪,由所谓的上帝的普罗的世界,近代王朝国家,经过两三百年王朝国家的发展,又通过几次战争,西方分裂成二十几个主权国家。国家主权是近代以来西方孜孜以求的,所以打了很多的边界战争。但是非洲独立以后西方却给它灌输了一种不要国家的观念,这个是害了非洲的,它本来在前殖民地时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它的国家都是在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而这个殖民地是西方给它人为

划分的，划分以后等它独立了，它又不可能改变殖民地的边界。如果改变殖民地的边界就不断发生战争，所以这些非洲国家独立以后不得不接受这块殖民地的遗产。

我们来看这五十几个国家，这些边界划分都没有考虑非洲原来的历史文化形态。非洲历史是有些古代国家的，但是这些古代国家都衰落了、瓦解了、毁灭掉了。后来西方来以后就随意划分成这五十几个殖民地，这殖民地后来变成了五十几个国家。既然变成了国家。那么独立以后，首先就应该建设自己的国家形成国家的观念、国家的意识、国家的文化、国家的制度，你要实现国内一体化的进程，必须要有很有力的政府来实现国家建构进程。我们知道，中国这个国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就已经形成华夏文明，后来到了秦朝统一六国，有了郡县制中央集权，两千多年一以贯之，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无论谁执政，朝代可以更换，政党可以轮替，但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这三十年中国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是所有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发展的资源不是投资不是技术，而是国家制度资源、国家历史文化资源。这是中国很强大的地方，但非洲缺少这个东西，这样就造成很多问题，国家认同的缺失。西方冷战结束更加推动它的所谓多党制度，所谓讲民主讲人权，就是不讲国家。所以非洲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服务社会是最高使命。那你想如果全社会知识分子都以国家为自己最高使命的话，这个国家迸发出来

的力量多么巨大，可以一代代地延续下去，所以不怕短暂危机局面，能够渡过这个局面重新复兴的。但是这个国家如果本身是一个国家但是不是经济的国家，充其量是地图上的国家，在联合国上可能是有它的一票但不是有机的实体，它国家内部的民族部族宗教文化各个群体之间缺乏认同感和一体化进程。本来这个过程应该在独立以后经过两三代人实现，但是没有往这个方向走，西方给他们制定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竞争性多元化的制度。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撕裂了这个国家，所以它搞多党制后部族矛盾、宗教矛盾、区域差异就凸显出来。到四分五裂的非洲去你会看到，虽然是一个国家，但只有你在首都还是一个国家的存在；离开了首都，走出去几十公里就看不到政府了，更不要说你到边疆地方去。但是你们知道中国，我们学历史的有一句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小时候我在云南边疆地区长大，那么边远的地区，明清时候改土归流，全都是流官，在中国走到哪里都找到当官的人，找到一个管事的人，我们到哪里找地方政府是没有问题的，农村里面都有，城市里面还有居委会，从头到尾全都管起来，这是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制度。这种制度有一些问题，但是对后发展国家是至关重要的，非洲就缺少这些东西，所以国家认同一定要解决问题。当然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所以它就是压在一起，全球化又要有区域一体化又要有国家化，而国家化、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又是矛盾的，这对非洲国家来讲就很困难了。它这里面包含的政治学的问题，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都没办法解释非洲现实发展问题。

第二个就是产生下面几个顺带出来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是连在一起的——弱势国家低能政府,然后就是外部干预和主权瓦解。

第三就是自主发展理念的缺失。非洲人的依附观念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这也不能完全怪非洲,一是国家小,很难独立自主;二是过去几百年西方的殖民统治造成非洲的文化都是西化的。非洲人是所谓的“香蕉人”——黑皮肤、白色的心理世界。这个是比中国更加严重,非洲的知识精英比中国人可是西化多了。我 90 年代在非洲留学的时候,它们的大学教授全是剑桥牛津留学回来的教授博士。但是又怎么样呢,他们就重复从西方学回来的东西,他们也不研究自己本土的问题。非洲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现代化程度比我们高得多,他们的英语法语比我们说得好,国际会议交流上我们都说不过他们,但是他就不研究当下的问题。所以非洲至今自身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关注自身本土文化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研究非洲的问题我有一些想法,我也和吴院长交流过:我们搞国际问题研究,一定要懂中国、懂世界。我们经常讲内懂国情、外懂世界,才能够看得清非洲问题是什么样的。我顺带比较中国,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国几十个省,非洲是几十个国家,那么你想想这么大的国家怎么聚合起来的呢,这个一定要去研究,所以我们搞国际问题研究有两个问题绕不开的。第一个,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为什么没有中断?第二个,这个国家这么巨大,它为什么没有分裂?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是汉族,有 12 亿人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大的民族?尼日利亚有几百个民族,非洲据说有

两千多个民族,为什么分裂成了那么多民族,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现实的问题。

说了非洲那么多比较消极的方面,那这么说中国跟非洲就没有合作了?不是的,实际上刚才谈的是一些大的问题,但是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是两方面的。前面说过,中国人的历史智慧就是看似变动不居的世界当中、混乱不居的世界当中看出不变的东西。天地之下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在里边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这是做历史研究一个很大的智慧,也是中国看国际问题的智慧。天下变来变去但是你能够把得住大的趋势,不变的东西是什么,中国把它称作天下之道。首先,过去几十年非洲依然按照自己独特方式逐渐向前发展,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其次,你要从不变的世界当中看出变化之所在,很多人看不到非洲的变化,以为非洲永远都是混乱的、动荡的。其实不是,你要是有一个更加全面的眼光,你会发现非洲在过去几十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概括起来讲有很多,但从未来非洲发展角度看,我认为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虽然过去非洲独立以来有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认为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的获得是非洲在过去 60 年来最大的成就。虽然非洲有那么战乱和冲突,但是我们看看二战以后的世界,全世界很多国家都瓦解或解体了,可非洲没有发生过这样的解体。苏联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了,亚洲也有很多国家分裂了,更不要说近代以来西方很多国家,那些老大的帝国全都分裂了。非洲国家有大规模战乱,但你们看看独立六十年来,这块大陆保持了国家的持续存在,这就是很大的成就——除了

1994年厄立特里亚从埃塞分裂出来，2012年南苏丹分裂出来，只有这两个国家，其它国家坚持了下来。1960年独立开始到现在已经有60年，如果是1960出生的孩子，当他出生的时候这个国家产生了，不会有国家的观念；到现在他的孙子出生的时候，这个时候在非洲有些国家的观念、国家的认同感产生了，这就是非洲很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我们去非洲，我们发现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在非洲有些国家他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国家观念和国家认同感。一些非洲的知识精英已经开始来寻求自己国家发展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的建构进程取得很大成效，政府的行动能力成长起来。

现在我们看非洲有几个国家特别值得关注，有时我们开玩笑跟法国人讲。法国人是特别关心非洲的，跟英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当年治理非洲是把它看作殖民地，间接统治，因为英国人少，当时全世界的殖民地相当于一百多倍日不落帝国，所以它派不出那么多官员去殖民统治非洲人，而且殖民地官员太多了回去以后退休工资很高，养不起这些殖民官员就搞间接统治，就是不想改变非洲文化。法国人不一样，法国人是雄心勃勃地想要改造非洲人。法国管非洲不叫殖民地，叫法国的海外省。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他就是法国国会议员，据说法语讲的比老巴黎还要地道。他为什么要讲巴黎地道的口语？因为他一定把自己变得非常非常法兰西化。他到法国去，人家把他看成地地道道的法国人。但就是这些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独立以后发展是最困难的，直到现在动荡也是最多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法国人一直想把

非洲变成真正的法国海外省殖民地，但是要做到这点非常困难。现在很多非洲的法语国家已经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开始寻求自己国家发展独特道路。

现在非洲有几个国家既不是法国的模式，也不是原来英国的模式，有点像中国的模式，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卢旺达、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这几个国家是怎么独立的呢？它不像法国的殖民地，法国的殖民地是和平的，我给你建一个制宪议会，给你制定宪法，然后法国人走了，像桑戈尔当了总统，这些国家独立以后，基本上都是弱势政府，全盘照搬法国人一套。而其他几个国家不一样，刚提到的这几个国家都是像中国一样，通过武装斗争来夺取政权；内战结束后，原来的革命党就转变为执政党，所以它是强势的政府。比如说埃塞俄比亚梅莱斯·泽纳维推翻了门格斯图政府后掌握了政权，掌握政权后用军队和原来的执政党转变为国家的机器，所以就形成了强势的政府。埃塞俄比亚资源非常贫乏，原来是非洲最穷的国家，但是从80年代以来它在梅莱斯的领导下，经过20几年的发展，特别是最近十几年和中国加强大规模的合作关系，现在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发展最快最有希望的国家。而且它是大规模移植中国这一套发展模式，埃革阵^①中央委员政治局以上的官员全是在中国接受过学习的，安哥拉、莫桑比克、卢旺达也是一样。你们都知道卢旺达大屠杀，它结束以后，现在这个总统卡加梅率领他的部队打回去，他的部队是

^① 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The Ethiopian People's Revolutionary Democratic Front): 简称埃革阵，是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的执政党。（编辑注）

在坦桑尼亚和肯尼亚边境上由中国人培训的，东非这几个国家领导人都受过中国人培训的，顺着游击队打回了卢旺达掌握了政权。仅仅用了 20 年不到，现在卢旺达已经是非洲发展最快的国家，非洲最有希望的国家。所以像卡加梅、穆塞韦尼、梅莱斯和他的继承者等人就觉得只有这样的强势政府把国家聚合起来才能解决国家发展问题，他们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推行民族的融合，因为民族融合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后来又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形成统一的、主导的意识形态非常重要，是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必备条件。我们都知道，所有的民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是有些民族产生之后，它们的文化是比较强有力的，然后它用这种文化将整个民族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国家，并支撑这个国家的发展，而有些民族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族跟文化的两者的同构最终形成一种现代国家式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基本的一个前提。在这一点上，应该说中国本身是非常有优势的。现在非洲经过几个阶段，有些国家已经往这个方向发展。这样就使得非洲在未来的 30 年，有可能进入到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的阶段，这是我们谈的一个非洲成长的四大步伐。

那么为什么非洲在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呢，其实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能够去解释它，但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肯定是，全球发展体系结构的这种转移给非洲带来的机会。我们知道六七十年代曾经有亚洲的四小龙，但是它太小，成长不起来。80 年代的东亚开始升起了，但是那个时候中国主要是解决自身的问题。那么进入到 90 年代，

特别是 2000 年以后，中国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发展呈现一种新的世界现象。我们知道这些金砖国家都有一个很突出的、跟当年的西方国家不一样的特点——体量大。这种体量巨大的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时，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市场、资本、劳动力。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向后工业化时代过渡了，它们依靠科技、金融、信息等产业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这些东西带动不了非洲的发展，所以，当年西方国家觉得非洲是不可能发展的，它们也不可能拉动非洲的发展，所以就是援助它。而今天的中国刚好相反，像中国这些国家的发展确实需要非洲，因为中国等国体量巨大，工业化程度也很低，市场需求很大，比如说石化材料、矿产、森林、木材等。

当年西方国家发展的时候，曾经部分带动了非洲的发展，但是基本上对非洲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今天不一样，金砖国家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就给非洲这片大陆带来了一种机会。我们看金砖五国和西方七国集团经济体量的变化，非常明显。2010 年，我们只占到西方七国集团的一半不到，中国占到了 70% 左右，南非实际上很小加入进来的。但是到 2020 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预计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会超过西方七国集团，这个还可能会提前。那么到 2030 年，就是 15 年以后，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所占比重就是 84 万亿美元。现在中国是 10 万亿美元，非洲 54 个国家是 2 万亿美元经济总量，美国现在大概是 16 万亿。统计数字有所不同，一般的像中国现在 10 万亿，日本是 6 万亿左右，现在肯定达到 11 万亿了今年，美国是 16 万亿。但是

如果按照平价购买力法，他们现在认为中国和美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那么我们看再过 15 年，金砖国家会达到一个很高的 84 万亿，那个时候中国大概会达到 30 万亿左右，超过美国的经济总量。实际上金砖五国以外，现在还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这全部加在一起在未来的若干年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块头。这些国家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它们对于非洲这块大陆的需求是根本性的。现在中国实现经济未来 30 年发展的 35 种战略性资源，支撑未来再继续发展的 6%-7% 的发展，如果再维持 10-20 年的话，这 35 种战略资源，有 25 种我们是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通过外国获取。那么外国获取呢，当然有些像西方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一些拉美，非洲是很大一块，而且非洲有些资源是其他地方没有的，所以他就会形成一种拉动的结构性关系。我们这里有一个按照这个所谓的平价购买力方法来计算，中国的 GDP 总量到 2020 年就超过了美国了。那么在后面的有印度、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以及南非等新兴国家。那么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出来，到 2050 年左右，七国集团实际上都已经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除了美国以外，一大批国家已经走到了前列。这就是一个大的世界的趋势，而这个趋势的形成，中国在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四、中国的非洲战略：共同发展与相互支持

中国现在又通过“一带一路”这样一种更加宏观的大战略，把所有全球变化、全球发展统在一起，就是把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国际的发展统在一起。所以，“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是和未来全球大的布局是相吻合的，

我们现在有成熟的非洲战略，还有一些其他的战略，可以统合在一起。现在中国就在寻找这样的战略，“一带一路”可能是一个过渡性的战略，但现在找来找去，这个可能是比较好的，能够统筹起来，就是国内和国际统筹起来的，整个欧亚非统起来的一个战略。那么，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战略的影响范围是很广阔的，这就给非洲带来了机会。在这方面，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是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出，中非合作升级版，非洲也搞了一个“2063 计划”。非洲统一组织是 1963 年建立的，那么到 2063 年是非洲 100 年。我们是有一个“2049 战略”，我们知道中国是那个时候建国 100 年。大概是到了这个世纪的 40 到 50、60 年代的时候，中国、非洲和这些亚非国家，毫无疑问真正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增长的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要大规模介入这块大陆的发展进程，因为他现在刚刚起来，现在的非洲特别像中国的 80 年代初，大规模的建设正在铺开。这个时候中国又存在着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迫切的需求——我们这种粗放式的结构已经经过 30 年的高速发展了，现在必须要进行结构上调整。结构调整要通过科技的进步，但是重要的方案要和非洲的方案结合起来，让中国产能转移对接到非洲去。中国向更高端走，腾出来位置让非洲填补进来。非洲来补位，他补的是中国的位，中国的机车到非洲去了，中国的标准到非洲去了，中国的文化到非洲去了。未来 30 年的发展就和中国未来的发展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这就从根本上会改变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现在看上去，中美关系是中国的核心，大国较量就是中美在较量。实

实际上从长远来看,决定中美未来力量格局的不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而可能是像“一带一路”、非洲这样的地方最终会决定中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西方是看的很清楚的,不是所有西方都看的很清楚,大部分的西方学者还是忽视非洲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非洲、“一带一路”正在布一个更大的局。这个局是着眼在 20、30 年以后中国的全球地位的。

这样一种局的最大特点是,带动非洲大陆和中国的共同发展。这是当年西方没有做到的,那中国能做到这一点么?如果中国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中国几千年的所谓的天下志向、大同理念就在这一代人当中得到实现了。这也是中国未来确保自己的国际地位,获得强大软实力之所在。因为未来中国的安全,是不能像西方一样依靠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的。美国这样强大的,一个国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五十,都不能保护中国自己。中国未来保护自己利益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世界和中国共同发展,把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捆绑在一起,这就是中国超越西方国家的所在,这也是中国智慧的所在。我们中国是有这个传统的,中华民族的“天下”观念、大同理念,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非洲是中国可以着力去经营的一块大陆。你看现在的“一带一路”战略,连接过去、进入非洲,下一步就是中国的泛亚铁路、欧亚大铁路,最后要把非洲连接起来。这是我们给非洲搞得这么巨大的工程,你们以前学历史学到,西方人搞一个什么“双 C”,法国人又搞一个、英国人又搞一个,后来都垮掉了。你看我们现在把整个非洲大陆连接起来,你们可以设想一下,这块

大陆再过二三十年发展起来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现在已经是大规模的铺开了,东西南北都在做。比如,我们正在修的蒙内铁路,从蒙巴萨到内罗毕的铁路。肯尼亚是英国的殖民地,可是一百多年来肯尼亚没有铺过一块木材,修过一米铁路,停了一百年了。现在中国给他修了蒙内铁路,把蒙巴萨和东非连接起来。这个还只是一个很初步的铁路,公路还有航空织线网。当然我们现在还帮助非洲搞电子商务,因为非洲他可以高起点先走啊。现在非洲达尔富尔的小孩,中国华人进去以后,达尔富尔那些农民放羊都是用手机放羊。现在用手机控制这个羊群,这就是一个跨越式的现代化进程。华为中兴等公司在非洲是不得了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非洲可以在某些方面是跨越式的发展的,这些就是中国看非洲发展的一些前景吧。这些都值得我们用心去观察。

我们这几年做了一些研究,就谈谈中非发展合作,这些理念、这种相关的一些成果。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些数字,实际上这块大陆在过去十几年年已经开始增长了,这是很多人都不太了解的。我这里是 06 年开始的,实际上我们从 2000 年开始拉一个数字下来,在过去 15 年当中,这块大陆已经保持了十几年 5%-6% 的增长速度。2014 年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 25 个国家,前 25 个有 14 个是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像埃塞俄比亚已经连续保持了五六年 10% 的增长速度。有些国家增长的更快,这是 2012 年的一个数字。你看像什么塞拉利、尼日尔、科特迪瓦,这些都是 6% 以上的国家,连续几年都是这样。利比亚是个例外,因为刚刚打过仗嘛。这些国家的增长是非常快的,虽

然说现在起点很低，整个非洲加在一起 GDP 只有 2 万亿，南非是 4000 亿美金。浙江省去年是 6000 多亿美金，人均 GDP10000 美金。我们人均还是很少的，体量是比较大的。现在非洲体量很小，所以增长很快，按照这个速度，非洲未来 30 年肯定是一个持续增长，不会是所有国家都增长，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趋势。而且现在有个特点就是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确实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而且是来自于非洲内部，他自身内部成长起来，所以我们说现在非洲出现自己的金砖国家，比如说我们这里列了好几个，尼日利亚、安哥拉等都是中国要做的支撑国家，推动它们的整体发展。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中非命运共同体。这张照片是 2010 年的时候，我们去南非访问，当时是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10 周年，我们开了一个研讨会。习近平副主席他去南非访问去开普敦看了一下，他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晚上在使馆接见了我们，就谈到了中国的非洲研究。当时我记得出来以后，我们好几个学者就说这个习近平啊日理万机，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还这么了解，他也谈到中国的非洲研究要加强的事情。所以就是当时陪他一起去的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陈元，晚上在一起吃饭。他就跟陈元讲，你们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搞了很多开发项目是相当成功的，你们以后能不能把开行到非洲去做开发。第二呢，你们拿点钱来支持一下中国的非洲研究。回来以后国家开发银行就果然大规模地推动中国企业到非洲的开发合作。我们现在跟国家开发银行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就是现在非洲国家一个

一个国家找中国，让我们给他做国家的发展规划。中国不是有“十二五”规划么，现在正在做“十三五”规划了。非洲国家觉得这个非常好啊，所以好多国家就找上门来。我们国内哪有学者给他搞这样的规划啊，所以到这个时候国家开发银行就着急了，说我们过去为什么高校里面不好好培养这样的人才呢，现在非洲真的是短缺啊。五十多个国家，几千家企业走进去了，到处都是中国的海外利益、国家利益，但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所以现在我国国家领导人要到非洲去访问，要找一本像样的这个国家的、真正一流的书都找不到，所以知识的这种短缺不足以支撑今天中国的全球战略、这种布局，已经成为一个棘手的事情。所以国家对这个非洲研究也是高度的重视，所以他才会出席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演讲。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归纳一下就是，中国和非洲正在形成一种互为机遇的一种共同体，这确实是不是我们的政治口号，是一个客观的现实。首先我们说，中国可能是非洲的一个机会。非洲经常这样认为，金砖国家是这块大陆未来实现发展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这一次都不能够抓住中国这条起飞的这条龙的尾巴，那非洲就没有希望了。因为中国等金砖国家的发展会带动非洲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能是非洲实现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

总而言之，非洲是中国的机会；同时，中国也是非洲的机会。非洲为什么说是中国的机会呢，主要有两点。第一，非洲是中国改变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支点。大家知道中国重返联合国非洲起了很大作用，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这一点可以说是很有道理的；而且这个基础是战略性的基

础，它不是一时的，而是长远的。第二，非洲是中国改变自身国家形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过去几年西方国家一直给中国塑造一种形象——中国是集权国家、共产国家、造反国家。但是现在变了——美国是革命者，而中国是建设者，这个形象发生了翻转。现在非洲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革命靠美国，建设靠中国。因为美国在非洲是处处搞革命的，推翻这个或那个国家；中国是搞建设的，中国经常说你们不要打了，一起来搞建设吧，不要管这个“主义”或那个“主义”，这一点是和美国相反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好的，因为中国一定要改变自己是国际秩序的造反者这样一个形象，也需要改变自身是国际秩序的受害者这样的心态，抱着建设的积极态度去营造非洲。刚才讲到中国是非洲的机会，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是非洲摆脱西方支配的宿命的一个机会。当然，以前非洲很难摆脱，因为它和西方靠的太近，深受影响；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它有更多的选择了，目前各方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第二，中国是非洲发展路径的另外一种选择，或者说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使得非洲多了一种选择，不一定说一定是走中国的道路。第三，中国是提升非洲全球地位的一个拉绳。三十多年前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现在中国建立了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提升了非洲的国际地位。这个论坛建立以来，非洲的发展非常迅速，所以过去十年“忘记”非洲的西方国家赶紧“重返”非洲，它们现在也模仿中国搞各种各样的论坛，包括美国都开始搞，所以说非洲的地位开始提升了一——中国开始把它捧起来，西方也更加重视它，这提高了非洲在国际上的要价。这种形势对

非洲是有利的，当然对中国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印度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第四，中国是非洲重获自信心的一个平台，很多非洲学者来中国调研时这样说道，三十年前很多非洲国家比中国更好。比如说“钻石之国”博茨瓦纳，它只有两百多万的人口，它的人均收入在三十多年前已经达到了数千美元，此外在 80 年代好多非洲国家比中国富有。可是三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亚洲国家发展起来了，而非洲的发展依旧缓慢。这说明非洲不是不能发展，而是没有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如果有一个好的国家，好的政府，好的政策，非洲也是能够发展起来的。这样，它们就会寻求发展的新道路。

好了，再次回到中国的非洲战略这一话题。这些资料大家可以随便看一下，这是尼罗河，我们以前从苏丹进口石油，现在南苏丹独立了，怎么办呢，它们就跟我们搞农业合作。它有 4000 万人口，13 亿亩可耕地，作为对比，中国有 13 亿人口却只有 18 亿亩耕地。刚果金一国有 7000 万人口，只相当于中国的 5%，但是它也有 18 亿亩耕地。现在全世界未经开垦的耕地 60%集中在非洲，这个数目是非常巨大的，也意味着中非农业合作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比如，尼罗河的土壤是黑土地，同中国东北的是一样的，非常肥沃。以前这一地区的农业非常落后，现在我们正在帮助他们进行土地开发。同时，非洲的人文资源也非常丰富。

谈到中国的非洲战略，以下几个概念是需要讲一讲的，一个是 1974 年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的时候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说我们中国和非洲都是第三世界。卡翁达回去之后写了一篇文章回应毛泽东

这句话，他说赞比亚和中国是全天候的朋友。2009年的时候，卡翁达到北京来领奖，我当时当选了“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卡翁达是“感动中国的五位非洲人”，那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汶川地震的时候，他还去使馆捐了2000美元。其实，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的，1995年我去南非的时候，见到了曼德拉的一个助理。他跟我说当时曼德拉在被关押的27年中，他说每年的10月1日的时候，那里的犯人需要“放风”（参见电影《红岩》，那里关押的共产党人就经常放风）。非国大被宣布非法数十年，曼德拉被关在狱中27年，每年10月1日都需要用非洲的方式来放风——这是非洲人节日的庆祝方式。他说为什么放风，因为这是中国的国庆日。非国大是将中国看作是未来非洲的一个希望，因为我们当时一直支持非国大的斗争。2003年我去赞比亚做访问学者，在坦桑尼亚做过逗留。当时坦桑尼亚的副总理萨利姆和我们一起开会，他曾经做过非统的秘书长。当时在会上他就讲，你知道吗，当时我22岁就到中国做大使，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你们毛主席递交国书的。我们说不可能，怎么可能在天安门递交国书？他说是的，你们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晚上9点钟的时候我才找到一个机会，把国书递给他，然后11点钟你们的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我。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有70多票支持，其中三分之一是来自非洲国家的。当时联合国大会宣布新中国获得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那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就站起来跳舞了，特别是那些个年轻的外交官，跳着跳着就到了时任外交部长黄华的后面。这个镜头

我们现在都还能看得到，萨利姆说你们知道吗，跳舞跳得最好的那个人就是我。后来他做了坦桑尼亚的外长、又做了坦桑尼亚驻美国的大使、非统组织的秘书长，总之做了好多年的外交工作。到了1980年左右的时候，联合国要选举一个秘书长，按照惯例秘书长来自某一个大洲是可以连续两次的。当时美国推了一个是奥地利人瓦尔德海姆，中国则坚决反对，我们坚持要推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推举的就是萨利姆。为什么美国反对萨利姆，因为他和我们的关系很好。后来他回忆说，中国重返联合国我是做了工作的，美国因此嫉恨于我，说我不可靠，绝对不能做联合国的秘书长。当时中国推萨利姆推了16次，美国就否决了16次。美国推瓦尔德海姆推了16次，中国就否决了16次。最后，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难产，双方达成妥协，推举了智利人德奎利亚尔。他就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当时就被吸引了，可见当时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有一年江泽民主席出访马里的时候，马里科纳雷总统突然走过来说欢迎仪式撤消了，也不要去总统府了，到我家里去。当时外交部的官员也不好说，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到了总统家里坐了下来。这张照片呢是周总理出访非洲三个月，其中一站是马里，这是当地的一个孩子给他献花的场景，当时的总统叫做特拉奥雷。马里科纳雷总统说当年给周总理献花的小孩就是我。江泽民一听，非常激动，无条件地信任这个国家。总之，中国对非洲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平等相待、以诚相待。所以现在中央提出来中非关系需要“增实增诚”，就是中非关系中提炼出来的一些东西。发展中国家需要穷帮穷，互相帮助，加强合作。

也就是说中国不一样的非洲观形成了不一样的非洲战略,中国的非洲战略也成为了中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

五、中国的非洲研究：融会贯通 与开拓创新

最后再讲讲中国的非洲研究。随着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部问题也会越来越多。一方面,我们还需要继续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更多地研究发展中国家,并且需要将两者连通起来,贯通起来。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起到这样一种中介、桥梁的作用。那么,非洲研究这个学科也是一样的。非洲研究应当如何做,我觉得我们仍然需要做以下几个事情:一是要了解、借鉴和汲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非洲研究的基本成果,要做大量翻译的工作、研究的工作、调研和考察的工作。非洲学是一个巨大的学科,西方很多一流的大学和机构都有着很强的非洲研究能力,而中国的非洲研究和西方的差距可真的不是一点半点。要是我们按照他们的方法,那么很可能几十年都难以赶上,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几十年、上百年研究的积累,对非洲各个方面都研究得非常全面了。所以我们到西方国家去可以发现,西方的非洲研究非常详细,连很小的部落都有翔实的研究。西方的非洲研究既是一个财富也是一个负担,高悬在我们头上,因为现在你是真的难以企及。我们需要去了解、借鉴和汲取,但是也不能仅仅这样做,否则你永远走在他们的后边。

那么怎样超越西方的非洲研究呢?我想还是需要回到中国传统的学术道路上去,围绕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来做非洲研究。围

绕中非发展的现实问题,结合过去六十年的中非关系来研究当下的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与西方不同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它有三个源头。第一个源头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知识成果,但是不能照搬,需要消化和选择。第二个就是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的源头上来,利用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资源进行研究。中国这方面是有悠久的传统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中国就有研究境内的少数民族以及周边国家的传统,积累了中央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资源,这方面中国是有自己的传统的,可以进行挖掘。第三点是利用当代中非合作的实践,这一点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因为现在中国在非洲有数千家企业,新中国同非洲国家也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当然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们能够平等的来观察非洲。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比如说推动中非智库论坛的建立,形成了中国—非洲智库合作伙伴的计划,所以我们非洲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能够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因为西方比我们先行了很多步。我们怎样赶上和超过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非洲研究对中国学术创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美国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西方人自己比我们了解的多,而且他们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已经是非常完备的了。非洲则刚刚相反,因为非洲的学术研究是非常落后的,而现在非洲处于快速发展当中,这样就给了中国一个机会。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非洲可能是唯一一块中国影响力可能超过美国的大

陆。中国在其他大陆的影响力很难超越美国，但是在非洲更有可能。中非合作中因为双方的实力差距，中国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推动中非合作的。这同时意味着中国学者可以更好地进行观察和解释中非合作以及非洲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发展的各个方面，并提炼出一套新的理论来解释非洲的发展问题。我想，通过这样一个学术边疆的开发，对中国未来学术体系的构建是非常有利的。综上所述，谈到中国的非洲研究，我想有三点需要融会贯通：秉承中国学术研究传统、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的实践。我们非洲研究院现在老师进来的原则呢，有以下几个：首先是确定研究领域，第二是定地域，第三是定国别，最后是定问题。领域是指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地域则分为东非、西非、中非、南部非洲等，国别往往是两到三个，最后是定一个具体的问题。定完题目之后，将他排到非洲去做调研，最后将文章写出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带动非洲的研究。我们有一些设想：一个是建立一些实体性的机构，因为非洲现在无力来主动承担或者吸引这样的研究，我们应当主动跨出第一步；第二个是要建设一批非洲研究的队伍，

而且这个队伍应该是来自不同的学科，非洲研究不可能由一个学科来单独完成，需要根据不同问题进行跨学科合作；第三个是需要建成一个良好的环境，硬件、平台的搭建，“先筑巢、后引凤”；第四是要到非洲去，一定要到非洲去。这个有一定的困难，我们招进来的老师，有的一听说有去美国留学的机会，眼睛立马亮了；要是去非洲，则需要做很多的动员工作才愿意去。也许这也是中国还没有到达那个阶段——西方国家的非洲研究学者一定要待在非洲几年的，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离这个目标也差的很远。现在我们也在逐渐地落实这些事情，包括智库论坛、相关的基地等等。最后呢我们希望建立一所非洲研究的大学，这是一所为十年二十年之后中非合作培养人才的大学。义乌市政府非常热心，专门拨出 500 亩土地来希望建立一所中国的非洲大学。但是师资力量、招生计划等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不敢答应这件事情，希望我们年轻的博士愿意走这条道路，去开创新的事业。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团队，这个团队在二十年后能不能成长起来，我现在不敢确定，但是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工作。谢谢大家！

[整理：杨雪、郭超、宋一宁、刘志]

[责任编辑：刘志]

破除中美关系中“新冷战”的历史隐喻

凌胜利*

金秋九月，习奥即将再次会晤，有关中美关系的走向再次引发各方热议。近期美国媒体又抛出“中美能否阻止新冷战”的论调，历史隐喻再掀波澜。毫无疑问，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富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的双边关系之一，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差异，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备受瞩目也令人困惑。由于未来充满诸多不确定性，导致有关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各种猜测不断，中美关系也非常不幸地被各种历史隐喻所困扰。“修昔底德陷阱”、“新冷战”、“强国必霸”等各种历史隐喻也经常用于中美关系，这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要开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影响。为了中美关系未来的良好发展，需要破除历史隐喻的影响，“新冷战”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历史隐喻之一。

一是中美“新冷战”的认知存在简单的权力政治和历史镜像思维。冷战可以简要地理解为以美苏为首的两大联盟体系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全面持续对抗。不过何谓“新冷战”则是见仁见智，目前并不存在为学界所共识的“新冷战”的概念。如果将中美之间的新冷战相比较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冷战，将会存在许多差异。中国也没必要不断强调中国不是苏联，将中美关系与中苏关系类比更多只是关注象征意义而忽视实质内涵。

二是尽管中美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并未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目前中国也并非推行意识形态输出，这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有所不同，相反，美国需要反思其继续冷战手段的“民主输出”。中美之间的新冷战与美苏冷战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色彩较淡，但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

三是中美之间经贸关系密切，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经贸关系隔绝相比存在天壤之别。中美之间如形成新冷战格局，如何实现政治与经贸关系的分隔将成为难题。尽管目前亚太地区形成了一种“二元格局”，但对中美双方而言并非长久之计，很难持续存在。目前，经济关系已成为两国关系的“润滑剂”和“压舱石”，军事关系虽然敏感但并未成为两国关系的首要议题。

四是中美双方目前并不具备了进行冷战式对抗的能力与意愿。目前中美双方都意识到了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并不意味着中美必然走向对抗，因而中美双方对于规避“修昔底德陷阱”存在共同诉求，中美虽然不会成为盟友但双方也不会发生类似冷战那么严重冲突的危机。

五是新冷战格局并非中美之间的双边对抗，对于可能形成的新冷战格局，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并不一定会选边站队。事实上，对于亚太地区广大国家而言，其最优战略在于尽可能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能够同时从中美两国获利。新冷战的格局意味着亚太地区将分裂为两

* 凌胜利，男，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

大阵营，中美分别在亚太地区建立等级体系，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美“新冷战”只是一个历史隐喻，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而言，不要随意张贴太多标签，少点战略忽悠，多点务实合作才能促进中美关系的稳步发展。以史为鉴虽有启迪，但历史隐喻禁锢未来创新则不可取。

[责任编辑：李天翼]

· · · · · · 道义现实主义 · · · · · ·

道义现实主义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在现实主义有关实力、权力和国家利益假定的基础上，从个人层面再发现道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政治领导类型和国家实力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取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国家实力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小国”四类，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去”和“争斗”四类。当国家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的效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规范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权力转移的现象，当世界不再分割为多个地区体系后，世界中心转移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主导国会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道义现实主义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是，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这个解释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许多弱国战胜强国的国际政治现象。从理论建设角度讲，道义现实主义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挑战：一是重视道义的理论能否属于现实主义理论；二是将领导类型作为自变量之一能否建立起科学的系统性理论。

资料来源：阎学通：《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整理：周扬、彭宁楠、宁鹏举]

[责任编辑：宁鹏举]

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

马垚粮^①

摘要：人权问题是 21 世纪以来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人权更是当今国际社会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则是最先将人权融入其对外战略，并使用的最娴熟的国家。那么人权政策在美国对外战略中是如何形成的？它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够正确认识到美国的人权外交的发展和本质，而且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其人权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权”的概念入手，从思想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的成因，并对人权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认为人权因素会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会继续坚持下去，中国应当认真研究和应对美国的人权外交。

关键词：人权；对外战略；人权外交

一、前言

人民自古以来便充满着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望和追求，这使得人权成为无数人之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二战后各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人权越来越被世界所重视。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权问题国际化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借机将人权因素融入到其对外战略中，用本国的标准来衡量他国人权，甚至推行“人权外交”等一系列包含人权的新战略。表面上看是为了世界的人权发展，而实际上将人权作为干涉他国内政，实现本国利益的借口。

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民族国家，其基础是建立在不同人种的融合之上的，是建立在维护人民的不可让渡权利基础上的^①，人权自然是其关注的重点。同时，美国作为首屈一指的强国，其一言一行无疑会对国际局势造成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其对外战略的制定甚至关乎到他国存亡，而人权因素在对外战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美国人权战略的研究可以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关注的核心之一，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其人权政策也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对于分析美国人权因素和对外战略的论述不少，笔者将从美国与人权、以及美国的对外战略制定这两方面来进行梳理。

1. 人权与美国

在讨论之前，我们先对“人权”的概念进行初步探析。万鄂湘在《人权理论与国际人权》指出“人权”，就是人的权利：从狭义来讲，人权就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即基本人权，从

^① 马垚粮，男，南开大学 2015 届国际政治专业本科毕业生。经笔者同意，栏目编辑对本文做了一定修改。

^② [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版。

广义上讲,人权既包括基本权利,又包括公民权,并融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于一体。^①《世界人权宣言》对人权定义则较为简洁:指人因“作为人”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即“属人的权利”。^②而在国际人权法律文件中的定义没有明确提出“作为人”到底是指“自然人”还是“社会人”。但世界人权宣言第1款的立法原意显然是直接指“自然人”,随后是“社会人”;或者说,在这一定义中,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诉求要优先于人的社会本性。^③

在美国,人权的发展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建国初期已初见端倪。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宣告所有人“生而平等”,其权利被“上帝赋予”且“不可转让”。美国的人权第一次应用在对外政策上是出现在一战后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纲领“十四点原则”中,主要强调道德上的相互依赖,目的是在各国间建立共同的信誉与道德标准。^④二战期间的人权思想体现在罗斯福总统主张的“四大自由”中,体现了“天赋人权”的精神。从卡特总统开始,人权进入了制度化的进程。1977年美国政府公开宣布人权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不随着时间、政府其他因素的改变而改变,“人权外交”首次出现在美国外交史上。

在特点和实质方面,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在《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s》中论及:“我们的外交政策在我们现在称之为‘人权’上不仅有双重标准,而且有三重和四重标准。”首先是将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权区别对待。其次是对“亲美”国家则放宽对待。^⑤亨特(Michael Hunt)指出由于人权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认同中,因此在未来美国不会放弃在对外战略中使用人权因素,而且极有可能在手段和方式上继续发展。^⑥同时,一些学者也意识到了人权外交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万斯认为:美国人权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受到了自身的局限,如果强迫别人接受本国价值观,反而适得其反。^⑦

2. 美国对外战略

对于国家来说,外交战略不会胡乱制定,往往是依据一定的客观事实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来制定和实施的。袁征认为,对外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较长时期内带有全局性的谋划,在同一的时期,对外战略呈现出相近的特点,对外战略的措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来加以制定的。^⑧库尔思(Jame Kurth)“与众不同的大战略”指的也是对外战略:美国的对外战略往往是其独特的自然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⑨就对外战略而言,考虑到多重环境下,美国政策往往会起到多重作用,正如理查德·哈斯所归纳的“六种主义”的结合(霸权主义、孤立主义、威尔逊主义、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现实主义)。^⑩波森(Barry R Posen)和罗

^① 万鄂湘:《人权理论与国际人权》,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② 《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 and 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对待。”

^③ Chr. Michelson Institute, *Human Rights as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The Making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1993, p.14.

^④ 李世安:《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⑤ Irving Kristol, *Defining Our National Interests, American Purpos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⑥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⑦ [美]塞勒斯·万斯:《困难的抉择:美国对外政策的危急时代》,北京:中国翻译对外出版社,1987年版。

^⑧ 袁征:《美国对外战略是如何出台的》,《当代世界》2014年第5期,第22-26页。

^⑨ Jame Kurth,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 Pattern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No.43, p.3.

^⑩ [美]理查德·哈斯:《规制主义——冷战后美国全球新战略》(陈遥遥、荣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斯(Andrew L. Ross)将新孤立主义、选择性接触、合作安全和优势战略作为美国的战略模式提出。^①美国《2001年四年防务评估》同样证明在美国战略上往往是多种模式的组合,不断随情况而变化。^②在新世纪,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各国联系更加密切,国际关系变得比任何时期都要重要。奥巴马主张: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形成一个融合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法律与文化领域各种资源和手段的综合战略,来实现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③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国内外的研究学者对美国对外战略中人权因素以及对外战略的形成有着详细的分析和了解。人权一直贯穿着美国发展的历史,并最终成为对外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对外政策。这是理想主义在美国政策中的表现,其目的主要还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宣扬美国的民主价值观。美国的对外战略是各个机构和不同的理论观点相组合的结果,在新的时期美国对外战略逐渐集中到亚洲。

论文首先对人权的概念进行介绍,之后从历史和思想传统的角度对美国形成人权战略的原因进行探析,进而分析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发挥的机制和作用,最后建议中国应对此采取何种对策。文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1. 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和史实分析出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使用动机以及作用机制。2. 归纳与演绎方法通过大量文献,笔者对历史上的美国人权外交政策进行细致地研究并试图总结出人权因素影响机制的规律。3. 文献分析法:整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学术论文和书籍中数据以及相关资料。

二、人权影响下的美国外交战略

(一)人权与对外战略的界定

无论对于哪个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战略都往往是其主体思想的体现,美国的对外战略制定更是受到西方的人权理论的影响。对于西方人权概念界定和对美国对外战略的了解能够使我们更好的理解人权为何会成为对外战略,以及如何影响对外战略。

1. 人权的概念界定

“人权”虽然由来已久,但对其统一的定义却是目前政治、哲学范畴难点之一。下面笔者将从不同的角度来对人权进行探析,使得对人权有一个较为明晰的理解。

单单从字面上来体会,“人权”可以理解为“人”本应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为人所生来就拥有的,不被人剥夺和侵犯。现代的人权观念是“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平等中,引申出的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④因此,“人权”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

年版,第65页。

^① Barry R. Posen, Andrew L. Ross, “Competing Visions for U.S. Grand Strateg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1, p.5.

^②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01, Working Group,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2000.*

^③ 中国社科院:《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及对我国的影响》,《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5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①人权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所认识到和需要的，并它会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自身阶级的变化而不断提高对其的认知，所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国家对人权概念的理解有所差异。

而从法律的角度，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率先将其从自然法角度解释为人权是人类所拥有的自然属性之一，不可侵犯。这一以自然性、法律性为基点的论述，成为迄今为止中外学者阐述人权的基本原则。^②英国学者亚当库伯指出人权是指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属于所有人的权利和自由，本质上无法否定，不可剥夺，它并不展现人权的现实性。托马斯·弗莱纳认为“人权使得人们有权利和别人一起享有生活”，“人权给了人们一种能力和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基本权益。”^③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原始的人权观念起源于到古希腊主时期，并主要体现在民主、法制和自然法思想上。古希腊对于人权有着丰富的阐述，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主权在民”和“制衡”机制的思想：强调政治的民主在于实施平等和正义原则。他坚信法律和宪法处于最高地位，公民意识同样十分重要。^④在圣经中同样包含着丰富的人权色彩，在《旧约》创世纪中提到“由于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人生而就是有尊严的”，而这种个人主义人权观塑造了美国的社会价值观。^⑤启蒙运动时期，人权有了进一步发展。格劳秀斯“天赋人权”学说强调：个人的价值和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人民有权利去追求生命权、自由财产权，追求幸福和反抗压迫，任何人都不得侵犯该权利。^⑥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人权理论被各国统治者所利用成为国家的立法基本原则。《独立宣言》宣告着独立初期，美国就对人权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被造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⑦二战后又陆续出现了诸多关于人权的法律性文件和条约，国际性的诸如《世界人权宣言》等等，将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作为主要关注点。二战以来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诸如社会主义的扩大以及殖民地独立，人权国际化趋势加快等。在此形势下，学者开始寻求对人权比较统一的界定。其中最为大众所接受的是米尔恩的观点，他指出，“存在无论在任何时间地点下都属于所有人的权利。那是作为一个人所享受的基本权利，不管其国籍、宗教、性别、社会身份、职业、财富、财产或其他任何种族，文化或社会特性方面的差异。”^⑧虽然此解释带有部分“天赋人权”的色彩，却抛弃了意识形态分歧，增加了其普适性。但他将人权看作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忽视了其可变性。

本文所讨论的“人权”则属于狭隘的概念。首先，人权在文中被认为是与外交结合而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7页。

^② 侯学华：《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

^③ [瑞士]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④ K. Thomposon: *The moral imperatives of human rights: A world survey*,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p.126.

^⑤ A. Kaplan: *Human Rela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Judaism*, Greenwood Press, 1980, p.55.

^⑥ 王红艳：《论冷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⑦ 董云虎、刘武萍：《世界人权公约法总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⑧ 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第2页。

的国家为了来达成自己战略目标的手段。其次，政治上的人权与法律上的人权有所不同，对于不同国家意义有所区别。第三，国家上的人权往往与其背后现实的国家利益相联系，时常伴随着以政治、经济、军事手段来实现。

2. 美国的对外战略

外交战略，又称对外战略，通常来讲是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针对自身外交问题所制定的较为总体规划，而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以其外交战略为中心而制定和实施的。^①对于美国外交战略的研究，能够更加明晰地认识到人权政策所贯彻的核心内容。美国的外交战略往往是与不同的时代阶段向联系的：为了达到预定目标，美国会制定不同的战略。

冷战时期，“遏制战略”作为美国的政策大纲旨在于与苏联进行对抗，削弱社会主义势力。在冷战这个特殊时期内，美国通过在世界范围内以战争以外的一切方式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同时加强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控制，来不断加强自身的实力与苏联抗衡。可以说“遏制战略”主导了整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虽然会随着政府的更迭而有所改变。“杜鲁门主义”是遏制战略开启的标志之一。美国在“里根主义”下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采取主动防御的战略来对苏联进行威慑。布什时期的“超越遏制战略”更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和前人的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改造，力图在不放弃武力的前提下来对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上的演变。

苏联解体后，国际局势发生了改变，遏制战略的使命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便是克林顿时期的“参与和拓展战略”：以美国为核心，加大在国际上参与事务的力度，极力建设美国独霸的国际格局。9·11事件刺激了美国民族主义倾向，新保守主义势力抬头。小布什提出“先发制人”战略更加肆无忌惮的以反恐为幌子大肆对外干涉。面对新世纪亚太地区的崛起，奥巴马政府则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开始将其对外中心从欧洲转移：加强与亚太各国间的关系；加强和巩固该地区已有的军事同盟同时大力促进同亚洲国家的经贸往来。

总体来说，虽然历届的政府在对外战略上有所变化，但都是基于对于当前国际形势的判断。美国推行对外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试图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

3. 人权与对外战略的关系

现阶段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人权可以说是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人权是能够为美国扩张和介入提供合法性；另一方面美国外交战略需要人权来体现美国的价值观。

一般认为，国家对外战略包括环环相扣的三个要素：战略目标的确定——确定国家必须努力维护和追求的国家利益；战略威胁的判断——判定国家利益面临的威胁；战略手段和途径的选择——选定应对和消除威胁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其实，还有一个统领这三者的关键要素，即国家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或基本原则。^②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指导思想之一，

^① 袁征：《美国对外战略是如何出台的？》。

^② 郑保国：《“9·11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危险创新》，《外交评论》2007年第9期。

自然在对外战略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其一言一行都备受世界关注,维持其国际形象尤为关键。人权则为美国插手国际事务、干涉他国内政提供了绝佳的借口,既能达到攫取利益的目的,又能够不影响其国际声誉。人权同时也是国内人民的“美国使命观”的体现:宣扬美国优越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将饱受苦难的国家从中解救出来。布热津斯基指出:“军事、经济和战略考虑是外交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最后决定因素。人权较之国家安全目的必须履行的责任时,就成为一种附属性因素。”^①美国使用人权的出发点并非就是保护人权谈人权问题,它在贯彻其国际法律和人权标准时是具有选择性的,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人权在对外战略中的使用使得美国如虎添翼,在制定和实行政策时更加得心应手。

(二) 人权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演变

对于人权的起源地欧洲来说,人权在美国的演变的确令人惊讶。但这种现象本身就具有独特的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受到西欧宗教和封建思想的束缚,来此的移民大多抱着个人奋斗、个人解放的理想寻求新发展。在如此环境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为人权的发展经济基础。

1. 思想根源:美国信念和民主传统

(1) “上帝选民”的美国信念

美国信念的主要思想来源于英国的新教,“它给美国政治观念的是道德主义、千年王国论和个人主义。”^②“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基督教竟然对人的灵魂产生那么大的影响。”^③新教伦理的核心概念包括平等、民主、宗教自由、个人主义等体现人权因素的内容,体现了美国人的社会价值观念,为美国政治社会观念奠定了伦理道德之基础。

“上帝选民”的信念演化于清教徒们宗教使命观,它来源是新教创始人加尔文的“预定论”。^④加尔文在解释教义时提出,上帝以其绝对的最高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的称为“上帝的选民”,其余的则为“弃民”。个人的得救与否、富贵贫贱,皆由上帝预定。^⑤这种宗教观使得美国人民作为“被选中的人”而产生了优越感和自豪感。同时,新教徒以创建自己的“山巅之城”为目标。“大多数新教教派都热衷于积极布道和劝导。他们具有一种传教士的使命感,志在劝人皈依再生。”^⑥虽然在美国,政治和宗教互不干涉,但在历史上宗教与政治往往交错在一起。作为美国人,除了一直为此自豪,认为美国价值观念具有优越性外,同时也认为在道德上有必要将此发扬光大。^⑦

正是由于北美早期移民们“上帝选民”观念,使独立后的美国人为地罩上了一层神圣的

^① 郭永虎、薛丹:《20世纪70年代美国人权外交政策形成新探》,《美国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②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5.

^③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4, 314

^④ 侯学华:《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

^⑤ 侯学华:《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

^⑥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p.15.

^⑦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p.153.

光环。美国总统托马斯·杰斐逊在 1805 就职演说中谈到，“上帝指引着我们的祖先，就像指引着古代以色列人一样。”^①在这种“美国信念”的引导下，许多美国人都甘愿为这“伟大的事业”奉献终身。这种热情纯粹是出于一种虔诚的信仰，致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不自觉地成为了美国政府海外扩张政策的代言人，而人权则是他们所宣扬的美国信念的重要一环。

（2）美国的民主传统

美国人权可以说是其民主传统下的产物，而其民主传统则是最早来源于英国的清教思想和理性主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1620 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作为清教徒移民初期所订立的文件，它宣布“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有将来能够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及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和服从。”^②它确立的原则在当时的殖民地所采纳，并变化出“州权建立在人民同意之上”、“人的生命权不可剥夺”、“地方(州)自治”等民权思想。以此为据，各殖民地几乎都建立起以民主体、自治为指导的基层管理体系。以富兰克林·杰弗逊、潘恩为代表的先辈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主张。这为北美独立战争的胜利、为人权立法和人权保障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权利保障。托马斯·潘恩在其《常识》中从人权角度出发，反对英国专制统治，鼓吹为美利坚合众国独立而战。^③“旧世界到处盛行着压迫。自由到处遭到追逐”。^④他站在人权的角度对君主政体和世袭制度进行批判，捍卫人民主权和民主共和制原则。同时，在其《人权论》一书中，他表达了对华盛顿在美国采取保护人权的相关政策希望。他说“原人权能将如您的慈爱和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普及”。他公开呼吁美国政府普及人权思想。^⑤

1776 年通过的《独立宣言》在美国人权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它表明：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⑥在《独立宣言》发布后，各个独立的殖民地均将其作为制定法律的蓝本和范例。而在随后的《权利法案》中列举了公民权利的形式，确认了公民享有人身、财产、信教、言论和出版自由、和平集会和伸冤权等基本人权，并受到法律保护。此后随着美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人权的的规定也越发明晰，陆续通过了 17 条修正案。在宪法对人权的规定不断修正和拓展的同时，国会还以通过单行法律的形式对其做出补充。^⑦美国通过“上帝选民”的信念和民主传统使得人权深深扎根于其政治土壤之中，并随着美国的壮大而不断扩充和发展。从这点上来看，人权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武器和潜力巨大的政治资源。

2. 政治背景：人权政治化——人权外交的结果

^① 侯学华：《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

^② 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开拓历程》，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7 年版，第 3 页。

^③ 李世安：《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第 73 页。

^④ 托马斯·潘恩：《常识》，商务印书馆，1961 年版，第 55 页。

^⑤ 马清槐：《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 109 页。

^⑥ 赵一凡：《美国的历史文献》，北京：三联书店，1989 年版，第 17 页。

^⑦ 侯学华，《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过渡到“世界史”的范畴,由于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人权问题开始在国际社会中受到关注,并开始具有国际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如果仅从表面上来体会,“人权”与“外交”是完全不同的领域:人权可以看作是国家内政问题,也由国家来负责处理;而外交则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但即使这样,人权还是在国家利益的介入下政治化与外交组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

人权政治化可以从以下两点来看:首先,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等对人权的普遍关注,并以法律形式将其确定下来。其次,是国际社会对少数人群权利的关注。国际社会对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仰者的权利关注最早起源于战争^①。虽然造成战争和冲突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常常与种族和宗教存在着紧密的关联,而这些战争往往会对国际关系产生种种影响。例如三十年战争,天主教和新教矛盾上升到国际层面,使得大量欧洲国家卷入了战争。如果国家对内部某一宗教或群体的压制,不仅会导致起义或叛乱,致使主权国家解体,甚至会导致其他强势国家的介入。^②由此可见,自人权被广泛关注以来,国际社会便围绕这一“国内”问题不断斗争,这致使“人权”与“外交”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最终促使了人权外交的诞生。

在二战后人权开始进入外交领域,其概念产生于美国人戴维·D·纽瑟姆的《人权外交》一书。而在其思想的应用上则最早萌芽于一战时期,主要体现在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在1977年,“人权外交”成为了美国政府的战略之一。而人权外交也随着美国的提出和拓展不断被其他国家所重视。

3. 历史变革:美国独特人权政策历史

人权政策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1823年的门罗主义可以算是人权政策最早在美国的体现了。虽然其中并没有对人权又实质性的保障,但包含了“不准殖民”、“互不干涉”、“反对干涉别国主权”的原则。^③威尔逊总统则将民主与世界和平联系起来,提出了“十四点计划”,打出了人权的旗号,强调美国只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二战时期,“人权”旗帜被罗斯福总统再次高举来反对严重践踏国际人权的法西斯战争:“每个人享有根据自己良心支配而实现自己宗教信仰的自由,在合众国,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的国旗象征着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原则;而且这些原则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④随后包含人权主张的“四大自由”的主张应运而生

美国人权外交开始于二战后期。在这一时期,与法西斯的世界主要矛盾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美苏“冷战”的矛盾。从卡特开始,“人权外交”便成为了美国一贯坚持的战略之一。卡特在就职演说中说过:“我们对人权的崇拜决无任何条件可言……我们因为自己是自由的,因而绝不能对自由在其他地方的命运漠然置之。”而“美国所要担负的最为高尚和最为雄心勃勃的任务,就莫过于帮助建立一个公正、和平、真正符合人道的世界。”^⑤在里

^① Ren Mullesron: *Human Rights Diplomacy*, New York: 1996, p.17.

^② 侯学华:《论美国人权外交的战略演变及其历史根源》。

^③ 刘杰:《美国与国际人权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④ 关在汉:《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94页。

^⑤ 李剑鸣、章彤:《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职演说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1页。

根政府时期，人权外交政策到了进一步制度化。^①他曾在英国倡议“巩固民主的基础”，要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争取自由的十字军东征”。^②在冷战后布什总统在人权方面的政策总体上是对前任政策的延续：他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但目标是对准苏联并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来对社会主义国进行文化渗透。同时布什将“人道主义干涉”作为人权的新实践：在巴拿马、伊拉克等地区，美国毫不犹豫的采取所谓“人道干涉”来获取美国战略利益。克林顿上台后继续推行人权外交，并把人权列为与经济和安全相并列的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③。

新世纪以来，肩负复兴美国霸权任务的小布什在初期就明确提出了其三大战略任务：遏制恐怖主义势力的干扰；发展各国关系，巩固军事同盟；弘扬美国先进理念，促进经济发展。^④显然，对于人权的弘扬被其认为是美国的重要任务之一。9·11 恐怖袭击又使得美国将人权与恐怖主义相结合。^⑤奥巴马上任后，开始强调“软实力”的作用。在理念上，注重“更广泛的人权”；在实践上，注重政策的多变性，凸显对软实力因素的重视并提出“原则性务实主义”的概念。^⑥他指出，人权战略要与现实向适应同时也要坚持其本身的原则。具体的实施策略能够依据复杂的现实采用灵活的反应，同时要重视多变机制的作用，确立美国的领导作用。

从门罗主义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对人权的提倡，经过卡特“人权外交”提出，再到巴马的“原则性务实主义”，人权因素已经逐渐融入到美国的对外战略当中，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可以根据其不同的意图对“人权外交”做出不同程度的阐释，并成为推行对外战略的有力工具。

三、人权在美国对外战略思想上的指导

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美国一贯坚持的理念和对处理对外事务的准则。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是对美国核心利益的保护，而人权显然是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新方式，其作用不可忽视。在研究美国对外战略的诸多因素时，人权因素更是需要加以重视。具体来看，人权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思想指导作用概括如下：

（一）定位作用：新的认知视角

人权的定位作用在对外战略中表现为：人权为美国的决策机构和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视角。不同环境下的国家对世界的认知角度会有所差异，而其实行的对外战略自然会有所不同。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国务卿看待世界的眼光，会在性质上不同于伊朗国王看待世界的眼光”，其差异“部分地来自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来自他们各自扎根于几千年来不同的文明世界里”。^⑦而在美国的特殊环境下，人权自然是为美国人

^①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5页。

^② David P·Forsythe,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Two levels, Two Worlds,” *Political Studies*, 1995.

^③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第317页。

^④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www.whitehouse.gov/nsc/nss.pdf>

^⑤ Muqtedar Khan, “Prospects for Muslim Democracy: The Role of U.S. Policy,” *Middle East Policy*, 2003, p.79.

^⑥ 李莉：《奥巴马政府人权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2期。

^⑦ 邢悦：《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清华大学学报》第19卷，第4期。

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眼光。

将人权加入到外交战略中,体现了美国上下对美国信念和民主传统的重视。在美国这样一个以新教为主导的宗教多元化的国家里,新教思想在美国的整个诞生过程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权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孕育而生。而“上帝选民”的优越民主信念通过人权,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也充分的体现了出来:

首先,在道义上,美国胜过其他任何国家。作为一个美国人,其任务便是要将其他国家从非人权、苦难和专制中解放出来。美国所卷入任何战争都是为了使世界变得更加完美与和谐,这也是美国参加二战时期所宣扬的;而针对自身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则往往难以接受。美国在贯彻所谓的国际人权标准和本国法律时是有“选择性”的,而这种选择则具有很浓厚的人权优越感在里面。又如美国在初期殖民扩张时期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以及对印第安人的剥削和掠夺,这些现实都在孩童时期就被掩盖以来,被宣扬成追求民主、人权的伟大行动。

其次,美国会在涉及人权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国际上,作为“人权维护者”和“上帝的选民”,美国有义务站出来代表上帝的选择来对国际上出现争论的人权事务进行处理。美国自认为肩负着建立“山巅之城”的使命,在国际争端中更倾向于发挥领导性的作用而不是仅仅袖手旁观。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以国际仲裁者的形象来加入到战争中,而不仅仅是一个参战国的身份。美国的最终目的也是要建立自己所主张的国际新秩序,而不是作为战胜国瓜分战果。

最后,出于对美国人权的信任和优越感,美国只相信自己的人权政策,对上帝负责而不在于其他国家和国际秩序的维持。^①美国对待人权问题之依照于美国的国内法,而国际条约、规章制度的遵守与否则取决于是否与国家利益相符合。对于不遵守国际条约的行为、不签署协议的行为,美国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妥。

在此定位下,美国的人权具有无与伦比的特性,而一切与此相偏离甚至违背的国家都将是美国所打击的对象。冷战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甚至被认为是专制、独裁的国家,是威胁美国民主人权的“邪恶势力”。冷战结束后,伊朗、利比亚、朝鲜等不遵守美国秩序的国家,则被美国称为和平的最大威胁,欲除之后快。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曾在国会提出“以反恐划线”的新标准:按照国家的“善恶”和人权道义等来再次划分为恐怖主义阵营和美国领导的反恐阵营。要么站在美国一边,要么就属于恐怖主义而被认为是敌人。^②在不同时期,人权都起到了对外交战略的定位作用,为具体的战略执行提供了基础。

(二) 定向作用: 价值观的输出

人权的定向功能在对外战略中表现为对于对外战略价值取向的规定以及输出。从根本上来讲,虽然国家利益时对外战略最终要的决定因素,但是人权对于美国对外战略的价值观影响仍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山巅之城”的指引之下,美国坚信通过对于人权的扩展,

^① 邢悦:《文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

^② George W. Bush,“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对于人权价值观的输出能够解决国家内部的矛盾和国际上的争端。民主的政府机构更加能够维持和平，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爆发战争或出现暴力行动。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来说，这样的国家更愿意支持自由的市场，更倾向于和平解决纠纷。在此价值取向引导之下，出于“山巅之城”的使命感和对人权的追求，美国开始进行价值观的输出。美国依照其实力的强弱变化来采取多种方式在全球推广其人权价值观。

在建国初期，美国国内主张“独善其身”。通过不断在本国实践和完善民主、践行人权的方式来显示美国价值观的优越性，使其他国家受到“感化”，进而达到传播民主思想的目的。在这个“上帝选择的国家”里实践和完善民主，使之成为“照亮人类命运之路的灯塔”是传播民主思想的有效方式，是完成上帝赋予的神圣使命的最佳选择。以杰弗逊的话来说，美国“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府”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和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杆和模范”。^①而这样的想法毕竟只是美国的一厢情愿，很难达到让其他国家效仿甚至接受的程度。于是随着实力的逐渐增强，美国逐渐摒弃原来“自作多情”的价值宣扬方式，而开始对外进行价值观的扩展。对于不符合美国人权标准的国家，美国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来教育、演变这些国家改变原来的民主制度，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权政策。通过人权外交，美国开始以本国标准来衡量别国人权状况，灌输美国的民主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美国更是强调“软实力”的作用，企图使其逐渐向美国靠拢，最终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实现“和平演变”。人权作为一种“思想手段”，就像尖锐的武器，最具有蛊惑和杀伤性，这使得美国更加重视对其的利用。正如杜鲁门所希望的那样：“全世界都要采取美国的制度”。^②

人权问题被美国作为政治筹码而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国别人权报告便是这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尤其谈到中国的人权状况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里根政府在1982年的人权报告中抨击中国：在政治结构上“继续是在对个人人权和自由施加重大限制”，同时又认为“中国总趋势是向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演变。”^③在新世纪初期，针对中国的人权报告仍然称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在关键领域的人权状况还在继续恶化：例如对维权人士和组织的额外打压；言论自由和选举权力得不到保证；司法程序不透明等等问题。在这里人权报告便是美国输出其民主观念的一种方式。美国以改善他人权为理由，对中国的人权情况恶意扭曲，而人权为这种无端提供了道德性和合法性。同时针对中国人权上的问题，美国设置了种种对中国发展的限制，促使中国向美国的价值观靠近。

（三）认同作用：确立自身范围

人权的认同功能主要表现为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判断与别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认同基础。美国在实行对外战略之前，往往需要依据人权的发展情况以及民主程度来确立自身的敌友范围。人权的认同功能使得美国以该国人权状况大致的好坏程度来确定与其他国家的亲疏关系。与此同时，美国在确定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还会考虑到宗教、经济以及其发展状

^① [美]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② 王兵：《美国人权外交的发展演变及其实质》，内蒙古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③ 胡孝峰、张宏毅：《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剖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1999年第4期。

况,是否与美国相符合。作为一个传统上信仰基督教的国家,美国自然对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另眼相待,而这在中东地区体现的尤为明显。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向朝鲜和伊朗施压,都体现了对非基督教国家的不信任。而对于经济的条件来说,是否具有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美国判断敌我的辨别重点。对美国来说宗教相似、人权民主制度完善以及市场经济是美国确立自身范围,设立战略目标的三大标准。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国家可以成为美国的伙伴和盟友,而完全背离的国家则是美国要打击的对象。

同样是亚洲国家,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的态度便迥然不同。而这种状况在冷战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日本虽然并不是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但从人权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日本还是比较符合的。并且日本在冷战时期作为战败国基本上服从于美国,顺从美国的改造,是美国在亚洲的“兵工厂”。而中国此时则是站在了苏联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阵营,坚持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显然,这是与美国的标准背道而驰,因而成为了美国在冷战时期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在美国看来,社会主义阵营下的中国并没有任何人权可言。与此相类似还有朝鲜,从标准上来看,朝鲜任何方面都与美国格格不入。2002年,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声称:“伊拉克、朝鲜和伊朗与恐怖主义勾结,并有着企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野心。为了应对‘邪恶轴心’占有危险武器的威胁,美国将会与盟国尽快部署导弹防御系统。”^①朝鲜被美国描述为“邪恶的国家”,需要美国代表“上帝的旨意”来与其斗争直至铲除。建立人权的制度、实行市场经济以及能够被美国所利用才是美国所真正需要的。为此,美国建立一系列的于反对社会主义相关的外交政策,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是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美国所坚持的人权制度、经济制度和宗教才是世界发展所真正需要的。

人权所带来的认同作用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不同国家之间的态度,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所坚持的人权标准也会坚持下去,继续为美国确立与其他国家的亲疏关系,制定相关政策发挥着作用。

四、人权在美国对外战略实践上的影响

人权之所以在国际如此备受关注,是因为“国际社会确认人权是全人类深切关注的问题”。^②但能够上升为一国对外战略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并在实践中如此深刻影响战略的实施,在历史上为美国独有。

(一) 外交行为的正当化

人权的规范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权限定了国家战略所触及的范围。人权为美国的外交战略提供了一个判断的价值标准,无论国家的决策倾向于哪种特点,其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不违反人权,符合基本的人权价值观,获得国民的认同。在人权环境下,国家所采取的战略不仅仅是其可行方案中的最优解,而且是在其所有方案中选择出来的最符合人权价值观的最佳方案。而这种规范作用常常还自下而上的,国内的民众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

^① 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② 引自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为《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行动》一书所作的序言。

参与和监督过程中表现出来。如果公众认为该政策符合美国人权观，则会支持此政策，国家在获得群众认同的情况下更加容易推行政策；相反，如果政策违反了基本的人权，民主会对此表示反对，政策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直至其停止。

正是因为有了人权战略的存在，使得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可以不时地将人权原因加入其中，使得不正当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掩盖，将行为“正当化”，最终达到维护美国利益的目的。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缺少了能与自己抗衡的敌人，美国采取行动是不得不从其他角度来寻找动机。而“人权”恰巧给了美国一个既能保持国际形象，又能达到自己目的的理由。打出“人权”口号后，美国将站在道德上的制高点，而目标国家则是道德上的违背者。这样既能减少推行政策时的国际阻力又能够达到获得国际支持的效果。正因为人权的规范性作用，为既约束了美国的政策走向，同时又为政策实行提供了便利，使得人权在美国外交战略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美国实行的对外战略仅仅是满足了美国民主对于人权的要求，而无法为美国的切身利益有所裨益，那么此项政策往往是最终会被摒弃的；而如果仅仅是有利于自身利益却不合道义则更是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例如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开战的理由便是杜勒斯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中南半岛只要一个国家遭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化而沦陷，则其他国家便会像骨牌一样倒向社会主义的一边。^①于是美国人接受了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权价值观的说教，大量的军备和财力被用在越南这片土地上。然而，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是及其失败的，不但未达到原有的目的，并且耗费美国大量人力、物力，甚至陷入战争泥沼不能自拔，严重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于是民众一改之前的支持态度，要求尽快结束越战。最终越南战争在尼克松总统的承诺中草草收场。与此相似的还有伊拉克战争。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国内反恐热情空前高涨。小布什总统则利用此契机将人权与反恐相结合，大力打击国外恐怖主义势力，而伊拉克便是美国所认为的“邪恶轴心”之一。美国宣称开展伊拉克战争，能够消除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的隐患，断绝与恐怖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且能够将当地人民从苦难汇总解放出来。因此在战争初期得到了国内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小布什也成功的获得了竞选连任。随着战争的开展，美国所宣称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并没有找到，解决伊拉克人民的计划也没有实质上的效果。随着丑闻的不断出现和损失逐渐加大，美国人民渐渐开始不再支持伊拉克战争。最终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中撤出，正式结束了战争。

人权的规范作用使得美国在制定对外战略时，既要兼顾其道德性又要体现其所需求的利益。其实，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这两点都是及其必要的，但对于美国来说，人权使得美国比其他的国家更加注重对道德性和道义上的追求，同时也不会放弃对于利益上的渴望。正如基辛格所说：“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加务实的，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②

^① 资中筠：《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页。

^② 基辛格：《大外交》，第2页。

(二) 战略手段的多样化

人权的塑造作用主要体现在：作为美国的战略工具，使得美国对外政策考虑更加全面，而实行政策的方式也逐渐多样化。在美国内部出现一批研究人权问题的专家，国务院人权局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机构。美国白宫和国务院每年都需要对人权问题进行认真的考虑并制定相应政策，因此对于人权问题的衡量和考虑将美国对外政策深化到了思想战略层面。人权成为美国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后，其外交手段样式不断的翻新。人权在美国外交战略的实施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强硬型和温和型。

温和型是“软”的方面，指的是美国主要采取对话、交流、协商等方式，在一种友好的氛围下进行会谈和合作。通过这种“温和”的方式，让交流国不经意间接受美国的观点，从内部来改变国家，进行“和平演变”。以中国为例，克林顿总统曾经说过：“怎样才能有效促进人权？同中国人接触并直接同他们进行真诚的对话，显然是产生实际意义的最好办法。”^①除此之外，美国还会同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进行交流，在对话中来传播美国的思想，推广西方的价值观。而对话的具体问题上，美国会别有用心地进行选择。例如中国的“西藏问题”是否尊重了人权，甚至是“死刑”问题都有提及。虽然在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在谈话中却将其作为交流的话题来进行美国思想的灌输。

而“强硬型”则是美国的“硬”的方面。也是现阶段美国强制施行人权政策的主要方式，通过遏制、压迫、威胁甚至是武力的方式来迫使目标国际进行退让，采取西方国家的标准甚至改变国家的政策。美国现阶段的“强硬型”人权战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人权报告施行人权战略。年度国别报告是美国实行对外战略的重要参考之一。通过人权问题，美国向其他国家施压。除此之外，不同的部门还会撰写不同报告来对别国的人权进行攻击。例如对于中国，除了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外，美国国会特别工作组还会发布“香港问题报告”、国会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贸易壁垒报告”、“美中安全委员会评估报告”等等诸多报告。^②这些报告都旨在从不同角度来攻击中国的人权问题，企图压制中国。

其次，采用经济方面的举措迫使目标国改变人权状况。人权战略出现后，几乎所有的美国经济举措都与人权进行挂钩，包括对外援助、最惠国待遇以及贸易壁垒等等。美国在采用经济政策之前，都会对目标的人权进行评估来决定是否要进行帮助或合作。奥巴马上任后，在对外政策方面大幅提高了美国的对外援助来促进人权和民主。他还设立了基金项目来为比较弱小的国家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帮助，目的是巩固其民主化政权，从试图按照美国的意志来进行改造。通过经济手段，美国能够成功使得诸多的国家受到美国的限制，并按照美国的意图来行事。

再次，美国还会利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双边和多边谈判的方式向别国施压。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美国在联合国里有着重要的发言权。美国往往依仗自己的强大势力提出人权法案来迫使别国的人权进行改变。在其他主要组织和谈判中，美国更是依照此方式大行

^① 李世安：《美国对华人权战略及其实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2卷，第6期。

^② 李世安：《美国对华人权战略及其实施》。

其道。例如美国曾在国际会议上多次提出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来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攻击。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曾经联合其他国家先后不下十几次提出反华提案，但最终都因遭受多数的反对而宣告失败。美国从未放弃通过此方式来对别国进行施压。

最后，美国依然坚持着通过冷战时期的方式来推行人权战略。美国利用“亚洲自由电台”、“美国之音”等工具，加大对目标国的宣传攻势；私下支持别国境内的反对势力，动员各种颠覆力量等。美国妄图采用此种方式来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上的渗透和内部政治暴动，最终来达到改变人权甚至是国家颠覆的目的。就美国对外援助来说，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将对外援助当作促进人权、施行民主的最有效方式。“马歇尔计划”期间，为了尽快实现欧洲、日本的战后重建，美国曾将其 15% 的预算用于对外援助。^①而在援助计划的推行过程中，美国也理所当然的进行了人权和民主等方面的改造，使美国的观念和制度得到传播。而在实际情况中，对外援助并不一定能够达到美国在人权、民主方面的要求。例如危地马拉亲美国，但在美国看来人权情况不是很理想。美国曾经要求危地马拉按照美国式民主改造，但这明显地影响到了危地马拉政权的存在，涉及到了国家的立足根本。于是危地马拉拒绝了美国的援助，继续奉行自己的政策。^②

人权对外战略的塑造作用，使得美国能够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软硬兼施”。人权既可以作为弘扬美国价值观的口号又可以作为其干涉别国内政、插手别国事务的托词更可以作为援助的筹码使用，而最终都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权益和争夺海外霸权。美国以“人权”为名，实则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③

(三)影响路径的体系化

人权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一部分，人权的政策产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个完善的体系来实现的。它既受美国国内包括总统、国会等的制约，又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传统和思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多变性。

1. 思想路径：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

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深深地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战略选择，它扎根于美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之下，并潜在地规定了人权在对外战略中的政策走向。现阶段人权则主要通过以下四种外交传统影响美国的外交战略：美国例外论、新孤立主义、理想主义以及现实主义。^④

(1) 美国例外论

美国例外论毫无疑问贯穿着美国整个历史，并对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美国例外论包含以下内容：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与众不同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民族，他们享有人、宗教和政治自由；美国模式是社会上最完善的模式；美国有责任将忍受的苦难的人摆脱困境，拯救他们。美国学者拜伦·谢弗指出：“美国是依据不同的方式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① 高程：《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② 李世安：《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第259页。

^③ 王红艳：《论冷战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外交》。

^④ David P. Forsy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Carfax Publishing, 2002.

因此也需要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这要从美国自身的发展环境和背景来加以体会。”^①而美国的宪法和权利法案更是以法律的形式将其确立下来，不受到其他法律文件影响。

美国例外论对美国人权战略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这种外交传统是以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基础上自下而上的建立起来的，并被美国不断的加以改造。美国因此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它更加有道德、人权、民主；它将引导世界各地人民向往美国的幸事和优势，最终采取美国的价值和体制。^②显然，在这方面美国最有自豪感，人权最终成为对外战略与此有很大关系。正如小布什所宣扬的：“美国国旗不仅仅是我们实力和利益的体现。我们的祖先更希望我们为每一个人的权力和尊严而献身。苦难的人民需要我们，和平需要我们，打败恶势力炫耀我们，这一信念引导我们走向世界。”^③美国在表达着同一种信念，那就是要“拯救”世界于苦难之中。

(2) 新孤立主义

冷战后，随着传统孤立主义的逐渐衰落，新孤立主义则以单边主义的形式悄然而上。不同于传统孤立主义主张的不干涉别国、集中精力与本国发展的方式来实现美国利益，新孤立主义者主张美国将自身的精力从国外转向国内，不要过多的介入到国际事务之中去。新孤立主义基本上继承了旧孤立主义的传统，强调美国得天独厚的优势，避免承担海外义务。^④但改进点在于立足于美国所处的独霸格局之下，仅仅反对“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干涉”。在21世纪，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增强了新孤立主义的话语权。^⑤

例如2002年，美国一方面拒绝拥护国际刑事法院，另一方面却在欧洲和其他地方为所有美国士兵、外交官和公民极力争取双边豁免权；美国宣布拒绝遵守有关战俘的《日内瓦公约》；2003年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等^⑥。由于受到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影响，美国的人权外交变得更加务实，政策主要集中于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国家上。其在小布什总统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新孤立主义以单边主义的形式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不顾国际和国内的反对。毫无疑问，新孤立主义在布什时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和贯彻，改变了美国人权战略的基本走向。

(3)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

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理论。把这两种理论与国际关系相结合，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应运而生。现实主义认为国家是主体行为者，它的任何行动都是基于自己认知的基础上开始的。对于国家而言其整体利益至关重要，为了追求它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增强实力以便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所有的国家都在一个无政府管理的全球社会下运作，因此国际间的冲突和摩擦往往难以避免，增强国家实力显得极其必要。理想主义则是主张国家之间通

^① Byron E. Shafer, *Is American Different? A New Look at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Clarendon press, 1991, p.1.

^②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第33页。

^③ 布什总统2003年国情咨文。

^④ 罗会钧：《冷战后的美国新孤立主义思潮述评》，《国际观察》2000年。

^⑤ David P. Forsy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p.520.

^⑥ 李强：《美国孤立主义发展及其特点研究》，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过合作来获得更多的利益，战争所带来的毁灭注定是各国所不愿见到的。理想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来从整体上提升民主水平和全球安全。人们普遍承认，在美国的外交史上一直存在着对于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从这一角度来看，人权政策更多体现的是对于理想人权的向往。莫沃尔曾说过：“给予人权多大的优先考虑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旧有争论的当代表达，即在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究竟哪一个应当成为外交决策的指导思想。”^①卡特总统在实行人权外交前期也曾承认，美国应该如何在全世界支持人权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需要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做出很大的平衡。”^②

如果说理想主义代表的是美国人的使命感，那么现实主义则是其利益驱动的代名词。从理论上说，美国人的使命感和利益感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从经验上来说，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也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相互结合。在实践中常常难以区分哪些政策是由于理想主义所致，哪些是由于现实主义所致，或者二者兼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美国通过在海外进行干涉来支持民主国家，既可以看作是美国所说的保护自由人民的“圣战”也可以被看作是防止权力不平衡发展的努力。^③而从理论上来看，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互相体现：当美国把实现人权，解救其他国家作为国家最大的利益时，其对所认为非民主国家的政策既可以认为是理性，同样也可以认为是现实的。冷战时期主张现实主义外交的基辛格就曾将其现实主义政策解释为理想主义：“追求美国的实力就是符合道德的，因为它旨在使所有自由的人们最终得到安全和维持均势。”^④

人权通过美国例外论、新孤立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传统共同为美国对外战略的产生架构了一个特定的政治背景。具体到政策制定时，各个决策者和决策机构都有将其作为出发点来进行权衡。而这四种外交传统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就像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相互渗透一样，往往是多种主义交织在一起。正如坚持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在1917年的现实主义声明：“民主国家结成伙伴，才能维持持久和平。没有一个专政政府会信守诺言或信守盟约。”^⑤

2. 制度结构：美国的人权机构

如果我们认为总统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领导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到“弱政府强社会”的权机制。^⑥在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制定者是总统及其政府和国会这两大部分。总统看起来是最重要的决策者，但国会对总统形成巨大的牵制，二者同样被社会所约束进而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过程。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背后推动国会的则是美国的政

^① A. Glenn Mowe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 Green Wood Press, 1987, p.27.

^②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第33页。

^③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第48页。

^④ A. Glenn Mower,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Carter and Reagan Experiences*, p.9.

^⑤ 约翰·伊肯伯里：《缘何要输出民主？》，《交流》1999年第3期。

^⑥ David P. Forsy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p.520.

党和利益集团；媒体舆论和公众意见等其他因素也在政策制定中扮演了着重要角色，它们时常为美国国会的提案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美国人权战略的产生也经常是各种力量之间的竞争：总统和其领导的国务院、两党和利益集团支持下的国会以及媒体、公众等其他因素都发挥着不同但重要的作用。（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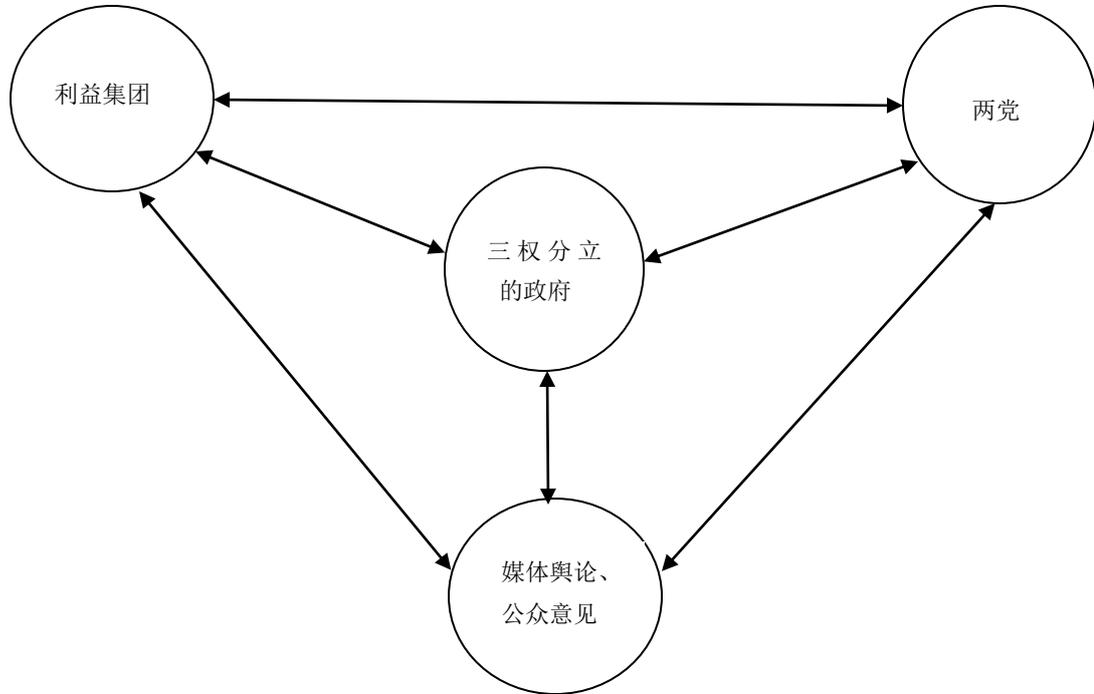


图1 影响美国外交决策力量示意图

（1）总统及其领导的国务院

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曾说过，把处理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任务交给“美国总统来全权处理”是明智的，因为强有力的总统是外交操作的基本要求和保障。^①总统之所以拥有如此权力不仅仅是宪法所赋予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应该具有的权力，更是不仅仅是为了统一两党割据的国会的意见而存在，而是因为他是被美国选民所信任和选举出来的唯一的一个代表美国形象的重要人物。作为领导美国的核心人物，总统自身的行为模式会影响到这一时期美国的政治倾向，不同的总统对于对外战略的制定过程有着不同的影响。积极型总统在对外战略方面往往更加积极与主动，例如里根总统，他往往关注着此问题，有着自己的想法去改进其进程。相反，有些总统则相对消极，他们并没有对对外战略强烈关注，或者把对外问题看得很淡，则并不会对对外战略有多大的影响，例如克林顿总统对战略制定的控制权则很弱，往往是遵循传统，听从国会声音。^②

两党派的总统也会对人权战略的也有着不同的倾向。共和党派的总统更倾向于现实主义，比起人权问题，他们更倾向于把精力集中于经济和安全上来。他们认为，经济发展能够保障

^① 熊志勇：《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② David P. Forsy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p.520.

稳定的国防支出和军事力量的配备，人权问题则往往不能解决实质问题。^①共和党总统代表的更多的是资本家们的利益而不是劳动者和穷人，选民中很少关注人权问题。与之相反，大众基础浓厚的民主党派总统例如卡特和克林顿则往往首先会关注到对外政策中的人权和自由问题。民主党派中的选民更多的是来自非裔、弱势群体和女性。这些选民需要民主来实现他们对于美国的关注，更关心人权问题而不关心财富和权利。

表一 人权外交以来美国总统类型划分

	积极型	消极型
共和党	里根 小布什	老布什
民主党	卡特	克林顿 奥巴马

笔者对人权外交出现以后的历任总统进行了分类，从表中可以看出里根和小布什作为积极型的共和党人在人权对外战略中的共同点是更加注重国家实力的比拼，在对外事务上态度强硬。他们往往会降低人权在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更追求实质上的利益。二者均将人权与实践相结合服务于美国当前关注重点。里根总统将人权作为对抗苏联的武器，在冷战中起到一定遏制作用。小布什总统则将人权融入反对恐怖主义和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中，通过军事行动来攫取更多利益。相反，消极型的民主党人克林顿和奥巴马则更强调人权的软实力作用，并且人权政策相对温和。克林顿虽然关注人权，但在政策上往往是对以前的延续，缺乏自己的特色。奥巴马则将人权作为一种“软实力”，强调“原则性实务主义”，更趋于理想化。

美国的联邦政府主要为服从于美国总统的领导，而在其中最重要的外交机构便是国务院。作为总统统辖的机构，国务院负责支持和执行政府的人权决定。（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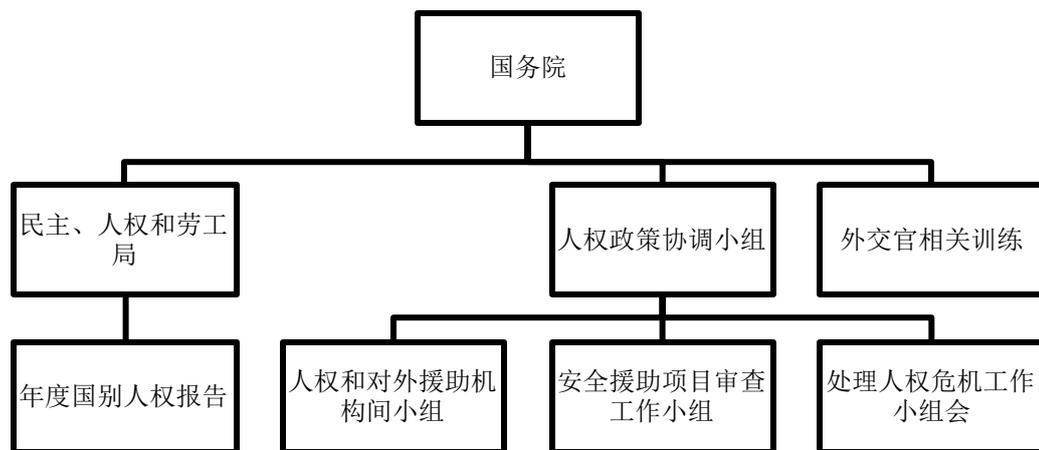


图 2 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权的机构及其运作

^①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在美国国务院内负责人权政策和人权事务的部门是民主、人权和劳工局(以下简称人权局),其最初名称是人权和人道事务局。^①在人权外交出现后,人权局建立了起来。经过多年的发展,人权局已在国务院中取得了巩固地位,在制定有关人权的对外政策中拥有无可争议的发言权,同时也和国务院的各个部门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人权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起草并提交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第一份报告是1977年在基辛格领导下制定的。虽然历届美国总统的政策和主张不同,但是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而一直延续下来。年度人权报告是美国承担人权责任的最重要的证明,不存在停止制定人权报告的要求。^②国务院人权局编写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为美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参考。首先,它从政策上确立了以人权为政策工具,来达到美国外交战略目的,也成为制约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其次,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增加了美国人权外交政策的透明度,影响着国会与政府之间的权利关系,转移了公众视线;最后,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③在美国推行人权战略后,西方国家也模仿美国尝试编写自己的人权报告。但由于美国人权报告是为了美国对外战略服务,更带着偏见和不公正色彩,往往忽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权利。

为了加强国务院内部在人权政策方面的协调,人权小组应运而生。随着政府和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这些工作小组的形式和运行方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人权和对外援助机构小组是一个协调对外援助政策和经济政策的小组,包括国务院有关局和处的代表,其目的是禁止向一切一贯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贷款、赠款或出口商品。安全援助审查小组则负责审查援助建议,把呈交给国会的安全预算建议汇总在一起。其成员包括副国务卿、助理国务卿、人权局、国际开发署、武器控制防务署和防务安全援助署的代表。处理人权危机的工作小组则只在发生国际人权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由民主、人权和劳工助理国务卿任主席来进行个案处理。同时国务院还会对于外交官进行相关的培训等。

(2) 国会

在法律上,国会和联邦法院享有和总统共同的权力,这是美国成立之初所订立的“三权分立”的体制所决定的。对于人权战略的制定问题,国会在其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国会是美国资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包含着两党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在人权政策上往往有着诸多意见和建议,对总统的权力有着约束作用。在国会权力顶峰时期,总统甚至会完全受制于国会。虽然在宪法中规定总统和国会权力地位平等,但相对来说,国会的权力掌握着更多重要的权力。如外交立法权、公共开支权、对外宣战权、对外贸易控制权、批约权、外交活动监督权等。而总统则仅有对外缔约权、统帅三军的权力以及接见外交使节的权力。总统权力相比之下显得“渺小”,国会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④

1) 国会在人权政策中的作用

^①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第409页。

^② Lawyer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1996 Quadrennial Report on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72.

^③ 李世安:《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第220页。

^④ 刘永涛:《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与总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人权上升为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国会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中所拥有的权力和对人权的关注是使得政府将人权战略化的原因之一。国会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影响人权战略：

首先，通过立法将人权制度化。国会参与对外决策的主要途径是财政权和立法权，而实际上财证权也是通过立法来行使的，因此国会行使外交权力的最主要途径是立法权。从政治而非立法角度看，有关人权的立法可以分为三个范畴：非限制性决议，相当于国会的声明，但并不需要做出实际的行动；一般性立法，指正常的法律确定，需要国会的监督和执行；特殊立法，指的是针对具体国家或职能的法律。在这其中，一般性立法是国会使用的最多的方式。在一般性的立法中有管人权的三项重要立法是：1.关于安全援助的人权立法（对外援助法 502B 修正案）^①2.关于经济援助的人权立法（对外援助法第 116 节）^②3.在双边金融机构中的投票立法（对外援助法第 701 节）将对双边援助规定的人权条件扩大到国际金融组织，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等。除此之外，还有难民法、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法案以及关于进出口银行的立法等通过将人权问题的法律化，国会增强了其在人权事务上的监督和发言权，促进了人权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发展。

其次，国会掌握着财政大权。与总统相比，国会还有一大优势便是其掌握着财政大权，可以勒紧政府的“裤腰带”。因此国会往往采用从财政方面入手来对总统的人权政策做出种种限制。国会对财政权使用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在经济上制裁人权侵犯国或限制本国行政当局在国际上的不道德行为，二是鼓励本国政府为国际人权事业进行资金上的投入。^③相关的例子很多，例如在越南战争后期，尼克松总统签订了合约承诺终止战争，但对越南的轰炸却依然持续进行着。在民众的抗议下，国会否决了对越南轰炸开支的申请，从根源上断绝了总统妄图继续做出不义行为的可能。除此之外，国会还制定法律来限制拨款行为。例如“在世界推行民主计划”便是国会制定的法律之一，目的是通过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来改造各国的政治体制和上层机构。为了达到目标，资助国外反对势力也同样在美国的考虑范围之内。随着该计划的发展，全国民主基金会应运而生。作为一个半官方的非党派、非赢利性组织，其资金来源于联邦政府，并将其给予各国反对势力，旨在全世界促进民主价值和体制。而国会同样鼓励总统在海外人权问题上投入。在对外援助法 116 款中，直接授权和鼓励总统将一定额度的经济援助资金“用于研究鉴定或公开实行那些鼓励和推行有关国家日益恪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项目和活动”。^④

最后，国会拥有权力监督和调查政府人权政策的执行情况。“国会有着三大不可分割的职能，分别是代表人民的权利、法律制定权和对总统和政府的监督权。^⑤国会对外交采取主

^① David P. Forsythe,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ngress Reconsidered*, University of Florida Press, 1988, p.113.

^② David P. Forsythe, *Human Righ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Congress Reconsidered*, p.180.

^③ 王芳：《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④ 王芳：《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

^⑤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商务印书馆，1999 版，第 363 页。

动的权力便是其监督和调查权。为了行使监督权和调查权,国会议员常常对一些人权问题举行听证会或展开调查以表示对人权政策的关注。在听证会上,官员和有关人权要向议员解释某项政策的情况,回答议员的提问。如1986年里根时期,国会两院成立了联合调查委员会,举行一系列的听成会来调查中央情报局在中美洲进行的秘密活动,揭开了政府没有向国会通报便非法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所得提供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内幕。^①审查国务院每年编写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同样是国会会对人权政策执行情况监督的重点之一。对外援助法第116条和502(B)条的规定,国会每年都要举行听证会审查国务院对于美国所援助的国家人权状况的报告。除了国会通过宪法规定的权力来对政府人权战略进行干涉外,还有其他的渠道,如议员公开发表言论抨击政府、向总统写信、通过媒体曝光等途径。国会对人权政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体制化、系统化的。

2) 国会和政府的权力争夺

虽然在从宪法规定的权力的角度看,国会在人权政策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能够对总统进行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但在现实中往往并不是这样,总统与国会的在人权方面权力的争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的实力也在不断增强。就像市场需要政府的权力一样,总统的在外交上也越来越被期望更多权力。经济危机条和世界大战给了总统诸多的机会,其外交上渐渐处于主动地位。这使得国会的观点往往得不到政府的采纳,甚至截然相反。总统主导的政府将浓厚的目的性、现实主义色彩、功利性融入到人权主张中,以“四大自由”动员国内参与战争,用“民主和人权”来对抗苏联,这反而丧失建国初期对人权的期望。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的出现,民众逐渐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国会借此逐渐找回其丧失的主动权,开始外交方面的复兴。80年代以后,在人权政策的成熟和执行阶段,总统和政府则发挥了主要作用,国会则在背后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存在。

虽然国会在人权外交上的发言权逐渐提高,但在现阶段总统仍然居于外交的中心地位。“国会并非软弱无力并不意味着帝王般的国会”,它在更像是二者中庸的结合。^②国会自身存在着诸多弊病:首先国会在外交事务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局面,往往难以察觉总统对其约束的规避,掌握着主动权的总统往往能够把握整个事件的发展局势。其次由于其自身的两党组成的固有模式,国会其内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不仅立法程序冗长复杂,而且主张缺乏预见。“在国会中没有一种声音,只有大多数人的意见”。最后,国会议员均分属于对立的两党中,作为一方党派成员往往更倾向于支持自己党派的总统,更加大了与总统抗衡的难度。总之,总统与国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两个强大机构,它们在人权方面的争论和妥协最终使得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持续的进行下去。

3) 国会中负责人权的机构

国会中负责人权机构比较负责,基本上涉及到人权方面问题,所有委员会皆有可能参与进来。而在这里则主要讨论关键部门。在正式机构中,分为常设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图

^① 熊志勇:《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第55页。

^② 周琪:《美国人权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0页。

3) 常设委员会的机构主要分布于参众议员的各种委员会中，而专门委员会则指国会立法成立的专门监督有关国家人权状况的委员会，包括欧安会和中国委员会(CECC)。^①这两个专门委员会与常设委员会的最大区别是，专门委员会仅行使监督权无立法权。^②而非正式机构是由议员自愿组成的公益组织，没有专门对其拨款，例如“人权小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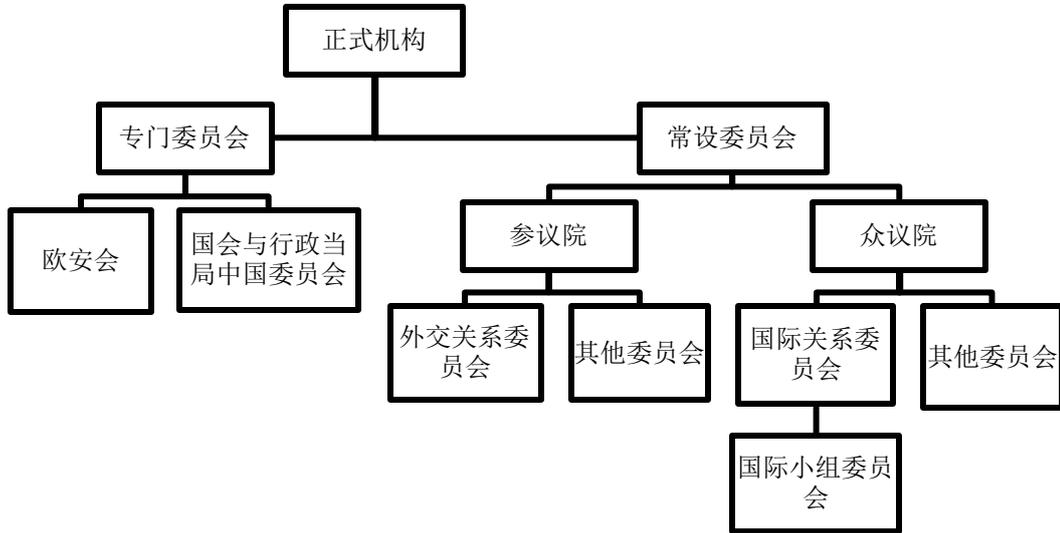


图3 国会负责人权的正式机构表

常设委员会主要广泛分布于参众两院的众多委员会中。对在参议院来说，其对人权并没有太过于重视，人权事务交由外交委员会一名工作人处理。^③外交关系委员会还下设了不同地区的专项小组来关注有关人权问题。此外，人权问题由于涉及到其他经济援助和安全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有关的委员会都会对涉及到人权的问题发表意见。与参议院相比，众议院对人权更加重视，也更加制度化。国际小组委员会作为国际关系委员会的部门主管人权方面立法。同时，国际关系委员会与参议院的机构相比在人权更能提出自己的主张，成员往往有丰富经验。该委员会的成员被戏称为“技术高超的艺术家、魔术师”，人们不知道他们的“把戏”。^④而在众议院任职的议员与参议院相比对人权问题更加关注，人权问题更容易形成自己的看法。专门委员会是专门负责人权的部门。欧安会全称欧洲合作与安全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东欧人权问题。而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则明显是针对中国所设立的机构。虽然专门委员会并无立法权，但能够及时督促参众议院相关委员会进行立法活动。

(3) 其他因素

受美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影响，除了总统与国会外，在社会上各类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都在影响着美国政府制定的政策的进程。利益集团往往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打着

^① David P. Forsy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p.520.

^② 王芳：《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

^③ 王芳：《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政策》。

^④ James A. Nathan and James K. Oliver, *Foreign Policy Making and American Political System*,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87.

“人权”的旗号，妄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作为沟通媒介的新闻媒体则在相当程度上为人权提供了一个决策的思想环境。最后，处于广大环境下的公众则通过选票等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人权主张。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美国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认为：“利益集团”是一个持有共同态度、向社会其他集团提出要求的集团。如果它通过和向政府的任何机构提出要求，它就变成一个政治性利益集团。”^①随着国家发展，利益集团逐渐成为美国制定战略不可忽略的因素之一。利益集团更多的是广泛分布在政府、群众、国会中，因而很容易施加影响。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有很多种，既有合法的，也有暗中进行的。合法手段如：通过总统或各部门的顾问委员会提交有关建议；参加或组织政府以外听证会以及特别咨询和合作等。不合法手段则包括邀请政府辞职官员加入利益集团以及贿赂等方式。除了以上方式外，还可以通过罢工或其他抵制政府的行动来间接进行。对于国会则主要通过国会委员会作证，支持自己人竞选议席或者游说以及提供赞助等方式。此外，利益集团还会通过各种的方式来动员公众对来影响国家的人权战略。

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权力”，其作用不容小觑。^②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信息流动的公开化和快捷化在现代美国政治活动中作用凸显。首先新闻媒体对于人权政策的影响可以通过传递信息的方式。例如劫机、绑架等一些突发事件中，往往只有新闻记者第一时间提供到详实信息。外交人员甚至是国家领导人也需要从媒体获取信息。其次，媒体还会影响到决策进程。在议程出现之前，媒体对于讨论内容的预测可能会使政府将其列入日程。媒体对问题的及时报道会促使政府快速做出反应，同时为政策提供一个宏观的框架背景。再次，媒体能够塑造舆论。通过邀请资深记者、知名专家学者对相关政策进行分析，提出建议，表达支持或者反对，媒体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执行。虽然在伊拉克战争初期，美国媒体一直配合政府支持战争，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在伊拉克阵亡，媒体舆论开始走反方向。《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七分之一的民众支持布什总统的言论，这对政府是极其不利的。最后则是“CNN效应”。^③它指的是媒体及时报道既能为各国领导人或当事人在危机条件下传递信息提供渠道又能缩短政府做出反应的时间。在北约开始轰炸南联盟后，CNN新闻中心24小时跟踪事态发展。CNN总裁曾自豪的说：“我们的镜头走到哪里，安理会就讨论到哪里。”^④

公众舆论对于人权政策也有着重要导向作用。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往往也是国内各种政治意愿和利益进行权衡后的体现，公众舆论能够反映美国各界人士对于正式问题的代表性意见，同时能够展现美国在国外的形象。作为政治决策的最底层，其对政策的影响往往是间接和模糊，但有以下几种方式能够表达意见。首先是民意测验，能够对公众意见进行科学的评估，

^①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274页。

^② 熊志勇：《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第116页。

^③ Warren P. Strobel, *Late-Breaking Foreign Policy: The News Media's Influence on Peace Operations*, USIP Press, p.4.

^④ 熊志勇：《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第116页。

并作为政策制定的参考。其次是选举投票，通过投票，公民能够表达出自己的意愿倾向。总统的候选人们往往在关键人权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当然，公众还可以通过集会、游行和写信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如在尼克松时期，公众通过抗议活动甚至是骚乱等方式来反对越南战争，致使政府不得不想办法结束战争。最后，新闻媒体同样是公众发表意见的窗口之一。虽然公众舆论的影响有限，但是在美国的环境下，统治者在做出重大人权决策时往往考虑公众因素。

通过总统、国会和利益集团、新闻媒体、公众舆论等方式，人权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历届政府出台的国家战略都格外的重视和利用人权。而也正是这样，人权在外交战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美国对外战略越来越离不开人权的支持。

五、结语

新世纪以来，美国为了达成新的全球构想，相继通过了《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不但声明了对于人权的重要性的关注，而且将关注点集中到了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亚洲地区。显然，中国已经成为了美国所要针对的主要对象。对美国来说，其人权战略在 21 世纪的今天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从本质上来看其内容仍然是霸权主义，它是美国独特思维模式和行动的体现，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增强其政治上的功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要把民主的潮流带进 21 世纪，使之成为人类的政治主流。”^①虽然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人权外交接连受挫，但美国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绝不会放弃人权外交。^②

在新世纪，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美国关注的首要目标，而中美关系也成为影响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中国而言，更要认真的处理与美国的各种外交活动。只有接触美国、了解美国才会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人权在其政策中发挥的作用，做到知己知彼，在应对美国策略时才能更加得心应手。尝试从人权的角度来认识到其对美国外交战略的作用，虽然并不能完全预测出美国真正的意图和政策走向，但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解和努力的方向，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化解，而不是引起误解和矛盾。对中国来说，从人权角度研究美国对外战略的制定对我国制定对外战略和对美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点评】

古今中外，人们天生有追求并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动机和渴望，人权有无保障随之也成为衡量时代进步、文明先进、国家发达、人民幸福的重要尺度。在当今国际社会，维护和保障人权已是一项基本道义原则。但是，在具体实践层面，对于人权的定义、保障方式及评

^① 李世安：《美国人权政策的历史考察》，第 294 页。

^② 吕其昌、张焱宇、王文峰：《美欲再提人权反华议案的特点和背景》，《现代国际关系》2000 年第 3 期，第 10 页。

价标准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分歧,甚至引起了严重冲突。人权定义的模糊性、操作的复杂性以及衡量的困难性给“权力优则强”的国家更是提供了施展手段的大好方式,美国对外政策中大打人权牌就是极佳案例。

《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一文先明确了“人权”的基本概念,随之论述了人权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结合和发展过程,继而指出了人权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指导作用和实践影响,这能够加深我们对美国人权外交形成过程和政策实质的认识。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马垚粮同学细致认真的写作态度、严谨的学术风格以及一定的学术创新能力,尤其是文章第三、四部分的分析十分出彩。这对于一名本科生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低年级同学应当努力学习之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也出现了一些瑕疵:一是文献回顾有一部分稍微偏离主题,二是第二部分的定义界定可以大幅删减以突出主题,三是文中出现不少绝对化、口语化和情绪化的语句。当然,总体而言,这是一篇非常不错的本科生佳作。我想,这种论文写作对于马垚粮同学今后的学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人权因素与其自身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软硬实力的无可匹敌是其实行人权外交的核心根据,西方意识形态所具有的一致性是其对外战略中大力推行人权外交的有利基础,人权衡量的双重标准及将自己视为榜样的先入姿态是其责难以及管制别国的惯用思维。看待人权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既要纵看二者在历史中各自发展和结合的过程,又要横看二者结合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不同问题领域内使用的尺度和频度。当然,不管怎样,人权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身影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是不会自行消失的,我们只有更好地提高警惕和更从容地做好应对。

[责任编辑:马刚 刘志]

[责任编辑:刘志]

阎学通

【编者按】阎学通是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坚定的现实主义派，在促进中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和预测国际形势等方面成果卓著。阎学通教授提倡站在现实主义角度、国家利益和民族整体的立场去思考问题。除关注大国崛起、国际形势发展、中国对外政策、国际关系理论、科学研究方法外，阎学通对中国古代政治外交思想也颇有研究。作为学者，阎学通治学严谨谦虚，敢于承认错误；作为师长，他认为比学术更重要的是“为人”。本期“国关人物”摘取、总结了阎学通教授关于国际关系预测和对中国古代政治外交思想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大家。

学者简介

阎学通，1952年生于天津，现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总编、《国际政治科学》总编；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科学评审专家；兼任《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研究》、《当代亚太》、《东南亚研究》、《当代世界》、《国际安全研究》、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美国)、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美国)、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加拿大)、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韩国)等杂志的顾问委员。



1982年，阎学通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获学士学位。1986年，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获国际政治学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82年9月至2000年6月，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历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主任等职。

阎学通著作颇丰，发表有关国际关系的论文和文章上百篇，其中部分论文发表在美国、英国、韩国、印度、日本等国的学术杂志上。其独著有《中国国家利益分析》(1996)、《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2000)、《国际政治与中国》(2005)、《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2013)；合著《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1998)、《中国与亚太安全》(1999)、《东亚安全合作》(2004)、《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5)、《东亚和平与安全》(2005)、《国际形势与台湾问题预测》(2005)、《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第二版)》(2007)、《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2009)、《中外关系定量预测》(2009)、《中国崛起靠什么》(2010)、《中外关系鉴览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2010)、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2011)、《构建天下有治的国际体系》(2012)、《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2013)、《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2015)；译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2003)。

一、阎学通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①

(一) 为何研究?

学者们对先秦思想中有关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展开。但第一个将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单独提取出来,对其进行系统化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人,非阎学通莫属。为何要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用阎学通自己的话说,是出于以下三个目标:丰富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深化对现实国际政治的理解、指导现实政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分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就对构建所谓“中国学派”情有独钟。对此,阎学通的态度是反对的,并写过专门文章加以批评^②。阎学通认为,科学的基本特征是客观、可实证、可公开。科学的这种性质决定了科学的理论必然是普世性的。先秦哲人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认识与现代人不同,但这并非是东西方的思想认识不同,而是对国际事务本质的认识不同。先秦时期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当时的一些认识仍可用于解释今天的现实,这说明当时的认识具有很强的普世性,与客观规律非常接近。因此,借鉴先秦的思想发展和丰富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包括将两者结合创造出新理论是可能的;反之,将现有国际关系理论视为西方理论,与之保持距离,执意建立与之不同的“中国学派”理论则可能劳而无功。

一些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间关系与现代国家间关系不同,因此所总结的经验缺乏现实适用性。对此,阎学通指出,虽然先秦时期的诸侯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③,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借鉴先秦思想来加深对现实国际政治的理解。事实上,不仅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有所不同,欧洲古代的国家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也不相同。然而人们从不质疑可以从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去汲取历史经验来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现象。该书记录的是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当代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却从中汲取了很多思想,并创建了成体系的理论。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政治与现代国际政治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体系同样是无政府性质(周天子形同虚设,周朝所制定的国家间行为规范对诸侯国行为的约束力还不如21世纪的联合国规范),国家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而没有一个能垄断军事暴力的体系力量。而其与古代欧洲体系和现代国际体系的差别,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新理论的条件,有助于我们修正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错误和弥补其不足。

在21世纪,中国面临着崛起成败的历史考验,世界则面临着中国崛起对世界可能产生的不确定影响。研究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指导当今的现实政策。根据先秦思想,中国崛起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战略目标,即建立王权还是建立霸权。前者将是一种相对

^①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阎学通:《借鉴先秦思想创新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

^② 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2期,第1页;Yan Xuetong,“Why Is There No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ies,”载于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第294-301页。

^③ 正因如此,阎学通在论述相关理论时并没有使用“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而是使用“国家间”(inter-state)一词,因为前者是针对民族国家而言的。

和谐的国际体系，后者则是一种常见的国际体系。同样，世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也有两种选择，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还是重复美国霸权式的秩序。王权和霸权理论，在阎学通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怎样研究？

传统上，涉及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可分为四类：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中国思想史研究成果、中国外交史研究成果和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然而，在阎学通看来，上述四类研究对先秦诸子关于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研究都做得不多。也正是从总结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异同的比较研究方法出发，阎学通展开了他自己的研究。他重点关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思想分析方法、国家间秩序、国家间领导权以及霸权的转移。受篇幅所限，本文仅以荀子为例，对这一部分研究进行简要介绍。^①

1. 思想分析方法

从分析层次来看，荀子的思想主要是体系层次的分析，但有时又夹杂着个人层次。他认为，人类社会是群体性的，因此没有等级规范管理就必然产生冲突，维持国家间的秩序就得建立等级规范。“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②但他同时又认为，国际社会的性质（王权还是霸权）取决于世界主导国领导人及其大臣的性质。“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③

从哲学观念来看，荀子是物质和观念的二元论者。他认为国家间的争夺源于主观欲念和物质不足两个方面。“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但同时，他又将等级制度视为影响国家间争夺的干预变量，认为没有等级规范，人们就要争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④

2. 国家间秩序

在对战争原因的认识上，荀子将人类的自私和缺乏等级规范制度两个因素视为战争的共同原因。“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⑤人的本性是恶的，为利益而争夺引发暴力冲突也是必然的社会现象。“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⑥但正义的战争却可以禁暴除害，“仁者之兵行于天下也。”^⑦

在实现和平的路径上，荀子认为通过制度规范（礼）对人的约束，可以实现和平。“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⑧

^① 具体内容请参见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② 《荀子·富国》。

^③ 《荀子·王霸》。

^④ 《荀子·富国》。

^⑤ 《荀子·王制》。

^⑥ 《荀子·性恶》。

^⑦ 《荀子·议兵》。

^⑧ 《荀子·王制》。

等级规范既能保证诸侯应有的权力,又能限制他们的权力范围,有了规范,诸侯就可以相互监督,相安无事。

3. 国家间领导权

先秦人士所说的“天下”与现在所说的“世界”在涵义上有相同之处:一是地理概念包括了天空下面的全部土地表面,二是内容限于人类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在“天下”与国家的性质是否一致的问题上,不同思想家有不同的观点。荀子认为,国家是一种政治权力,因此有无道义的人都能努力获得和使用;但天下则是道义权威,只有圣人才能享有和使用。“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①

而如何获得“天下”的领导权,则有王权和霸权两种方式。荀子认为王权和霸权都需要实力和道义这两种力量来维持,但前者主要靠道义,后者主要靠实力。维持王权的道义表现为王权领导人按道义规范采取行动,按法令规定判断事情。“王者之人,饰动以礼义,明断以类。”^②而霸权虽然主要靠物质力量,但没有最起码的政治诚信也维持不了。“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慕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③

4. 霸权的转移

先秦思想家普遍都认为,政治是国家总体实力的决定性要素。但他们对于什么是政治实力的核心要素的看法却莫衷一是。荀子认为,政治实力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的方针路线。政治路线能决定政府的前途,采取道义、诚信和权谋三种不同的政治方针路线,其结果将分别是王权、霸权和国家灭亡。“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④

先秦思想家普遍将国家间领导权转移的终极因素归结到君主的身上,但对于领导人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他们则有不同认识。荀子将国家治理成败和霸权转移归结为领导者的政治方针路线。荀子认为,政治路线确定后,必然会引导执政者的政策和人才选用,从而导致国家间领导权转移即随后可能发生的性质变化(王权和霸权)。“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之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之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之为之,则亦亡。”^⑤

(三) 有何启示?

^① 《荀子·正论》。

^② 《荀子·王制》。

^③ 《荀子·王霸》。

^④ 《荀子·王霸》。

^⑤ 《荀子·王霸》。

阎学通认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可以用来发展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现代国际关系理论普遍认为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结构(anarchical structure),即行为体功能相同,权力关系平等;而国内体系是等级结构(hierarchical structure),行为体功能各异,权力体现为上下级关系。与此相反,先秦思想家们则普遍认为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权力都是等级结构。如果我们将二者相结合,便会得出一些新的设想。例如,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关系既非上下级关系,也非平等关系,而是松散的等级关系。事实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的内外部权力关系也都是等级结构而非平等结构。联合国分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和普通会员国,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则依据股权的多少决定投票权。

先秦的思想家们非常重视主导国对于国家间规范效率的影响,而现代理论则强调制度对于国际规范效率的影响。前者强调规范是否得到遵守取决于主导国的模范作用,后者注重制度本身对于国家行为的约束力。如果我们结合两者,就可以从主导国性质的角度去理解制度规范内化的进程。根据先秦哲人在王权和霸权性质问题上的认识,王权具有带头执行国际规范和维护国际规范的作用,而霸权国则缺乏这种特点。考虑到克林顿的多边主义政策和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政策对国际防扩散规范分别形成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我可以假设,主导国提供的不同性质的领导,对于国际规范内化的方向和速度具有不同的作用。

阎学通认为,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可以为中国的崛起提供借鉴。而先秦诸子对于国家间政治的认识有些是对立的,“借鉴什么思想”便成为了当今研究人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如果借鉴“信立而霸”的思想,中国对外政策就会以维护战略信誉为目标;借鉴“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①思想,中国就会坚持依据国际规范的正义原则使用国防力量。反之,如果以老子无为思想为指导,中国是绝无可能实现民族复兴的。

借鉴先秦有关王霸性质区别的认识,中国崛起战略的对外政策需要从三方面区别于美国:一是推行责任与权力相一致的国际秩序原则,即国家根据实力大小享受不同的权力和承担不同的责任。二是推行反向双重标准原则,即越发达的国家要执行比越落后的国家更为严格的国际准则。三是推行东方传统的天下为一的开放原则,将现行的对外开放政策推广到国际社会。

二、对国际关系的预测和研究

(一) 对 2015 年重要国际关系的展望^②

阎学通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预测专家。他成功地预测了陈水扁上台、李登辉要推出两国论并将台独公开化。早在 1996 年,他推测中国国际安全环境会在 2000 年走入低谷。他对重要国际关系的预测往往出其不意但又是十分准确。作为对中国世界发展有重要节点意义的 2015 年,阎学通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① 《吕氏春秋·孟秋纪·荡兵》。

^②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在中国记者协会第 65 期“新闻茶座”上,中评社、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对阎学通教授的有关报道。

中美关系是当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展望2015年,阎学通认为,中美两国的综合实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实力相对上升、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态势不会改变;同时,其他国家与中美综合实力的差距将进一步加大,中美之外不会有其他有实力第三方出现的趋势不会改变。大国之间将重新寻求政治解决方案,彼此竞争将有所缓解。就备受关注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阎学通认为,中国把新型大国关系定位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可是现在看来,这三点没有一点能够做到,可以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可以预见,2015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也建立不起来。之所以不能建立,核心在于美国认为中国还不是能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因此不应该给予中国以平等的尊重。美国也不能接受中方提出的三原则,其中的第二点“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尤甚。在美国看来,中国应该尊重美国,但美国不需要平等地尊重中国。如果中国希望“新型大国关系”真正得到美国的承认,或许可以降低标准,把三条原则缩减为“不冲突、不对抗”一条原则。如此,中美才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定义上达成共识。有共同定义的时候,才有双方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意愿。只要有一方不愿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建立不起来。

对于广泛关注的乌克兰问题,阎学通认为,美国制裁不会改变俄罗斯立场。乌克兰事件是悲剧性的事件,解决乌克兰问题,关键在于相关各方达成政治和解协议,其中最主要的是乌克兰政府、东部民兵武装以及俄罗斯三方达成和解协议。但目前看来,三方都没有这样的意愿。“2015年乌克兰国内的军事冲突还将继续,直到双方都疲惫不堪,才有可能坐下来进行谈判。我不认为双方任何一方有可能在军事上能赢得这场战争”,阎学通说。出于地缘政治斗争需求,2015年美国仍然会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措施。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能解决乌克兰的问题,也不会改变俄罗斯的政策并使其做出很大让步。既然美国的制裁几十年来都没有改变古巴的政策,那美国的制裁能够改变俄罗斯政策的可能性也就令人怀疑。制裁虽会让俄罗斯经济受损,但也同样会对欧盟产生负面影响。未来欧美在制裁问题上的分歧会越来越大,因为乌克兰动乱对于欧洲国家的影响是直接的,而对美国并不构成什么影响,当欧洲国家感受到乌克兰内战对它伤害越来越大时,就会开始做出政策上的调整。

除此之外,中日关系也成为当今世界关注的焦点。阎学通表示,中日关系正在由“政冷经冷”转向“政冷经热”。2015年中日间政治关系的改变仍有很大困难,但双边经济发展将比去年有更多机会。中日间经济关系的改善,将促进中日关系由政冷经冷向政冷经热转化。2015年度,日本内阁确定的财政预算案中,防卫预算连续第3年增加,成为日本历史上最大规模国防预算。阎学通认为,中日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行动表明,双方都不希望彼此的政治冲突升级为军事冲突。这也可以部分地预测今年的东亚冲突会出现缓和或相对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为何会增加军费,通过史上最多国防预算,并开始筹备建立钓鱼岛防御部队呢?阎学通认为,安倍晋三必须制造中日间的政治对抗,保持紧张的地区环境,制造一个不完整的现状,才能说服日本人民接受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这是安倍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维持本地区的紧张和与中国的对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内

政的需要。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会继续在政治上与中国对抗，而在经济上与中国改善关系。

（二）科学研究方法^①

阎学通是我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倡导科学方法论和预测国际形势的著名学者。阎学通认为，对国际形势的正确预测源于方法运用的成功。他将自己新颖的观点、正确的预测方向归功于“利用科学研究方法找到了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其可能发展的方向”^②。在其著作《国际关系实用研究方法》中，他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的科学方法。在借用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同时，加入了大量的国际关系问题分析和论证的例子，从而把使用这些方法的情境、操作模式极为简易地告诉给大家。

一般来讲，研究方法可以分为科学的、宗教的、直觉的、猜想的和思辨的，这些方法都包括主观分析的环节，但与其他方法相比，科学方法更强调客观实证。从广义上讲，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的多种研究方法都归为科学方法；但是如果从狭义上讲，以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为科学研究方法的标准，则可以将科学方法与其他研究方法（如历史比拟法、简单经验归纳法、哲学思辨法等）区别开来。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序至少要包括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概念操作化、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几个环节。如果一种研究方法不包括概念操作化与实证检验这两个环节，这种方法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要保证研究过程与结论都可以公开检验，因此科学方法要求以共同规则确定标准，而没有相同标准就无法进行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属于科学范畴，因此，它们最基本的共性就是都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科学的方法可以解决很多其他研究方法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科学方法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变量控制是科学方法中分析影响同一事物相关因素之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与简单经验归纳法不同，变量控制不但可以发现与事件相关的要素，而且可以认清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科学方法可以深化我们对国际关系规律的认识。

2.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变化程度。

科学方法既可以定性分析，也可以定量分析。而科学方法操作化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定量分析。定量分析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发展方向，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的变化程度，而非科学的方法就难以做到这一点。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使我们的国际关系知识更加细化。

3. 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预测的准确率。

科学方法强调实证或实验，其目的在于提高结论的可重复性（即普世性）。而结论重复性的提高就增强了结论的可靠性，从而也增强了结论的预测准确程度。科学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我们对国际形势变化的预测水平。

^① 本部分内容，参考了阎学通：《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阎学通：《我这样预测天下》，《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

三、人物评价

在本部分,我们将与大家共同分享唐世平老师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唐世平老师以其独特的视角,描述了他心目中的阎学通。大师之间的评价,读起来总是令我们心生崇敬,至于其评价是否中肯,相信不同读者的感受自会有所不同。

我心目中的阎学通^①

今天我要谈谈我理解的阎学通老师。阎老师在学界的地位就不用我多说了,之所以第二个我要写阎老师,因为他是我刚到社科院工作后见到的第二个牛人。当然,我对阎老师也会有一点点批评。我以前也说了,我所要写的所有的学术感恩录中都会有一点点批评。

虽然很多人都很牛,但是我认为阎老师对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定程度上,他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阎老师是个很传奇的人。他博士期间研究的是发展经济学,或者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政治学,他的导师应该是 Carl Rosberg。Rosberg 在美国研究非洲的学者中是泰斗级的人物。

回国之前,我已经知道阎老师在国内学界非常有地位,所以特意把他的论文拿来看了一下,当时也没看懂。但我记得他的研究是比较肯尼亚与赞比亚的发展政策,挺有意思的讨论。阎老师回国以后就转入到国际政治(“华丽转身”呀!),他的第一本书——《中国的国家利益分析》,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应该说是一本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著作。在此之前,恐怕没有这样的著作吧。

但我觉得即便阎老师没有写这本书,而只做了以下的三件事,就已经足以让我们确信他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作出了持久和至关重要的贡献。我觉得,无论我们怎么评价,阎老师做的这三件事情都是功德无量。

三件大事:无人能替代

第一件事情是阎老师推动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方法论的发展(相信大家都知道)。从阎老师离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到清华后,他就开始推动这方面的发展。阎老师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而且在训练他的学生时也这么严格要求。这样大家就可以理解,他培养的一些学生如今在业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这是第一件大的事情,这使得那一代在北京受到训练的博士生要比在上海受到训练的博士生在方法论上进步很多,这也是我认为使得他们能够在业界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件事情是阎老师办了两个杂志——《国际政治科学》与《Chin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两个刊物并不完全一样,现在它们的内容基本上也是独立的。《国际政治科学》总的来说是沿着阎老师对科学研究的认识来做的,《CJIP》有时候也会出版一些偏政策方面的文章,但总体来说,它也是以学术进步作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政策影响为导向的。这两本杂志在中国的国际政治领域的刊物中是非常重要的平台。这些平台使得很多青年学者能够暂

^① 本文是唐世平老师于2012年1月23日发表于其个人博客“潇湘剑客”上的一篇文章,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4a734901010vh7.html,原题目为《学术感恩录之二:我心目中的阎学通》,本文引用时有删节。

时，或者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不需要追求政策性的影响，而是追求对研究的贡献，使得他们有了机会能够出版他们比较重要的研究。

第三件大事是“国际政治与政治学的共同体”，这个会按照国际上的ISA，或者是美国的APSA，或者是美国社会学年会的模式来举行。可喜的是，这个共同体越办越大，越办越好。我非常荣幸的参加了两次，而且以后我有时间我也会尽量参加。我觉得这个会议给了我们年轻人非常好的交往的平台，使得不仅仅是中国的国际政治和政治学，而且包括广义上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有了一个真正的比较学术的交往平台。而且随着会议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年轻学者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想这个对中国学术的成长肯定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这些晚辈都应该特别感谢阎老师。

如果没有阎老师去推动这三件事，很难想像会有别人可以如此出色的完成这三件事。能做成这三件事情，一方面是因为阎老师做学术研究的功力和水平。另一方面，阎老师很像张蕴岭老师，他们都是愿意折腾的人，愿意为学界的发展去努力，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才体现了学者的奉献精神。一个学者如果只写点东西、讲讲课，只是满足了做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阎老师和张蕴岭不仅仅做了他们分内的基本事情，而且真的是为学界的成长做了非常多额外的事情。这一点值得大家（包括我本人）极度的尊敬和认真的学习。

一点批评

如果说我对阎老师有任何批评意见，那就是我个人觉得他在推动方法论发展的时候有过多注重定量研究方法以及有让社会科学变成自然科学的冲动或嫌疑。

在强调方法论的时候，阎老师似乎更强调定量方法。这很可以理解。一方面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特别是国际政治研究，在定量和形式模型方面落后太多。【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定量的一些东西对在中国学习文科或者说社会科学的人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在中国一般认为学文科的人是学不好理科的人（至少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如此）。这种态度可能也需要改。社会科学不比自然科学容易，因此社会科学需要优秀的人才。】

事实上，定量当然是非常重要，我自己也非常重视定量研究，而且也在不断学习定量的方法，但是我们只强调定量是不太够的。实际上，定性研究也是非常难的，而且这方面的方法论进步也非常多。可是这方面的许多重要进步阎老师他们介绍的不多。这使得后来我在开会的时候发现，一些学生觉得定性研究很容易，以为随便拿一两个案例来说说就能解决问题。这肯定是不对的。

我相信阎老师也会同意这一点，即现在国际学界的一个趋势是研究者需要同时掌握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当然能将这两种研究方法掌握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研究者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但是这两种都是需要的。我个人觉得有些东西不容易被定量，而且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被量化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社会科学变成“(半)自然科学”，或者说是社会科学越自然科学越好。从社会科学哲学上来看，这样做肯定是不对的。我原来就提到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本质上确实是一样的，但它们确实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包括方法论上的不同。我觉得阎老师当时在推动定量（以及“科学化”，实际上是“自然科学化”）研究发展的时候，对这些社会科学哲学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后Popper和拉卡托斯之后的社会科学哲学发展）可能强调的不太够。这个我在其他地方也讲过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我相信大家都和我一样非常敬佩和尊重阎老师为广义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国际政治和政治学的进步所做的伟大贡献。我想，我们用“伟大”这个词来描述他的贡献是不夸张的。我们从内心感激阎老师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整理：宁鹏举、周 扬、彭宁楠]

[责任编辑：彭宁楠]

· · · · · · 公司外交 · · · · · ·

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面对全球化经营中的风险和挑战，必须依靠公司外交去预测、评估、规避各种风险。公司外交成为跨国公司必不可少的新职能，是公司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增强公司合法性，在遵守各国法律、制度和文化规则的基础上，同各国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众和个人之间开展的制度性跨国沟通和交流活动。就其形态而言，公司外交形成了游说外交、商务外交、社会外交三种主要运作机制。国内外学者对公司外交的内涵及特征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国公司和中国政府虽然也认识到了公司外交的重要性，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外交需要平衡公司目标与外交目标，确立公司与政府“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统筹好公司资源与外交资源，确立公司与政府“相互为用”的外交战略；协调好公司机制与外交机制，确立公司与外交“统筹协调”的外交机制。

资料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整理：周 扬、彭宁楠、宁鹏举]

[责任编辑：宁鹏举]

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①

[美]本杰明·J·科恩 [译]李天翼*

内容摘要: 本文对罗伯特·吉尔平、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约翰·科尼比尔、戴维·莱克和海伦·米尔纳在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五篇代表性文章进行了评述,本杰明·J·科恩将重点放在五位作者对行为体行为的描述和对国际体系状态以及管理等问题的回应,从而得出目前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不足之处。

对于受新古典主义传统影响的经济学家来说,“国际贸易”这一课题一向是棘手的。一方面,我们有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传承下来的,强调国家之间基于相对优势的潜在不同而保持开放的市场和不受限制的交换所带来的好处的理论。在另一方面,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局面却是,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就算未能完全占据支配地位,也总是异常猖獗。在经济学界我们很少能遇上这样实际观察的现象与理论研究中的原则如此不相匹配的状况。作为既有原则的忠实信徒,我们试图为前述现象寻找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最终我们却只能摊开手无奈地道:“这全是政治!”

让我们把视野转向政治学家。对于系统学习过国际关系理论和比较政治理论的学者来说,针对被传统经济学理论视作不合逻辑的行为和结果给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似乎要容易得多。对于他们来说,在原则上,政治就是一切——或者几近一切。

然而,贸易中的重商主义因素不应该是被谴责的反常的外生变量,更确切的说,应当是一个需要被解释的集中的和系统的内生因素。近些年来,政治学者们所著的探究国际贸易领域里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资料如潮水般涌现出来。

经济学家们可以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什么?这正是本篇文章所强调的问题。本文针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该领域里出版的五部代表性著作进行了评述。^②就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两位作者来说,他们已经因为自身的职业成就成为了声名显赫、受到广泛尊敬的高级学者。吉尔平的书作为一篇综合性的论文,涉及了包括国际贸易在内的许多方面,主要针对的是学术型的读者,而罗斯克兰斯的笔触却是遵循着一个更为流行性的脉络展开的,因此针对的是更一般的读者。对比之下,其他的三位作者——约翰·科尼比尔(John Conybear)、戴维·莱克(David Lake)、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相对地处于其职业生涯的前期并且其文章主要给予专家指导。在这三篇文章中有两篇,实际上,最初是博士学位论文。

* 李天翼,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3级本科生。

^① 本杰明·J·科恩:本篇文章受益于 Joanne Gowa、Stephen Krasner、J. David Richardson 以及两名佚名的推荐者的意见与建议,发表免责声明后可引用。

^② 通过关注针对这五部著作的评述,我当然不是指这就足够掌握近来国际贸易政治学中发表的广泛而多样的政治学文章了。没有任何样品可以做到那样的程度。但这五部著作的观点都是与近来国际贸易领域的主流理论相契合的,这为我们对于理论界的主要课题形成一个辩证的评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评述从将五篇著作置于总体的学术背景下展开。对贸易领域的政治学的研究形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更广泛领域的一个必需部分；与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对于国家间经济关系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的有关文章聚焦于与行为体的行为和体系管理相关的核心问题的一方或两方。研究议程的逻辑性将在接下来呈现。本文的两个中心部分的第一部分将关注上述五位作者对于行为体的行为是如何描述的，特别是要注意在对事件进行分析时所运用的分析层次以及主权国家的国家利益的准确定义。而文章的第二部分将阐述这些学者们对于国际体系的状态以及管理等问题的回应，以及贸易关系中包容冲突和促进合作等方面的说明。这篇文章将以我个人主要的意见和结论作一段简短的总结结束。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学术研究的标准领域出现，在英语世界里是一个相对比较近期的现象。近二十年以前，美国以及相似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几乎从不互相谈论其国际关系领域内研究兴趣的交叉部分，没能展现出苏珊·斯特兰奇所谓的“学术散光”（academic astigmatism）^①。据琼·斯佩罗称，这两个学科间深深的割裂应部分归因于19世纪自由主义强调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二元性的哲学遗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现代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是学科专业化而非学科交叉的冒险。^②当然也有例外，但大多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评论员以及传统西方学术主流之外的其他流派。在主流学术界，很少有人会挑战或质问描述社会科学特性的“学科轨道视野”^③。

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经过不懈的努力，国际经济和世界政治两个学科之间才架起了桥梁，而这些努力与冷战结束、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现经济衰退的征兆以及贸易体制的建立等现象相一致。在经济方面的先驱研究诸如理查德·库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和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和货币》，以及赫希曼的再世经典《国家力量和对外贸易结构》。^④在政治方面有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罗伯特·吉尔平，史蒂芬·克拉斯纳以及彼得·卡赞斯坦等的富有创新性和想象力的研究成果。^⑤在十年的时间内，国际政治经济学就发展成为学术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和蓬勃的学科。在二十年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在西方学术圈得

^① [英]苏珊·斯特兰奇：《英镑和英国政策：对一种衰落中的国际货币的政治性研究》，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3页；《国际经济和国际关系：一种互相忽视的情况》，《国际事务》1970年第46期，第304-315页。

^② [美]琼·E·斯佩罗：《国际经济关系里的政治学》，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85年版。

^③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体系》，载于C·弗兰德·伯格滕：《国际经济秩序的未来：一个研究议程》，列克星敦：美国D.C.Heath & Co.出版公司1973年版，第115页。

^④ [美]理查德·库珀：《相互依存的经济：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纽约：麦克劳希尔出版社1968年版；[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权力和货币：国际经济的政治和国际政治的经济》，纽约：珀尔修斯图书集团基本书局1970年版；[德]赫希曼：《国家力量和对外贸易结构》，伯克：加州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

^⑤ [美]罗伯特·基欧汉，[美]约瑟夫·奈：《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和相互依存：转变中的世界政治》，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7年版；罗伯特·吉尔平：《未来的三种模式》，载于C·弗兰德·伯格滕和劳伦斯·B·克劳斯：《世界政治和国际经济》，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0页；罗伯特·吉尔平：《美国力量与跨国合作：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纽约：珀尔修斯图书集团基本书局1975年版；[美]史蒂芬·克拉斯纳：《国家力量和对外贸易结构》，《世界政治》1976年第28期，第317-347页；史蒂芬·克拉斯纳：《保护国家利益：原材料投资和美国对外政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德]彼得·卡赞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发达工业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到坚实的建立,特别是在政治学家间以强调正式的市场一体化和国际事务研究领域的政治分析的合法研究专业而存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议程大部分聚焦于两个宽泛层面的问题。一个层面与行为体的行为有关——特别指政府行为,自从国际体系中的基础权威组织建立以来,主权国家就一直遗留了下来。什么在影响着对外经济关系中的政府行为?如何给出最佳的解释和分析?另一层面是体系管理——应对经济相互依存所带来的结果。国家行为体是如何管理(或失败地管理)冲突的?而又是什么决定了在达成共同目标时国家行为体之间是合作还是不合作呢?回答这些问题的方法很多,同时取决于学者个人的专业素质以及分析考虑之下的明确的热点领域的本质。国际贸易的确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的热点领域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

政治学家在对贸易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并不孤单。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被知识进步所激励着去更多地关注贸易领域中的政治方面。但就绝大多数而言,经济学专业的学者选择关注两个相当狭窄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行为体的行为有关。一个问题是,对国内公共选择理论在国际领域的延伸的反映需要处理单个国家对相互的工业结构的保护。在这一领域,对于所谓的“内生”贸易政策的研究大多都为经验主义和定量分析,这些研究多寻求对由于提供的进口保护的水平和政府间协商的贸易自由化的程度的不同而导致的我们能够实际观察到的不同行业间的标志性差异进行解释。^①另一个问题是,对工业组织理论在国际领域的延伸的反映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发展相关。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最初采取抽象的理论形式,主要聚焦于国际市场中的垄断元素(诸如经济规模,产品鉴别,寻租行为等)的假设,这些假设主要建立在传统的自由贸易案例的完全市场模型的基础上。^②近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的发展已在本杂志中J·戴维·理查森的一篇文章中呈现。^③

相比之下,政治学家的贡献更加多样性,他们的研究同时涵盖了行为体的行为以及体系管理两个方面诸多问题的广阔外延。正如所表现出来的,本文所评述的研究样品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些书中的莱克和米尔纳的两本著作,最初是与单个国家商业政策的制定相关联的,

^① [美]J·J·平卡斯:《压力集团和关税壁垒》,《政治经济学杂志》1975年第83期,第757-778页;[美]理查德·E·卡夫:《政治选择的经济范式:加拿大的关税结构》,《加拿大经济杂志》1976年第9期,第278-300页;[美]罗伯特·E·鲍德温:《美国战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纽约: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出版社1976年版;[美]E·J·雷:《美国和外国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81年第63期,第161-168页;[美]R·P·拉维尼:《美国关税的政治经济学:一个经验主义的分析》,纽约:美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罗伯特·E·鲍德温:《美国进口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为了全面的理解这些研究,尽管简短,可以参考罗伯特·E·鲍德温:《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载于罗纳德·W·琼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研究》,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194页。

^② 这方面的最新研究可以参考G·M·格鲁斯曼和J·戴维·理查森:《战略性贸易政策:事件调查和最新研究》,普林斯顿:国际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若需要更实用的概括,可以参考下列文献:埃尔赫南·赫尔普曼和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而指导性的文章可以参考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和新国际经济学》,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罗伯特·M·斯特恩:《变化的世界经济中的贸易政策》,哥伦比亚: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③ [英]J·戴维·理查森:《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1990年第44期,第107-135页;克劳斯·施德曼:《工业国家间的政策竞争:我们可以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范式中了解到什么?》,《国际组织》1989年第43期,第73-100页。

而剩下的三本都更关注影响全局性的冲突与合作事件。这五本书中的每一本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分析重点。

罗斯克兰斯提供的大概是最宽泛的重点：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分析。在罗斯克兰斯看来，现在的世界徘徊“在两个组织国际关系的基本不同的范式之间……一个领土的体系……以及一个海洋或贸易的体系。”^①领土体系由专注于权力积累的国家构成，被界定为国土：“领土越大，权力越大。”^②贸易体系由专注于经济发展的国家构成，被界定为消费标准的进步以及高生产率资源的分配：“进步通过国际贸易的途径维持。”^③这本书的主要论点采取了一个长远的历史性观点，即现今国际关系中贸易体系的一个重大成就能够成为维系未来世界和平的最有可能的保障。

吉尔平，也提供了一个宽泛的焦点。他对于“接下来的数十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演变”^④的分析强调了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比罗斯克兰斯的论述有着更为条理化的理论内容。对于吉尔平来说，其中心论点是战后秩序中美国经济领导权的下降：“美国以及其自由秩序的概念已经统治了整个战后时期，随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弱以及有着不同合法性的经济力量的发展，自由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威胁。”^⑤在贸易关系中，这意味着一个结合了多元自由主义以及经济国家主义和区域主义的混合体制的出现，从长远看这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影响稳定。^⑥

科尼比尔的目标是通过一个建立在小型博弈结构基础上的理论模型的发展来“提供一个对贸易战争的描述”。^⑦有一类关于博弈的进程和结果的假说是发展完善的而且被应用于六个历史性事件，涵盖了中世纪晚期的英国商会贸易战争到20世纪60年代美欧的“鸡肉战争”。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对一个一体的分析框架的需求将帮助解释“为什么贸易冲突（包括贸易战争）会发生，它们又如何被恶化成为一个大危机，以及在冲突发生时一方所被期待做出的博弈行为的类型有哪些。”^⑧

莱克的目标也是为了提供一个一体的分析框架，即使对于他来说分析的重点是国家间政策的决定而非国家关系的演变。一个“贸易战略理论”，在其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都被看做国家政策制定“合理”而有效的指示，是发展完善的而且还被用于阐明1887-1939年美国的商业政策。^⑨在莱克看来，国家的贸易利益和政治选择最终是由国际经济结构中的限制与机会所决定和影响的。“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并不仅是国内政治压力的结果，而且还是寻求自我利益的民族国家为改变国际结构而深思熟虑之后的回应的结果。”^⑩

^① [美]罗斯克兰斯：《贸易状况的发展》，第16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3页。

^④ [美]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5页。

^⑤ 同上，第228页。

^⑥ 同上，第408页。

^⑦ [美]科尼比尔：《贸易战争》，第9页。

^⑧ 同上，第265页。

^⑨ [美]莱克：《权力、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第2页。

^⑩ 同上，第3页。

最后,和莱克一样,米尔纳特别关注个体国家贸易政策的制定,但更强调莱克的分析中不予考虑的国内政治压力。特别地,米尔纳强调共同的贸易偏好这一因素是被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变化所影响的,同时她比较了20世纪2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不同工业间的偏好形成和政策制定。对米尔纳来说,“相互依存的结果对国家来说是国内的:它们影响国内社会行为者的政策偏好,并非国家的政策指示。”^①

有了这些多样化的研究,你会发现研究中大量有争议的论点与许多有着共识的领域两种情况的共存就几乎不会让人惊讶了。但对于还没能习惯政治学家之间的争辩的经济学家来说,情况就会相当令人困扰。我们如何得知什么是被政治学家们的共识所接受的,既然(在任何一个学科)这都是未经陈述的,我们如何在不同的观点中做出决断?既然(对于所有的社会科学)经验主义的证据都是具有不确定性,那我们究竟能学到多少?既然某些贸易政治经济学的见解在同类的经济学家的工作中也能够得到,那么在给出这些问题的回答之前,在本文的篇幅内对关键的分析性问题再做一个进一步的全面了解是必要的。

一、行为体行为

两个与行为体行为有关的事件充斥在政治学家的研究中:它们分别是如何最佳地解释或分析一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以及究竟是什么在基础性地促使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做出行为。前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牵涉到类似地在适当的分析层次中选择的问题。而后者是一个更为概念性的问题,牵涉到如何准确定义主权国家利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包括了足以对分析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至关重要的学术判断的问题。

(一) 分析层次的选择

要试着理解一国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政治学家分别拥护三种可供选择的分析“层次”,每一种都与肯尼斯·华尔兹国际关系研究中著名的“意象”理论相一致。^②也许其中最为流行的是体系层次(或结构层次)分析方法,与华尔兹的“第三”意象类似,该分析层次关注的是主权国家本身,主权国家作为一个理性的和单一的行为体,是研究中最基础的单位。体系层次方法的方法论价值是为了分析它将国家偏好作为常量(外生的)而不是变量(内生的)。因为自我利益可能被假定为特定的和不变的,因此讨论就只能聚焦于源于广阔的国际关系结构中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刺激行为,正如华尔兹最近所描述的一样,是“由外到内”地研究的。^③

反之,行为当然也可以被“由内到外”地研究,要关注国家的国内结构而不是完全关注于其外部环境。这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剩下的需要被发掘的方法的目的。更佳了解(Better known)是单位层次研究方法,与华尔兹的“第二”意象类似,该方法将注意力放在政府内外的全部行为体的战略互动,以及其对一个国家对外行为实际或潜在的影响上——简

^① [美]米尔纳:《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第292页。

^② [美]肯尼斯·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

^③ [美]肯尼斯·华尔兹:《世界政治理论》,雷丁:艾迪生-韦斯利出版社,1979年。

而言之，就是外部的经济政策偏好在国内的政治和机制基础。认知层次的分析，尽管不是耳熟能详人人皆知，但并不意味着该方法不重要，该分析层次类似与沃尔兹的第一镜像，以共有的知识为基础，也可以理解为是在单元的层次上将决策合法化的一种“经济文化”。^①

实际上，在大多场合，单位层次和认知层次分析方法都可以被纳入国内层次分析的单一领导之下，即与体系层次分析方法相对比的方法。国内层次分析和体系层次分析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其吸引力都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类型的分析都不足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中所有的国家行为。甚至尽管支持着一个或另一个层次，大多数政治学家也承认每一种方法在作为一个正式的分析框架时都不是完全最佳的。

举例来说，科尼比尔和莱克都更喜欢采用体系层次分析方法来发展其理论范式。但二者都明确地纳入了国内政治和认知因素作为对国家行为的补充影响。相反地，米尔纳强调对外政策制定中国内层次的政治压力扮演着核心角色，但是她也通过在其分析中针对经济依存程度的变化所指派的角色来正式地承认体系的影响，这与彼得·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意象”相类似。^②真正的焦点不在于一种或另一种分析方法就其自身而言是否是完善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两种都不是。相反，焦点在于思考在国内层次或体系层次与变量相关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这些变量是如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在这点上，对于指导经济学家或其他人几乎没有占优势的共识。

实际上，对于吉尔平和罗斯克兰斯，争论几乎不存在。尽管二者都只是偶尔提及了国内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假定影响，但每一个都十分清楚地在阐述中将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是最为方便舒适的。对于其他三位学者来说，争论存在但被置于一个非正式和非结构性的方式下。科尼比尔和莱克都仅指出体系层次分析的卓越性，主要基于其简单性，并没有让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国内政治和认知因素必须被归于解释国家行为中第二重要的地位上。他们两位都引入了国内层次的变量，如寻租（科尼比尔）或政府间的交涉（莱克），以帮助解释背离其设定的代表性结构模型中偏离预期的情况。但是他们都没能解释为什么不能用另一种方法（正如大多政治学家所做的），即先以一个特殊的国内范式，然后在需要的时候补充体系层次的变量。^③相反地，米尔纳支持国内层次分析方法的集中性但却未能在政策的内部影响与外部影响之间建立联系。在她的研究方法中这两种分析层次的关系仅仅被点对点地列举出来。

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将国内层次和体系层次的变量同时考虑在内的方法，而不是一个一个考虑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要能指出任何互动都可能所有相关的变量的严密作用下。实际上，这将意味着不仅在抽象的模型构建中有了更系统性的努力，而且在适当的经验主义测试

^① 为了更好地理解认知层次分析方法，可以参考保罗伊根·罗里奇：《经济文化和对外政策：经济政策的认知分析》，1987年第41期，第61-92页。

^② [美]彼得·A·古勒维奇：《颠倒的第二意象》，《国际组织》，1978年第32期，第881-912页。

^③ 这两种分析范式的相对优势是政治学家之间的一个热议话题。例如，对照的评论可以参考[美]彼得·卡岑斯坦：《权力与财富之间》，第12-15页；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学中的合作与冲突》，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6页。

中有了更好的用处——既是缜密的结构性事件研究又是更正式的统计方法——去评判与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相关的假说。当然多元回归技术能带来更大的用处，延展了近年来经济学家们以及偶尔地政治学家们对外贸政策问题上所做的研究工作的类型。^①或者在一个线性概率模型中回归技术的适用性被其内在的问题所限制的情况下，很可能采取另一种更为复杂的工具诸如判别式分析法、概率值分析法或逻辑分析法，甚至是实验模拟法。尽管这些方法并不典型地被应用于商业政策的研究中，^②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在解释不同政府间交换率安排的选择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③原则上，这些方法能有效检验一些将国内层次和体系层次分析方式涵括的假说，例如，米尔纳所强调的利益集团的类型或是莱克所强调的国家战略考量。

必须承认的是，在运用经验主义检验时的确存在大量的实践困难——特别是正式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就这一类问题而言。尽管过去已进行了对内部贸易政策的研究工作，但是有效运作许多被演绎理论定义为关键变量的工作仍旧极其困难。由于充分改进和分类的数据的缺失，分析师必须运用间接测定这一通常可以支持不止一种假说的方法。然而，如果分析师能够在分析中对不同层次的因素的相对作用以及其关系的本质达到更系统化的规格，那么沿着这条线的更深研究就不在话下了。更多的对国家行为的有力解释将会出现。

（二）国家利益的定义

与分析层次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便是对国家利益如何准确定义的问题。是什么在基础性地刺激着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政府？它们将实现什么？用一个更为正式的表述便是，什么是国家的序数偏好？其效用函数的争论是什么？

这些问题显然是与分析层次的问题相关的，就其意义而言，分析方法的选择至少大体地预先裁定了政府可能会视作是相关的目标的范围。一个被假定为会对国内政治压力作出回应的国家在逻辑上会存在一个与被视作单一行为体的国家所十分不同的序数偏好。但这两点并不相同。甚至仅仅被视作单一行为体的国家对于不同的效用的概念也会存在潜在的回应。国家利益的定义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它正是国家所“考虑”的基础。

在这个更为概念性的问题上，政治学家的确有一些要教授给经济学家的东西。毕竟，经济学家在遇上有关利益问题时免不了心胸狭窄，这也展现出了他们的职业倾向。对于任何一个接受过新古典主义正统理论训练的人，效用仅仅是凭直觉地被定义为经济福利——一个与为了最终的使用而可获得的物品和劳务的数量所同义的词语——而把所有其他可能的价值和目标排除在外。^④当消费者寻求其消费的最大化时，生产者寻求其净收入最大化以拥有最多的物品和劳务。以至于在将国家看作一个整体的情况下，只有假定政府追求经济福利最大

^① 约翰·A·C·科尼比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税保护：一个横向和纵向的交叉分析》，《国际组织》1983年第37期，第441-467页。

^② 一个例外是鲍德温：《美国战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在其中他运用了多元概率值分析方法。

^③ 例如，H·罗伯特·海勒：《选择一个交换率体系》，《金融与发展》，1977年6月。

^④ 关键的词语是“仅凭直觉的”。这不是指经济学家对扩宽其传统的文学评论资料的效用分析来囊括入其他利益或目标的潜力毫无意识；这仅仅指他们一贯不倾向与那么做。一个被频繁引用的理由就是正式量化除真实工资之外的其他价值的困难性。

化才是符合逻辑的。一个国家仅有或应有的利益为其社会获得最大可能的收入。其他的一切，在经济学家眼里，都是非理性的。^①

这奇怪吗？之后，经济学家们发现国际贸易这一课题的内在是如此复杂。各种各样的研究路线被遵循用以解决国际贸易政策领域中继承的原则和实际观察的现象之间明显的不一致问题。一些经济学的理论家已经在为贸易保护主义可以被视作在逻辑上与追求全球收入最大化所一致的举措寻找论据，例如传统的幼稚产业论据，它倡导将临时性的贸易限制作为一种对世界效率产能产生新添加物的手段。其他人则关注国家层面的与收入最大化相一致的论据，例如著名的最优关税争论，它表明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垄断或独有垄断权力的国家可以依据其优势调整其贸易模式并且因此可以从贸易中获得更好的收益。当代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说明采取了同样的路线，主张在现在的非完全竞争市场中，政府可能会运用贸易政策来从国外到国内的公司攫取利润（垄断租金）从而提高本国工业的竞争地位。到目前为止有些人已经为民族国家内的特殊集团的收入最大化寻找到了合理解释，正如对内部贸易政策的研究。但显然没有任何一条研究路径能够做到论证得极其让人满意。正如莱克冷幽默地评论，“经济学家们努力使现实世界的贸易政策符合其模型，但只能获得有限的成功。”^②

然而问题也存在着。很显然，利益的清单越长，分析也就越复杂。现实主义获益了，但是以精确和严谨为牺牲。政治学家对这个问题的传统回应是将大多或者全部的激励置于可以掌控全局的领导权力之下，这被视作是应对各种目的的唯一方法。权力，这种能够影响结果的能力，成为政府放之与财富一起考虑的事物，是对收入最大化的粗略表达。这恰好与吉尔平在十年半前定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为“为追求财富和权力国际关系中相互和充满活力的互动”相一致。^③正是这种权力的利益，内在地表现为一种政治习惯，为经济学家们所长期忽视。

然而与国家财富上的利益相关的权力上的利益究竟有多重要？以及这两种激励是如何联系和互动的？再一次，作为对经济学家及其他学者的指导，政治学界同样没有形成占优势的共识。对国家效用函数中这两种激励的重要性程度的意见相当不一致。这两个目标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被视作是非正式的，最坏也是特别的。这提醒权力也在起作用，经济学家可以从中获益。但是除此之外，经济学家究竟能从遵循着不同研究路径的政治学家的评论中了解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什么知识，仍旧不是完全清楚的。

科尼比尔例举出一种方法，简单地效仿经济学家，将收入最大化明确为政府政策中的唯一客体。在科尼比尔的理论模型中，权力仅仅是工具化的而且就其自身来说并不算一个目标。国家被视作单一行体与熟悉的微观经济分析中个体的逐利公司高效等同。在这一方面，他的体系层次分析范式与经济学家战略性贸易政策模型并无不同。

还有一种方法被罗斯克兰斯例举出来，通过在实质上将权力和财富这两种目标分别分配

^① 当然也有例外。一个早期的（很不幸地被忽视的）例子，哈利·约翰逊：《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经济理论，关税协商，以及关税同盟的形成》，《政治经济学期刊》1965年第73期，第256-283页。

^② [美]莱克：《权力，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第20-21页。

^③ [美]吉尔平：《美国的力量和跨国公司》，第43页。

给不同类型的国家而简化了这个问题：领土型国家寻求权力，而贸易型国家追求财富。他也承认，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并非绝对的。尽管“防御和领土不是国家所唯一关心的事，”他争辩道，“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完全忽视其领土防御而且只依靠贸易来维持生计。”因此“每一个国家都设法获取防卫并且从事一定的贸易。”^①然而国家之间的类型区分太过困难以至于罗斯克兰斯的限定表示实际上是徒劳的：“无论何时何地国家总是决定了强调一种方案或是另一种……国家之间的不同主要是一些国家主要依靠军事力量并且只是附带地参与到贸易中；而其他国家依靠贸易维持生计并且只在应对不测事件时使用防御能力……一些国家主要为贸易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却是对权力和领土最大化的追求者。”^②这样一种方法对于那种只强调对财富的追求而忽视权力这一目标的范式是一个改进，但它仍然离每个国家都能被合理地假定为对权力和财富同时都有野心这一现实相距甚远。

解决之道当然是得将两种目标都包括进假定的个体政府的效用函数中并且将它们视作是密不可分地联系着。这是政治学家间最典型的方式，被吉尔平和莱克例举出来，他们都强调国家对权力和财富一视同仁。^③当今贸易政治领域，几乎没有学生会加入到科尼比尔在对国家利益定义的问题上仅仅强调收入最大化，这一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重传统的自由主义相一致的分析中去。但也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完全认同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最具特征的对权力积累的独有专注。自由主义表示所有的国家都是如罗斯克兰斯假设的贸易型国家，只考虑贸易中的绝对利益，对于其它达成的收益非常冷淡。相反地，现实主义假设每一个国家都是罗斯克兰斯假定的领土型国家，在众多利益中最重视相对利益（地缘优势）。实际上，这两种角度都需要，正如罗斯克兰斯和莱克所声称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可以被假定为在政策制定者心中和脑海中持续地竞争。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仅仅是承认这两种关键目标之间的联系与重要性，而且还要讲清并正式定义两者的关系——来提供一个清晰而系统化的视角引领我们进入对二者在不同政府的序数偏好中是如何功能性地适应彼此的思索。对给定的国家，它们对绝对利益和相对利益到底有多关心？在多大程度上这些利益被视作代替品而不是互补品？它们之间的权衡取舍是什么？还有怎样以及为什么这些权衡取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再一次，对于抽象模型的构建更系统化的努力以及对细致严谨的案的研究更好的运用或更正规的统计程序能帮助构想和评估可供选择的假说。明确解决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间有争议的讨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该争论围绕着远比贸易领域的政治经济学范围更大的话题，而这话题实际上和国际关系研究本身一样久远。但对这一领域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确有责任来为他们的讨论构建尽可能多的正式框架，如果他们想要明显增进我们对贸易政策之后的激励的理解的话。

^① [美]罗斯克兰斯：《贸易国家的发展》，第8、17、30页。

^② 同上，第17、30、62页。

^③ 参考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32页；莱克：《权力，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第22页。这个领域里常被引用的典章有雅各布·维纳：《权力对财富作为十七和十八世纪对外政策的目标》，《世界政治》1984年第1期，第1-29页。

二、体系管理

除了个体行为体的行为问题之外就是体系管理的问题,即国家是如何通过集体行动来保护其贸易关系中的相互利益的问题。经济学家对于这一问题还需要了解很多,因为他们自身很少花时间去研究国际经济结构中的治理问题。对于大多数有着新古典主义信仰的经济学家来说,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仅仅是市场驱动的专业化以及全球劳动力分化的特定和自然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留给世界政治领域的学生们去系统探究那样的依存是如何维持和保护的问题——即冲突是如何被解决而合作又是如何被促进的——在缺少对国家内部政府扮演的“执政官”(引用了亚当·斯密的话)角色的合法的替代品的情况下。^①通过贸易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论文不断涌现这一情况,政治学家已经毫不犹豫地奔向了这个学术挑战。

典型地,政治学家来论述体系管理问题的两个方向之一是“仰视”分析,该方法研究体系作为个体行为体进行政策选择的整体的各种结果;或者“俯视”分析,该方法关注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在被组织的过程中,单一行为体可能做出的各种结果。^②科尼比尔和莱克提供了前者的例子,他们都引用了博弈理论的工具来分析贸易国家间的战略互动的进程和结果。吉尔平给出了后者的例子,他用利益机制理论的元素来将注意力直接放在国家间持续的商业互动在怎样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环境中能够被引导和安排中。经济学家们需要从两种方法中学习更多,尽管这里也有由于对关键的分析要点的共识的缺失而导致的限制。

(一) 仰视分析

博弈论的道理,正如邓肯·斯内德所指出的,可以通过至少四种不同的方式被应用于国际关系的分析当中:作为象征,类比,模型或者理论。^③最为普遍的是作为象征和类比的博弈结构的运用,主要是试图强调不同类型的实体或互动间的相似性或不同点。如此的应用无疑具有启发式的价值,它们能帮助提供视角或引发思考,但它们也由于其对误解或误用的易感性而内在受到限制。更有企图的是将博弈结构作为模型和理论的运用,这试图提供关于不同形势下行为体行为的系统和普遍的主张。这些形式的运用已经被科尼比尔和莱克所实现。

对于科尼比尔和莱克二人来说,博弈模型提供了一个定义和区分不同策略设置的简单手段。每一种设置都被其自身的结构或结果的模型以通常的术语所描述,以及被理解为代表着对在可供选择的策略间抉择的各方的序数偏好。反过来,每一个结果模型又会导致对个体国家的核心决策者的不同的刺激与遏制。在科尼比尔的方法中,其直接应用包括著名的囚徒困境非合作博弈、猎鹿博弈和懦夫博弈。在莱克的方法中,源于标准变量加总模型的四个相对更陌生的结构被视作和归为“霸权主义”、“双边机会主义”、“多变机会主义”以及“单边机会主义”。在两人的方法中,国际层次的策略设置的本质成为国家层次的战略选择的最

^① 一个主要的特例是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政府和国际贸易》,普林斯顿:国际金融分部 1978 年版。

^② [美]罗伯特·爱瑟罗德和[美]罗伯特·基欧汉:《在无政府状态下达成合作:战略和机制》,载于肯尼迪·奥耶:《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52 页。

^③ [美]邓肯·斯内德:《国际政治的博弈论》,载于奥耶:《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第 25-27 页。

终决定因素。

显然,我们可以从与条件或“据情况推测的维度”^①将会引发贸易关系里的冲突与合作的形式相关的应用中了解到不少东西。举例来说,两种方法的关键视角,是国家的相对规模在决定谈判策略与结果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但这些应用中所固有的是必须被指出来的截然不同的限制。简约模型和动态机理模型的基础分析结构与被科尼比尔和莱克构建的模型一样是关于行为体行为相对“有力”和精准的假说。然而,它们却不可能是这些作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普遍。

正如每一个严肃的博弈理论家所明白的,限制存在于博弈论本身的方法论问题上。有两个问题特别突出。一个是被科尼比尔和莱克所支持的被置于重复形式下的多元机制博弈模型的可能性问题。当然,将贸易关系视为一个持续而不是单一运作的互动并非不适当的。但由于随着时间变化关键变量经常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例如博弈各方的数量,收益的幅度,信息的可获得性,博弈各方贴现率的规模——重复进行的博弈被普遍认为是很不靠谱的预测工具。正是基于这一点理由,两位作者的政策互动都不被认为是绝对明确而清楚的。

甚至一个更为批判性的问题是著名的明晰参与者的激励问题。这样的博弈模型仅从其自身被构建的假定上被看作是正确的。一旦所有参与者的偏好是已知并被详细描述了的话,他们会提供一个关注个体参与者可能做出的策略选择的视角。然而,正如米尔纳所正确地察觉到的,博弈论中并没有本质的逻辑告诉我们所有结果的结构是如何在首先就被决定了的。^②本质上来说,博弈论在最初地激励着参与者这一问题上静默的。最初的序数偏好仅被假定为是外生性地——也就是说,武断地——被决定的。这一点是大家都清楚的,即标准越武断,结果越不普遍。^③这一点已经很好地被科尼比尔和莱克对于更广泛的系统性考虑在“大”国的贸易策略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如果曾有的话——这一问题的截然不同的观点中所详细说明。科尼比尔从最优关税争论中获取理由,认为大国是自私和一意孤行的,会更偏好于贸易限制,甚至有发生毁灭性贸易战争的风险。^④莱克有相反的主张,他认为大国也“拥有自愿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激励,出于构建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的目的。”^⑤由于投入是如此不同,那么在产出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会令人惊讶吗?

博弈理论几乎会对激励的内在静默造成任何分析都会遇到的障碍。特别是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在对国家是如何定义其利益这一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的情况下,问题更为突出。科尼比尔和莱克对于体系层次分析方法的偏爱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假定博弈论的基本前提以及其简化的前提即所有的行为体都是单一和理性的并且有不变的效用函数。这也是大多数研究世

^① [美]肯尼迪·奥耶:《解释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假说和策略》,《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第1-24页。

^② [美]米尔纳:《拒绝贸易保护主义》,第299页。

^③ 当然,批判主义同样可以被视作由新古典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经济行为的标准理论模型所构成的学说,按照常规它也将偏好视作既定的,经济学家在这点上毫无优势。

^④ 科尼比尔:《贸易战争》,第22-28页。最优关税争论已经被经济学家发展完善超过三十年,随着其理论根源离早期十九世纪的理论越来越远,要了解最近的讨论,可以参考W M·戈登:《国际贸易的规范理论》,《国际贸易》,第82-86页。

^⑤ [美]莱克:《权力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第38页。

界经济中政府的战略互动的经济学家们的偏爱。^①但我们能知道“黑匣子”这一类型的研究方法会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和具有多么潜在的误导性：尽管最初近似值会有帮助，但它并不是最终性的。在说明体系管理的问题时，不能脱离前面提到过的逻辑前提性的行为体行为以及为什么国家对他们的偏好如此排序的问题。甚至博弈论最雄心的应用的限制存在于对国家对自己利益的考量会导致什么而不是什么会导致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考量的关注的倾向。

（二）俯视分析

另一种博弈论的选择是机制理论，被克拉斯纳描述为对“在国际关系的一个既定领域中围绕哪些行为体的预期趋于一致的内在或外在的原则，规范，规则以及决策过程”的研究。^②机制理论假设认为尽管缺少现实世界的正式的政府，主权国家间的互动也并非就是在一个完全无政府状态下的环境中进行。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替代品倾向于在热点领域发展，在更大或更小的程度上，帮助抑制冲突和促进合作。机制的存在是由于最为追求权力的国家也认识到了在共同利益中的相互克制所潜在的积累起来的优势所导致的。这在贸易关系领域当然是很显然的，因为二战以来在关贸协定（GATT）的支持下已做出明确的努力来维持一个规范化的机制。

然而，与关贸协定的机制相关的问题是关贸协定似乎正在丧失其作为对个体国家的重商主义冲动进行限制的有效性。吉尔平在表示自由的世界经济的未来受到威胁时几乎是不孤单的。所有受到评论的作者都一致认为战后的多边贸易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个交叉路口，“徘徊”（正如罗斯克兰斯所称）在不同的组织方式间。并且他们都同意这个问题与吉尔平所强烈反对的美国经济领导力的下降紧密关联。这又将我们带回了科尼比尔和莱克所强调的行为体相对规模的问题上。关贸协定的建立毫无疑问是在美国对商业事务的统治时期而且大体上是从美国自身的贸易立法中使原则具体化；而关贸协定机制的明显衰弱是与美国总体的经济“霸权”的衰退相吻合的。问题在于贸易体系的开放性能否被维持，既然美国显然已经不再位于最顶层——或是基欧汉简练的措辞所称的“霸权之后”。^③我们是否能够找到其他可选的治理形式来维持“游戏规则”？或者关贸协定机制一定会由于贸易冲突的加剧而衰落吗？当然，这正是著名的霸权稳定理论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理论已被金德尔伯格、吉尔平和罗斯克兰斯发展研究超过了十年，^④而且显然持续成为贸易领域的政治经济学的学生所

^① 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中这的确是正确的，这也是最近大多数研究国际微观经济中的相互依存与战略协调的经济学家们所写的研究文章的特点。要了解后者，可以参考理查德·N·库珀：《经济政治学中的相互依存与协调》，载于罗纳德·琼斯和彼得·凯南：《国际经济学指南》，阿姆斯特丹：北荷兰出版社，1985年，第1195-1234页；乔斯林·霍恩和保罗·马松：《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的范围和限制》，《IMF成员论文》1988年第35期，第259-296页。

^② [美]史蒂芬·克拉斯纳：《结构因素和机制结果：其间变量的机制》，载于《国际机制》，纽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③ [美]基欧汉：《霸权之后》。

^④ [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年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美]吉尔平：《美国的权力和跨国合作》；克拉斯纳：《国家权力和国际贸易结构》。这一理论沿袭的名称由罗伯特·基欧汉促成，其《霸权稳定理论和国际经济机制的变化》，载于奥利·霍尔斯特、兰道夫·西沃森和亚历山大·乔治：《国际体系的变化》，博尔德：Westview出版社1980年版，第131-162页。

讨论的中心话题。

霸权稳定理论,在其最初的强有力的形式中,主张霸权对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秩序的维持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也是一个充分条件。正如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在其最初的构想中所强调的一样,“为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必须存在一个稳定者,而且只有一个稳定者。”^①只有霸权权力和体系中的最大份额才能被期望承担体制管理的坚实责任,即使这也意味着要对成本承担一份不成比例的份额。其他国家可能会被吸引着出现重商主义者的“搭便车”行为,以及冒着共有的“市场失灵”的系统性崩溃的风险。只有霸权权力才能被指望着愿意担负稳定地提供公共物品的代价。依循其介绍,该理论最初在政治科学圈极为流行。在这样强有力的形式下,该理论对经济学家有强烈的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其核心假说的明确性而且还由于其从经济理论中借鉴的熟悉的概念。

而近来,政治学家间已产生了一个显著的反应,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挑战该理论的前提和结论。^②而这又反过来削弱了该理论对经济学家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发现再一次地缺少共识予以指导。例如,莱克尽管接受该理论的基本逻辑,却也怀疑霸权是否对稳定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他正确地指出,该主张“在公共物品理论中没有任何基础”。既然“特权阶层没有被一个行为体所限制”,那么“断定在无霸权体系下的国际合作是不可能的就没有什么占优的理由”。^③同时,科尼比尔质疑霸权是否是充分的,既然它很可能是——再一次回到了最优关税层面——“通过限制比维持国际经济交易的自由更能保证霸权下纯粹的经济利益。”^④而米尔纳的整体分析是基于经验主义的观察,而其观察似乎对假定的霸权衰落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了反驳。^⑤甚至吉尔平现在也似乎对该理论不再抱有那么强的确定性。尽管他曾促成了以往贸易自由主义时期霸权领导力的出现(可以明确参考19世纪晚期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以及二战结束后头十年里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⑥他现在不得不承认,“仅有一个霸权权力的存在……对于保证一个自由的国际经济的发展是不充分的。”^⑦同样地,在他看来霸权也不再是必要的,因为他承认了其他组织原则对于保障一个开放的贸易机制的可能性,例如“一些将一切紧密结合的一致同意的原则”或者“在位的力量间持续的政策协调。”^⑧美国的经济领导权在今天可能在衰弱。但是关贸协定的机制的潜在影响却绝不可能如其最初的假设一样明确。用吉尔平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是必然发生的”。^⑨

因此,我们从这里开始应该向哪里进发的意见相当不一致。吉尔平自己对预测的一个“混

^① [美]金德尔伯格:《萧条中的世界》,第305页。

^② [美]基欧汉:《霸权之后》,第31-46页;[美]邓肯·斯内德:《霸权稳定理论的局限》,《国际组织》1985年第39期,第579-614页。

^③ [美]莱克:《权力,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第36页。

^④ [美]科尼比尔:《贸易战争》,第11页。

^⑤ [美]米尔纳:《拒绝贸易保护主义》,第4-12页。

^⑥ [美]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化》,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5页。

^⑦ [美]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72页。

^⑧ 同上,第78页。

^⑨ 同上。

合”机制下的无法确定的稳定保持了一个非常悲观的态度。罗斯克兰斯，处于一个相反的极端，即保持基本的乐观——主要是在认知层面——“现在国际关系的均衡”将在贸易体系的支持下最终被妥善的化解。^①处于二者之间的米尔纳谨慎地表示“相互依存的持续存在，本身就是美国霸权的一份遗产，将会促进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的维持，甚至霸权之后的时代已经过去，”^②而莱克也含蓄地表达了自信，“国际经济仍然会维持相对的开放和自由，尽管美国霸权正在衰落，（因为）国际经济合作现在存在着大量潜力。”^③同时，科尼比尔也强调诸如关贸协定这样的机制能够在抑制冲突或阻止贸易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④

当然，意见的多样性不是罪过。没什么特别的结果是必然发生的这个道理毫无疑问是正确的。然而，经济学家们发现令人困惑的地方，为了有效地判断不同的情况，我们需要更多的规范化说明和包括所有结果所依靠的变量的模型设计以及更深入和严谨的经验主义研究。否则，它将仅仅是无端的猜测和随意的经验主义。严谨的分析师应该约束其对以英式和平和美式和平为代表的过去的世界霸权这一极端小的标准样品的研究。他们也可以研究多多少少表现出开放的霸权性质的地区性贸易体系，包括一些 19 世纪晚期的正式的帝国的安排，20 世纪 30 年代纳粹德国与欧洲东南部的贸易关系，^⑤以及二战以来苏联和东欧的关系。历史分析方法并不受仅两个数据点的限制。“底线”信息因此是相同的。不管是仰视还是俯视，学者们都有责任做到尽量系统化和全面化。体系管理的问题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几乎没有确定的答案。

三、结论

那么经济学家可以从上面列举的这些研究工作中收获到什么？他们主要了解到他们是如何地需要开拓他们的眼界，如果他们真正想要了解现实世界的贸易政策的话。他们需要更进一步了解利益的问题以及特别是权力在激励行为体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国际贸易体系的管理问题和主权国家如何共同管理来处理他们自身潜在的冲突性的重商主义冲动。政治学家通过“内化”这类问题而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他们使我们意识到了传统的经济分析所倾向于去忽视的事件和变量。他们通过使我们重新考虑什么是值得解释的而改进了我们的概念框架。

但是促进感受和化为概念只完成了战争的一半。为贸易领域关键的市场与政治之间的互动构建一个规范化的结构是必要的。每一种分析层次的因素都应被清楚和系统地明确，他们相对的作用以及其功能关系的本质必须以理论上是强劲的以及经验上是普遍的这样的方式去建模。在评述中各位作者对关键的分析事件的共识的缺失并不会减损其提供的研究视角的重要性。但它的确表示出在当今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们还需要对经济学与

^① [美]罗斯克兰斯：《贸易国家的发展》，第 165 页。

^② [美]米尔纳：《拒绝贸易保护主义》，第 298 页。

^③ [美]莱克：《权力，贸易保护与自由贸易》，第 229 页。

^④ [英]科尼比尔：《贸易战争》，第 278-281 页。

^⑤ 与德国经验相关的分析当然属赫希曼的经典研究：《国家权力和对外贸易结构》。

政治学传统的学科划分的两个方面进行很多的研究工作。

[整理: 江昊宇]

[责任编辑: 江昊宇]

· · · · · 自由主义的困境 · · · · ·

1989年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自由主义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此后自由主义不断向极端化、普世化方向演化,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频繁遭遇经济危机、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同时,世界范围意识形态的创新、多样化进程也因自由主义的强势主导而裹足不前。而当自由主义变得千疮百孔之时,却缺乏可以替代的意识形态,这并非“历史的终结”,而是历史的悲剧。

1980年前后,里根、撒切尔在美英推行新经济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取代凯恩斯主义的国际主导地位。19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与共产主义的对决中“大获全胜”。至此,“自由资本主义”(liberal capitalism)、“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合流,形成所谓“新自由主义时代”,在国际舞台上一枝独秀。当时,美国学者福山宣布,世界上“已经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竞争者,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意识形态演进的终点”。此后,作为自由主义的两大内核,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断被神化。2007年金融危机宣布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破产。西方政府预防、处置金融危机乏力,第三世界民主转型陷入困境,皆暴露了自由民主政治的严重缺陷。然而,面对千疮百孔的自由主义,国际社会却找不到具有明显优势的替代品,因为早在20年前,意识形态创新就已经停顿!

资料来源:牛新春:《历史的悲剧:自由主义的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0期。

[整理:周扬、彭宁楠、宁鹏举]

[责任编辑:宁鹏举]

【编者按】出国深造是不少国关学子的梦想与追求，不仅有助于增长学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中学习、感悟、成长更是宝贵的人生阅历与精神财富。本期的海外国关人邀请到了留学美国的谷天一学长，与大家分享他在留学期间生活学习的经验，以及对美国城市与乡村文化生活的一些体会，供大家参考。

乡村还是城市，不一样的美国生活

谷天一*

在国外读书已经一年有余，在学术上谈不上有何见解，但承蒙刘主编青睐，要写这么个题目，便再次分享下自己在国外生活的浅薄的认识。刚刚结束了在纽约的实习，回味起来也是感慨颇多，因而这篇散乱文章的主题部分便是我对纽约的一些感悟。同时我在宾州中部的乡村读书，倘若非要使此篇文章有一丝经验分享的意义，那无非是我写下美国城市与乡村生活的不同，供大家在申请学校选择区位时参考。

一年前，我选择到宾州州立大学读书，这所学校坐落在宾夕法尼亚一个叫 State College 的小镇上，又名 Happy Valley。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读书，恬静的乡村学校无非正是一个理想的地方，现实生活也确实如此，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公寓之间，除了周末偶尔与朋友喝酒聊天，再无其他娱乐活动。当然在此需要声明，这并不意味着留学生在城市的生活就一定是声色犬马的，只是多了许多的选择，但如何生活的选择在你手中。例如，平常和我一起打篮球的邻居就抽大麻，但是他知道我不抽之后，就再没有问过我。所以，有些同学会担心去了传说中的 party 校上学会不会天天喝得烂醉如泥，对此我想说，如果你有这种顾虑，请放心，人家是不会带你玩的。

此外，乡村地方的生活成本相较于纽约洛杉矶这样的大都市是很低。在乡村读书，房租、交通、日常饮食及税收等诸多方面都会为你省下不小的开销。在纽约，哥大和 NYU 所在的曼哈顿岛，几乎没有沃尔玛这样的大型超市，因而你不会感受到传说中美国肉蛋菜奶的廉价。

总结一下，选择农村，优点有四：其一，生活安静，可以专心读书，当然这一点在城市也完全可以做到；其二，生活成本低，可以省钱；其三，适合开车；其四，空气质量好，根据一个经济学家的研究，符合美国 EPA 标准的空气质量也会对人体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缺点亦有四：其一，找工作不方便，去面试时很麻烦，尤其像国关这专业雇主们几乎都在华盛顿和纽约；其二，平时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较少，在华盛顿，各个智库经常会有令人眼花缭乱的研讨会，而在村里只能等待大牛们赏脸光顾了，有时还要学院包车一起去外地听讲座。其三，生活会略显枯燥，没有太多娱乐；其四，如果国内朋友让你帮忙购物的话，会发现许多名牌你都找不到。反之，则是城市的劣势与优势。

以上只是我根据个人的直观感受进行的概括，我喜欢宾州乡村，也喜欢纽约，申请时如

* 谷天一，男，南开大学国际政治专业 2014 届本科毕业生，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专业硕士研究生。

何选择还在于各位自己的决断。接下来,我想透过个人主观的视角,讲讲自己在纽约的故事与感受,希望能够为同学在美国生活有所助益。如果这并没有卵用,请权当是QQ空间上一篇矫情的青春日志,看个乐子。

我对纽约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第一次来,正值跨年,出血几百大洋买了张船票,排着长队吃了些简单的食物和略涩的酒,和一群操着各种口音的外地老乡们在瑟风中等待12点的烟花,“Hey, America!”大家惊呼着,活脱像十九世纪的移民。街头、地铁,充斥着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和行色匆忙的打工者。这与我读书的乡村完全不同。那一刻,我觉得托马斯·杰斐逊的建国理念绝对正确,即国家的基础应是农村而非人口集聚的城市,每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土地与财产,无须依附于他人,今人发展自己独立的人格以实行民主。在我学校所在的地方正是如此,纵使生活不算奢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土地、一栋房子、一到两辆车,可能正因为如此,去年宾州州长选举时,邻居家的大爷很自信地说他只注重候选人的表现而非他们的党派背景,当然我们读社科都明白这种中立不是绝对的,但主观上讲,他会认为他正是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使公民权利。这种场景,在纽约难以想象。不由想起天津人对河北区的一句调侃,“穷人比富人多,照样XX哄哄臭美。”同样让我产生质疑的,还有传说中华尔街对全世界的熏天权势。那片街区,琳琅满目的垃圾懒散地躺在地上,听一旁的污水静静流淌,根据我国传统的观念,“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乎?”

对纽约城进行了这一番批判,可以说欲扬先抑,也可以证明我本人并不是一名纽约吹,或美分党。之前只是游客,走马观花地对纽约以貌取人,这个夏天在这里两个月的实习使我有机会能够更深地体味这座城。

在来之前,邻居大爷就嘱咐我去找教会集会,怕我在城市里没有朋友很孤单,还发了两封邮件询问情况。我倒没有这样的忧心,其一我比较好静,其二在纽约南开和宾州州立的朋友都有一些,但是对大城市里的人冷情薄还是深以为然的。

要用一个词精炼地概括我所感受到的纽约的美好,那就是“艺术”。说一座城是艺术之都,并不因为坐落着大都会博物馆和现代美术馆,也不因为有着Parsons这样的艺术名校,更不因为这里生活着几个几十个如Vera Wang这样的先锋时尚人物,而是因为艺术就像空气一般,每天被每一个居民所呼吸着。

对我来说,与纽约文化的近距离接触起始于与安娜相识。初到纽约,四处闲游,在地铁站与安娜邂逅。长长的甬道,只有我们俩人在等车,为避免尴尬,我便说了句嗨,令人诧异的是她顿时热泪盈眶,原来她那时心情很不好,急需倾听。起初我还是顾虑的,猜想她会不会吸毒。她说她叫安娜,是一个音乐家(musician)。当然这个翻译并不恰当,在中文语境里,无论何种职业,以“家”作为后缀,一下子就变得高大上起来,仿佛都经过党委宣传系统的权威认证。

那之后,安娜就成了我了解纽约的一扇门,她的圈子总是有着各种有趣的活动,而她总

会叫上我一起参加。有一次，她要去画廊演出支持她中学老师的艺术展，正在做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我欣然前往。之前我所接触的，是南非市场，艺术品几乎被两家大型的拍卖公司垄断，其他小的机构与个人终究都会经由两大公司完成最终交易。但在纽约，那天去的却是 High Line 公园旁边一所不起眼的小楼。进去后发现那里经营着许许多多的小型画廊，作品都为当地的艺术家，我想 19 世纪时巴黎的沙龙文化可能便是如此吧。很棒的作品，艺术家用动物的毛皮做出各种意象，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个袋子里面有许多小白鼠，当时只觉得做得惟妙惟肖，还放在手中把玩，后来才知道那是真的老鼠。

最有趣的，还是 Contact impro 的舞蹈课，它还有一个更酷的名字，就是“dance with gravity”。这个课程是安娜的朋友 Jesse 教授。第一次去时，有一个上了年纪舞者问 Jesse，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舞蹈，Jesse 思索了半天，就如同亲戚朋友问我们“国际关系是学什么的”。最后她回答，后现代，对，postmodern。这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对我们并不陌生，现在讲国际关系理论和全球化的介绍性书籍都有一席之地，包括什么 poststructuralism、postcolonialism 都在这个范畴，不过老派的教授们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我们学得也就是云里雾里了。大体印象就是对现代理论的认识论甚至本体论进行批判，主张宏大的理论过于简单无法囊括真实的世界，甚至模糊了本质与表现的区别。在舞蹈中，这意味不需要传统地、按部就班地练习基本功，而是感受律动，进而学习动作，然后去演绎音乐。Contact，就像是一种精神鸦片，每个舞者都肆意地张牙舞爪，释放自己，并与同伴保持连续的、信任的身体接触。我的体会固然谈不上深刻，在我看来，contact 的本质一如其名，就是联系。自己身体各个部分的联系，身体与思想的联系，个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舞伴之间的联系。不试图向众人展示体操版的精美动作，而是通过跟随心灵的与外界的互动，感受自己的存在，感受妙不可言的美感。

Contact 上的朋友们，乍一看都风尘仆仆，是这个城市最渺小的生物，但是深入的交流后会发现，每个人都个性鲜活，思想活跃，完全不是钢筋水泥的附庸。比如 David，一个普通的瘦高个子黑人，一天他带了一个很夸张的眼镜，我打趣说，兄弟你真像个艺术家。他竟很认真地回答我说他的确是个艺术家，并给了我他的个人主页，都是很棒的说唱。还有一个俄罗斯裔的女孩 Alexandra，她在教授儿童体操之外，一直专注着把废弃的材料做成各种美丽的图片，如玻璃渣拼成的女孩。我说，原来你们都是艺术家。她说，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包括你。我想了想，也许你说的对，我倒是平常爱写些诗，但都是用中文，没法给你们看。她说你想的话一样可以写英文诗，一个很有趣的练习是，她说一句话，我要押韵地接下一句，有趣极了。这些可爱的人与事，在此不一一赘述。对我来说，在这里交流带给我的温馨与启迪，远非办公室里同事间例行公事问候所能比得上。

大体上讲，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的人，无非抱着两种目的，其一是为了活动工作签证最终留下，其二是为了增长见识开阔眼界，无论哪一条路，尽力地去融入当地的生活都是必不可少。这种参与，绝不仅仅限于以找工作为目的、高大上的社交酒会和校友交流，民间的、

生活中的聚会更会为你带来真切的感受。在纽约，触手可及的艺术便是我们了解、体味这座城、城中人、以及美国的最佳媒介之一。在了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加深着对自我的理解。在我看来，艺术气息是纽约最大的魅力所在，在这座城中主动地去生活而非生存，或许只是某个不经意的细节，会深深地影响我们的一生。不难想象这座城为何能孕育出如木心、陈丹青、艾未未这样的华人艺术家，而谁又能说这种艺术的体验对严谨的社科学子没有任何助益呢？

[整理：许译丹、李 漩]

[责任编辑：李 漩]

· · · · · 分裂主义 · · · · ·

分裂主义产生于分裂势力的系统宣传和行动，完成于分裂实体获得普遍的国家承认。寻求外部的同情和支持并进而获取国家承认，是分裂势力推动分裂主义国际化进程的主要目标。所以说，分裂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有国家的承认，国家承认是分裂主义国际道义及国际合法性的基础，它对事发国的反分裂斗争进行了根本性的颠覆，是对分裂势力的鼓舞和刺激，不仅可能引发承认国和事发国的矛盾和冲突，也可能影响地区乃至国际秩序的稳定。对分裂主义发展规律及其对地区稳定和国际关系威胁等方面研究的滞后，不仅制约了反分裂研究本身，也影响到对分裂主义发展的研判及应对措施的制定。

国家承认的产生源自于现代国际社会及国际法的发展。在国际法学者看来，出于以国际法规范国家间关系的需要，有必要首先认定某一实体是否符合“国家”的身份。任何实体想要以国家身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就必须得到已经获得这种身份的国家的承认。正如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并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一种由其他国家承认的权利。”

资料来源：李捷：《论分裂主义和国家承认》，《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4期。

[整理：周 扬、彭宁楠、宁鹏举]

[责任编辑：宁鹏举]

英采飞扬

【编者按】本期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文章是 2014 级研究生刘志同学的一篇书评，作者在读过莱恩的《和平的幻想》后，对莱恩精心阐述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核心内容、主要困难以及替代战略进行了概括，并对该书的优缺点进行了评析。另一篇文章是 2014 级本科生张路瑜同学的一篇习作，作者结合所学知识对均势外交政策作了介绍。

Review of *The Peace of Illusions*

George Lau*

Christopher Layne is a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Robert M. Gates Chair in National Security, and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the Bush School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Service at Texas A&M University. His fields of interest a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great power politics, US foreign policy, and grand strategy. In his book *The Illusions of Peace*, he retrospects the American foreign strategy after 1945, points out the cost and damages of this strategy and then puts forward an alternative strategy.^① He claims that the U.S. has been looking for hegemony since 1945 with its abundant physical material, favorable ge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the ambition to contain the world. He constructs a theory of Open Door to illustrate the reasons why the U.S. keeps looking for beyond-region hegemony. Open Door represents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which including economic welfare, national security and ideology export.

With this theory, Layne inspecte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1945. He condemns that U.S. helped west Europe through NATO and Marshall Plan not because of threat from USSR, but to contain Germany.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and a united Europe could become the third influence and shake American hegemony. To make hegemony more stable, U.S. controls the western hemisphere firmly and projects its military force to Western Europe, Middle East and East Asia. Domestically, a powerful government has been built, as well as military-industry mixture. In other words, what U.S. performed is the aggressive extra-regional hegemony strategy, rather than the so-called containment strategy which aimed to roll back the threat from USSR.

However, this kind of strategy has many problems difficult to solve. Firstly, the ambition of U.S. is to rule the world rather than to obtain national security in an anarchy world, which could lead to a terrible result. Secondly, there are too many states for America to keep watch, including

* George Lau is a postgraduat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①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中文译本参见[美]克里斯托弗·莱恩：《和平的幻想：1940 年以来的美国大战略》（孙建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Germany, Russia, Japan and China. In that case, for America, there is high risk to be involved in conflicts all over the world. Besides, the cost of maintaining hegemony is very high. Material capability is vital for the Pax America, but no country can keep that advantage all the time. Though don't know the exact time of fall of American hegemony, we can confirm the Pax America will collapse in the future.

Layne ho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best way for America to maintain its influence is to replace extra-regional hegemony strategy with offshore balancing strategy. In order to ease the strategic burden, America should follow the steps below. Firstly, it should shift the responsibility of guarding its alliances to themselves and retreat its military force from Eurasia. Secondly, the U.S. should construct a multipolar system instead of hierarchy. In a multipolar system, the balance of power will function automatically. Last but not least, when the multipolar system can't work effectively or a hegemonic state arises in Eurasia, America should rebuild the balance of power with its affluent resources, including its military force when necessary. In other words, the safety of U.S. relies not only on itself, but also on the multipolar system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major powers in Eurasia.

Without doubt, Christopher Layne reinterprets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1945 with a novel theory, Open Door theory, which is a hybrid of realism, commercial liberalism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Someone thinks that *The Peace of Illusions* "should be at or near the top of everyone's short list of works to rea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ush Doctrine, the war in Iraq, and the direction of U.S. foreign policy today".^①

However, the book still has several demerits. Firstly, the Open Door theory has been studied by a lot of historians, like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Walter LaFeber, Melvyn Leffler, and Michael Hogan. "In this fascinating synthesis, Layne offers a savage indictment of Open Door Wilsonianism and a defense of Realism, and on moral as well as geo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grounds."^② Besides, some of his arguments conflict with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He asserts the grand strategy of the U.S. during the Cold War isn't containment strategy, but Open Door strategy, which can't convince readers. Secondly, Layne didn't give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detail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old War, especiall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Last but not least, in the final analysis, Layne proposes a new grand strategy for the U. S. which make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grand strategy debate. "However, the topic is very broad and Layne's book does not address the questions that it raises in sufficient detail to be completely satisfying."^③

^① David F. Schmitz, "Review of *The Peace of Illusion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4, No. 1 (Jun., 2007), pp. 336-337.

^② Mark A. Stoler, "Review of *The Peace of Illusions*",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1, No. 2 (Apr., 2007), pp. 589-590.

^③ T. James Devine, "Review of *The Peace of Illusion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0, No. 4 (Dec., 2007), pp. 1071-1072.

Besides, Layne didn't elaborate how to make this kind of strategy change and how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in such kind of change. All in all, *The Illusions of Peace* is an excellent work on the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that deserves careful reading and thinking.

British Traditional Diplomacy Policy Summed by Winston Churchill ---Balance Diplomacy

Luyu Zhang*

Balance diplomacy is a kind of foreign policy. Balance is a situation where two or more strong states are fighting for hegemony but no one can get an apparent strength result to be the hegemony. Directed by the balance diplomacy policy, one state will help the weaker side when another side becoming apparent strong. Winston Churchill summed the diplomacy as follow, "At any time, Britain must against the most powerful state and hegemony in the European land,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balance situation in the European land and become the master of the situation." in his *the Second World War memories*.

Balance diplomacy policy was pursued by Britain in some modern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classical example is Parti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ritain colonial hegemony was weakened severely. India national independent movement developed rapidly. In February 18th 1946, 20 thousands of sailors in Mumbai broke out revolt and all sailors attended the revolt after 3 days. Though the revolt was suppressed, the revolt vibrated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and Britain government realized that Britain can't rule India continually. They decided hand over the sovereignty to India.

In order to keep the Britai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India, Britain divided India into two domin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The region with more muslim established Pakistan dominion and the region with more Hindu set up India dominion. The division made two rivalrous states in India so that Britain can keep the economic interest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 India. But the division also resulted in the continuous conflict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bout 12 million people became homeless and 1 million people died for the conflict in the history. Up to now, Kashmir still is a conflict area.

Nowaday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changing unpredictably. In oriental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 can make use of the balance diplomacy for reference to maintain a peaceful East Asia.

[整理: 李天翼、许译丹]

[责任编辑: 许译丹]

* Luyu Zhang is an undergraduat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anKai University.

2015 级迎新特辑

美丽的南开，你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青春伴随她。
 大中路旁杨柳翠，新开碧波映晚霞。
 古钟悠悠铭校史，主楼巍巍塑英华。
 美丽的南开我的家，我用一生去爱她。
 敬业广场书声朗，马蹄湖水映荷花。
 公能校训记心上，月异日新竞芳华。
 今日湖畔放声唱，明朝建功在天涯……”



迎新特辑

【编者按】2015年的6月,你们分散各地,正在为高中生活画上一个句号;金秋时节,我们相聚南开园,为你们的大学生活开启新的篇章。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因你们的到来充满生机与活力。对你们来说,大学,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也是一个熟悉的词汇;南开,是你们新的开始,也是新的挑战。那么,初入南开园的你们该如何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呢?本期迎新特辑就带领你看看师兄师姐们的大学生活。

【我是爱南开的,我们是爱国政的】

一路上有你

——致我爱的12级国政大家庭

武燕*

三年,如果是高中的话我们已经面临着离别。

幸好现在的我们,还有一年来珍惜。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天津滨海新区发生了爆炸,而此刻的我虽然在北京实习,可是我的心却和所有人一样紧紧地留在天津。爆炸发生于晚上十一点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是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才知道的消息,从知道消息开始我们提着的心就没有放下过。我们班里有一个女生家在大港,虽然她家到爆炸的地方有一定距离,但是大家仍是很担心她。从早上七点多,大家就在班级微信群里互相报平安,而那个女生一直没有消息,于是大家就疯狂的给她发微信、打电话,最后大家都找来辅导员问清了她家里人的联系方式。庆幸的是在上午十点多同学终于得到了她的消息,只是手机没有开机。看到她发的消息的时候,我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手机,手不住的颤,泪水再也忍不住,而手机那边的她也是,面对着那么多同学给她的留言以及未接电话,泪如泉涌。

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人,对对方都是那么的重要。

我很骄傲,我,我们,都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2012级国际政治班级的一部分。

时光荏苒,三年的时光就要过去了,我还能清楚地记起当初我们报道时的情景。三年前的八月,当天还下着蒙蒙的细雨。我们到了迎水道校区报道,之后晚上开了第一次班会。听着大家的介绍,我会觉得很神奇也很期待,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就这样由于一种奇妙的缘分聚集到了一起,将要在一个班级共同度过四年精彩的生活。

我们会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大家在院会里面参加了不同的部门,在学校里参加了不同的社团和组织,但是我们还是一直在一起。我们一起在同一个教室里面上课,一起做过无数个 presentation, 一起进行过无数个课堂讨论,一起走过漫长的论文和考试“季”。我们会

* 武燕,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2级本科生。

浩浩荡荡一群人坐着公交一起去吃火锅,也会一群人走到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的公园里面去吃精致的菜肴。运动会的时候,我们会给所有的人呐喊递水,会拼劲全力做自己都不擅长的项目,只为了给12国政多拿一分;有活动的时候,班里的男生会“跪着”给我们唱《征服》,会给我们送上鲜花和巧克力;女生节的时候,男生还会在我们寝室门口挂上大大的条幅“不管你将来是谁的女人,现在都是我们的女神”;三年以来的太多太多,无法一一去赘述……

31个人,每一个人都是那么不同,可又那么相同。我们会为了对方的欢笑而欢笑,难过而难过,我们会像亲人般关心对方,让每个远离家乡的同学感觉到家一般的爱意。但是生活不会像童话故事写得那样,永远那么单纯美好,或许我们会因为观点不和而争执不下,会因为性格摩擦而互不理睬,可是正是那些风风雨雨,见证了我们一路的成长,因着那些磕磕绊绊,我们变得更加包容友爱。

时间总是过得很快,而回忆却太多。现在的我们,即将步入大四,班上的同学有了不同的选择和方向,有的想去国外读书,有的想在国内考研,还有的想要考公务员或者直接就业。有人说大四了,就意味着离别。或许我们会到国外,会在国内,可能会留在天津,也可能会去到陌生的城市,但是无论我们到了哪里,做了什么,我们始终铭记着,在我们最青春年少的时候,在我们可以张开翅膀自由逐梦的时候,是12国政的每一个人,陪着对方,度过了这匆匆四年。

一路上有你,12国政,无可取代。

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未来

耿欣伟*

我们的记忆从2013年8月18日那天报到开始。即使时隔两年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报道当天晚上,导助安琪学姐组织我们召开了大学的第一次班会,班上31位同学向在座的同学、老师和学长学姐介绍了自己,于是我们携手前行的四年就这样开始了。

军训,这是中国的大学生进入大学之后的必修课,也是我们进入南开园之后拿到的第一个学分。我记得校区操场上因为我们整齐的正步而飞扬的尘土,我记得中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互相关切话语,我记得晚上拉歌时教官跑调的歌声带给我们的欢声笑语,我也当然记得拿到先进连队的铁七连在操场跑道上整齐行进的英姿。整场军训下来,我们的同学没有一个人掉队,顺利地完成了大学的第一堂课,也同时迎来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同学,大学的学习生活也就随着军训的结束拉开了序幕。

大一,我们脱离了中学三点一线生活的新开始。32位同学对于大学的一个专业来说真的不算多,但是真的要让班上这看起来为数不多的同学彼此熟悉,这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也许是因为我这个班长在刚刚军训时就被选出,那时大家还互相不熟悉,而待到大家彼此了解之后,整个班已经形成了和我本人性格很像的氛围——轻松活泼但不失严肃,在各种

* 耿欣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3级本科生。

班聚、娱乐活动上我们是玩得最开的一群人，在考试、上课、开会的场合我们也是最严肃认真对待的一群人。

大学生活自然多姿多彩，但是学习仍旧是这四年首先要保证的事情。这一年，有人奋战四、六级，有人因为数学基础较弱始终坚持在高数和计算机基础课上保持精神高度集中，哪怕是一贯被认为简单的军理课，我们也会在课上认真听讲，认真记下老师说的每一个重点，力求开卷考试我们能立刻找到每一个需要的知识点，就是这样的坚持，才让我们在大一结束之后都在必修课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成绩。

大二，注定是忙碌的一年，也注定是收获颇丰的一年。这一年，我们“荣升”为学长学姐，在各种学生组织里作为中坚力量，继承学长学姐的工作，带领学弟学妹走向未来；在班级中作为大一的“过来人”，不厌其烦地给学弟学妹讲解各种大学的生活学习技巧——看着你们如此的热心于帮助他人，听着学弟学妹们总是说“问咱们上届国政的就行”，我真的为我在这样一个班里当班长而感到非常荣幸。

然而学生活动还在其次，我们刚刚经历了大学四年里课业最繁重的一年，有的科目包含了数万字的知识点，而有的科目则需要平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有的科目则即使课上认真听，课下认真预习复习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理解。即使如此，一年下来，全班同学无一挂科，且大部分都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成绩。但是成绩不是重点，这一年下来我们或自愿，或被要求，阅读了大量的中英文文献，在学术水平上有了不小的提升，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对“学术”这个词语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13 国政，这是个大家彼此性格相投，互助互爱的班级，我们有的绝不只是说出来的温馨有爱。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回想起大学，不是想到我们上过多难的 IPE，不是我们聚了多少次餐，不是我们得了五四评优红旗团支部的称号，而是无论 IPE 有多难，班上学得相对明白的同学总会不吝自己的那些复习资料，而是聚餐时发现哪个同学的口味很独特，而是五四评优期间，哪次团日活动上哪个同学出丑了……

去年给系刊写的文章用词现在仍历历在目，转眼我们已经大三，即使之前过得再开心，也或多或少会有一些遗憾，15 级新生马上就要踏入南开园，学长在这里预祝你们在大学事事开心，学分绩高高哒！

一年的时光

——想它，却已经过去

张佳伟*

和学弟学妹们一样，查到录取的学校是南开大学时，心里莫名的激动，感慨于自己三年的努力没白费，也憧憬未来四年，渤海之滨的生活。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一年时光，太多感触，太多不舍，也有太多遗憾。

* 张佳伟，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 2014 级本科生。

一年的确使我成长了很多。从不敢在公共场合讲话到敢于开口,各种能力从不会到稍微熟练一点,一年里,我收获了太多太多。这里分享两点吧。首先,不管多忙,阅读都是必须的。一年里我的学习成绩并不是很理想,很多东西还没有真正学懂,但是我始终没有停止读书,帝王将相、王朝兴衰、盛世佳人、心路历程、名人励志,大概都看了几本,帮助的确很大。其次,人际关系一定要做好。这一年,我们住的六人间,每天都充满欢笑,一天的忙碌、不愉快在每天舍友间的聊天与吐槽中终会烟消云散。学生会也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每天我们无话不谈,工作时候也是彼此理解配合,学长学姐的悉心照顾更是让我收获无数感动。班级呢?一年里随着五四评优的进行,我们一起聆听程老师的讲座,探讨法制与时势,交流家乡方言与美食、文化,聚餐彼此敞开心扉,直到最后分班前的最后班聚,大家依依不舍。我想人际关系做好才能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感到温馨、内心暖暖。

不舍也是有的。这里说三个大一最大的不舍吧。首先,舍不得那些人。很多好朋友转专业后就是两个校区相隔,见面会更困难;陪我们玩耍、学习、生活了一年的辅导员老师调动工作,真的不愿说再见;60人大班分成两个专业,再也没有60人齐唱团歌的豪迈。其次,舍不得那些事。很多活动想参加却因为各种原因推掉,很多事情想去做却最终未能实施。还想再体会军训时大家一起坐在土地上的畅快,还想再参加一次运动会,喊出周政威武;还想好好练练歌,五月鲜花合唱时为周政再添一份力。这些事都结束了,然而,真的不舍。最后,舍不得那个地方。从刚到时对于迎水道校区的嫌弃,到逐渐喜欢上、放不开、舍不得它的便捷、小巧。马上这里会变成另一番景象,我的母校,不想说再见。

最后说说遗憾的。从开始的懵懂、无知到逐渐适应,终究免不了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很多精彩的课我没有好好听,考试也并不是很理想。英语水平跌到难以启齿,专业课也没有学好老师教的东西,只是为了应付考试。我真的希望能在未来改改。还有,这一年的体育锻炼真的太少,现在体育水平弱到爆。这些大一一年真的没有做好,希望我未来可以有所改观,更希望学弟学妹们别走我的错路,毕竟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好啦,年轻的孩子们,准备好行囊了吗?我们在南开园等你!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大学生活之留德经验分享

马垚粮*

提到留德,或许多人应该很陌生吧。在我之前也很少有人选择去德国留学,而我自己也是趟水过河,好多都要自己慢慢摸索。下面我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经验和申请流程介绍给大家,希望有点用。(仅限于研究生留德,本科留德手续不同哦)

首先,为什么出国呢?嗯,这是个很严峻的问题。相信各位学弟学妹大部分也没有做好打算,这个要自己摸索,重要的是要找一个不后悔的道路走下去。开始的时候。我是打算

* 马垚粮,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1级本科生。

直接工作的，但是实习之后发现，留学人才更加受欢迎。再加上之前参加大学活动去非洲做过志愿者的经历，使得我对外面的世界更加好奇。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的心对我说，如果不多出去看看，我会后悔一辈子！于是就毅然决然的去了……

那么为什么德国呢？首先，德国的大学是免学费的。没错，去了没有任何费用（当然个别学校的个别专业也会收费，但是极少数的）。其次，德国的消费真心不是太高啊，可以算上是最便宜的留学国家。看到去美帝腐国的高富帅白富美们自己自豪的说：“你们一年费用够我用到毕业了！”（此处挨一巴掌，都是留学，何必呢，哈哈）。再次，就是有英语授课的国际课程和德语授课的课程两种可以选择，不过呢既然是去德国留学，最好还是要会点德语吧。我自己呢，首先是对语言感兴趣，然后对德国感兴趣（两次世界大战被打败现在还这么繁荣，杠杠的），就这样学习上了德语。然后呢，家庭不是很充裕，但是还想出国，就发现原来德国留学费用比较低廉，那为什么不去试试呢？就这样走上了不归路。

留学动机介绍完了，言归正传要介绍留德程序了，要严肃！

第一要选择的就是专业问题了。德国大学要求比较严格，要求研究生专业与本科专业匹配，所以研究生申请基本上只能申请本专业。也就是说本科是国关的话，研究生也基本上只能申请与国关相关的专业。但如果是双修的话可以选择你所双修的专业。如果你没有双修又不想读本专业，基本上是要从本科重新学的。

第二是语言问题。如果你是选择了国际课程，那么必然是要把英语学好。一般大学要求英语至少要达到欧标 C1 的标准，而具体的分数还要看学校的要求，一般推荐雅思到考 7 或者更高，托福要看学校是否承认。申请材料也和其他英语国家的要求差不多。

如果你选择了德语课程，那就必然要接触德语，走上备考德福 (Test DaF) 或者 DSH 的道路。TestDaF (德福) 是德语语言考试，对象是以赴德留学为目的的外国学习德语者或一般只想证明自己德语语言水平的人。DSH 考试全称是“德国高校外国申请者入学德语考试” (Deutsche Sprachprüfung für den Hochschulzugang ausländischer Studienbewerber)。在国内的话一般考德福比较普遍，德福总分 20 分，听说读写四项，满分都是 5 分。申请德语授课的大学至少要达到各项均 4 的标准，任何一项都不能低于 4 分。德语在中国每年举办三次，分别是 3 月、7 月和 11 月，考位也比较难抢，有意报考请提前做好准备。DSH 国内比较少，一般国内只有少数时间会有，要考到至少 DSH2 的水平，不做详细介绍。如果有意学习德语课程，建议尽早入坑，大部分童鞋在毕业时都没有考过只能先上语言班。

对于学国关的童鞋，如果你想选择德语课程，一般还需要英语达到欧标 B2 的水平，也就是雅思 6 或者 6.5 的水平，托福不太清楚，具体也都要看学校要求。

专业和语言说完了，下面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德国特色：APS 审核。APS (Akademische Prüfstelle) 是“德国大使馆文化处留德人员审核部”的德文缩写，审核部的主要工作是对预备赴德留学的中国申请人的入学资格和学历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为通过审核者出具相应的审核证书（审核部官网 <https://www.aps.org.cn/zh/>）。APS 审核证书是申请

德国大学和办签证的必须材料!是申请德国大学和签证的必须材料!是申请德国大学和签证的必须材料!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APS 审核在大三结束,6 个学期成绩出完后才能申请。申请前会要求交上去许多材料,比较繁琐,详见审核须知:
https://www.aps.org.cn/wp-content/uploads/211_merkblatt_verfahren_china_interview_chn.pdf 审核是以面谈加笔试的形式,要把你的大学学的内容审核一遍,20 分钟笔试,20 分钟面试。面试语言可以选择英语、德语或者英德混用,如果双辅修还要准备双辅修的专业。笔试不是关键的,重要要把面试做好。面试的经历的话我在 <http://www.abcdv.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6833&extra=有写>,可以借鉴一下。APS 审核时间大概会在材料递交后一个月左右通知面试时间(最快一个月,慢的甚至有三四个月),一般在通知当天两周后面试,递交材料后就尽量开始准备。APS 审核只有三次机会,如果第一次没通过,那么要在三个月后再提出申请,再等电话通知进行面试。三次机会都没把握住,那留德之路真的就结束了,好好准备基本第一次就能过。

APS 审核只能在大三结束,6 个学期成绩出来后申请,之后还要等待面试通知,比较耗时。为了不延误大四毕业申请学校,建议尽早准备尽早进行申请。

专业选好,语言通过,APS 审核证书拿到,好啦,可以开始申请大学了。

大学申请时期的话与其他国家不同:对于德语课程,有冬季学期申请(1月15日截止)和夏季学期申请(7月15日截止),也就是说可能毕业都还没收到通知,要做好准备,看着别人都尘埃落定,自己还无着落的感觉可不好受。不过呢,也可以缓半年,冬季学期申请啦。对于国际课程的话要试学校而定,一般在2月到5月会截止申请,要自己做足功课。

其实德国大学之间差距很小,无论是精英校,还是各地区的名不见经传的只有几百人的学校也好,其水准都是相差不是很大的,其最大的区别主要在于,精英校有政府划拨出资,企业也有大笔赞助,TU9 有企业大笔赞助,政府资助,各地方小规模院校一般也有各种赞助和政府资助,差别主要体现在教授实力,教学器具等方面,还有就是在专业上可能会有排名。

申请完大学,拿到通知书,别高兴太早。只是走完了第一步,还要办签证、找房、订机票等一系列的内容,就不一一赘述了。给大家推荐一个留德学生论坛 <http://www.abcdv.net/portal.php>,上面各个流程都写的非常详细,还有前人经验和各种交流讨论的帖子,会对你有很大帮助。

最后,祝各位学弟学妹也能找到一条令自己满意的发展之路吧。写这篇的时候才订完机票,终于可以休息了!

大学生活之政治大类分专业介绍

张路瑜*

去年此时,我正在台下听学长学姐们讲解国际政治专业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区别,万万没想到今年会有这份荣幸,来给15级的小鲜肉们答疑,内心真的很是激动。

首先我要祝福大家,经过高考血战杀出重围,又经历报志愿的苦痛纠结,各位来到南开园周政院政治类,在这里的4年相信会是你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大家来自五湖四海,All men are brothers(四海之内皆兄弟),从我们踏进南开校门那一刻起,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响彻天地的名字——南开人。

接下来作为学长,也是第一届实行大类招生的学生,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大类与分专业,供各位学弟学妹们释疑。南开大学从2014年开始,将国际政治专业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整合,进行大类招生,即在高考中不再招收国际政治专业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学生,而是统一招收政治学大类。政治学大类将在大一保持,学习国政与政行的基础性课程,如: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概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与对外政策等必修课。到大二,经过一年的学习,同学们也更加了解自己所学专业 and 兴趣所在,学校将尊重学生意愿、参考学生学分绩进行分专业。实行大类招生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为了夯实学生知识基础,在大一多学习基础性课程,为以后的学习和科研打好基础;第二是为了给学生再一次的选择机会,让学生在经过一年的学习对所学专业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细化专业,尽最大可能让学生热爱所学专业。

国际政治专业和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各有特色,也互有差异。国际政治专业主要开设国际关系概论、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组织、国际法、外交学、当代中国对外关系与外交政策等30多门专业必修和选修课程,更多的从国际视野上进行专业分析和考虑问题。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为本科生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政治学原理、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比较政治制度、政治学计量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发展政治学、行政管理学、政策原理与政策分析、人事管理学、民族政治学等,着重于政治理论和国内政治。从往届历史看,国际政治专业班级气氛较为欢脱活跃,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班级则严谨好学,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性格、兴趣以及日后的发展规划进行选报。

从就业与深造角度来看,国际政治专业致力于培养具有一定政治学素养、掌握有关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特别是具备独立学习和工作能力的人才,让他们今后能够胜任在各级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或企事业单位等的行政管理、外交、外事、对外宣传、国际交流、国际商务等方面的工作。国际政治专业已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波兰、土耳其、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的交流与合作关系。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本、硕、博毕业生就业分布主要于高等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

* 张路瑜,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4级本科生。

中央和地方政府、事业单位、各类企业等；另有一批毕业生出国留学深造，本专业已经与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公共管理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学院、台湾大学社会科学院、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系、韩国天主教大学中国学部、韩国忠南国立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芬兰图尔库大学社会科学部建立合作关系，双方教师和学生之间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流。

从2014级政治学大类的情况来看，分专业后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较国际政治专业人数多一些，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29人，国际政治专业25人。从全国排名来看，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自4、5徘徊，有着悠久的历史，有朱光磊、程同顺等名教授；国际政治专业由于筹建时间短（2003年创办）全国排名并不靠前，但发展势头良好，现任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即为国际政治系教授。

相信同学们已经对自己将来所学习的专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希望同学们能从自身条件出发，选择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专业。最后想告诉大家，行行出状元，哪里都有一片广阔的天地等待着我们去闯荡，就像龚克校长说的：南开人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向上！

【在南开】



南开生活的开始，我们都曾在迎水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我们在钟楼前



绿草茵茵，最后一次在本部操场

【编者按】此书目由国际关系系的老师制作,适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感兴趣的低年级本科生使用,是一份尽可能精简到最少的书目,目的在于帮助大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对象、核心概念和理论流派有基本的了解。过去两年《新视界》的“迎新特辑”都采用了这份书单,而今朝花夕拾,就是因为经典永远具有魅力。

国际关系专业学习入门推荐书目

一、国际关系概论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五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原版影印】

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康威·汉得森:《国际关系》(金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4 年版。

威廉·内斯特:《国际关系:21 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姚远、汪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宋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邢悦:《国际关系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二、国际关系理论

[法] 达里奥·巴蒂斯特拉:《国际关系理论(第3版修订增补本)》(潘革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加] 罗伯特·杰克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宋德星、吴勇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美]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译),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 年版。

[挪] 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宋伟:《国际关系理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年版。

三、国际关系史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1997 年版。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香港: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 理查德·克罗卡特:《50 年战争》(王振西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英] A. J. P·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

[加] 卡列维·霍尔蒂：《和平与战争：1648-1989 年的武装冲突与国际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四、经典著作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年。

[英] 爱德华·卡尔：《20 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倪世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美]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李保平、郝望、徐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美]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英]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美]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五、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美]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论》，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陈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挪] 斯坦因·拉尔森：《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美] W·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年版。

阎学通、孙学峰：《国际关系研究实用研究方法（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六、美国外交政策

[美]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周桂银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

[美] 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傅耀祖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

[美]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 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韩召颖：《美国政治与对外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资中筠、陈乐民：《20 世纪的美国》，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七、推荐访问网站

环球网 <http://www.huanqiu.com/>

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

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

中新网 <http://www.chinanews.com/world/>

美国 FP 杂志 <http://www.foreignpolicy.com/>

美国 FA 杂志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

美国智库 CFR 网站 <http://www.cfr.org/>

哈佛国际评论网站 <http://hir.harvard.edu/>

耶鲁全球在线 <http://yaleglobal.yale.edu/>

中国国关在线 <http://www.irchina.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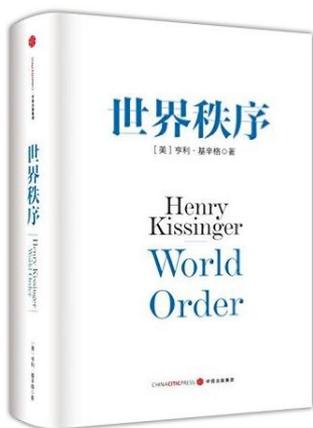
Theory Talks 网站 <http://www.theory-talks.org>

[整理：张路瑜、丁敏潇、江昊宇]

[责任编辑：江昊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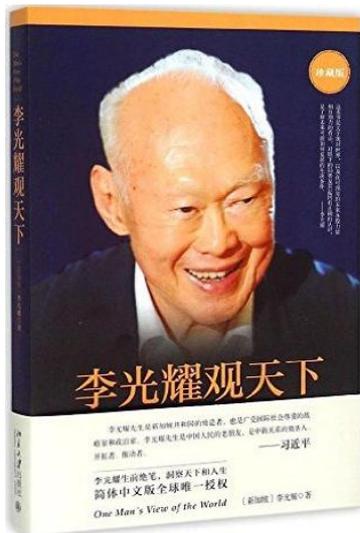
新书架(三)

【编者按】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崛起呈加速趋势,这直接导致了亚洲乃至全球局势的变化。那么,东亚的紧张局势是否会持续?中美在亚洲和全球范围内会开展怎样的竞争?未来的国际格局又将如何变化?本期新书架给国关学子带来众多有关东亚局势与世界秩序的最新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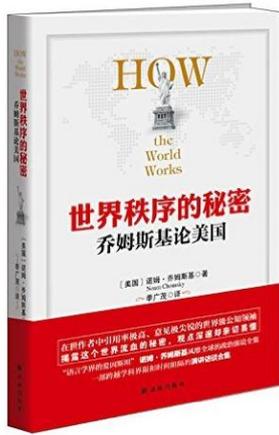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21世纪全球政治和经济版图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化?后危机时代,在国际事务上呈现出哪些新的挑战?中美大国关系迎来怎样新的格局和趋势?中国又该如何抓住战略机遇,适应新常态,谋求持久稳定发展?全球最有发言权的外交家、战略家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后,92岁高龄最新力作60年外交生涯的理念精髓,4个世纪国际秩序变迁的历史思考一部大开大阖、谈古论今、求索国际关系治理之道的集大成之作。一部国际格局骤变时代下注定聚焦全球目光的重磅巨著。



[新]李光耀:《李光耀观天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李光耀对东北亚乃至世界深具洞察力又锐利的分析,再次证明了为何他被视为我们这一代人中卓越超群的资深政治家。在这个瞬息万变、充满无法预见的挑战的世界,李光耀代表的是理智、明晰和希望的坚定声音。一代政治领袖的生前绝笔,蕴藏政治智慧和对人性的洞察。李光耀提出了一个尖锐且具说服力的分析,强调美国与中国之间最终必然重新平衡全球影响力所带来的后果。此外,他还明确地揭露了如果欧洲政治家还是无法采取正确行动,欧洲将难免陷入自我边缘化的境地。凭其远见卓识和政治智慧,《李光耀观天下》对21世纪世界的复杂性提供了最宝贵的指引。



[美]诺姆·乔姆斯基：《世界秩序的秘密：乔姆斯基论美国》（季广茂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语言学界的爱因斯坦”诺姆·乔姆斯基。在世作者中引用率极高、意见极尖锐的世界级公知领袖揭露这个世界流血的秘密，但观点深邃却亲切易懂。风靡全球的政治演说全集一部跨越学科界限和时间阻隔的演讲访谈合集，批判美国政府，超级权力，幕后交易的真相，深陷暴力丑闻的超级大国，是恐怖，还是反恐？自由、民主与谎言的较量。他的声音也是这个地球上关于对外政策的最受读者欢迎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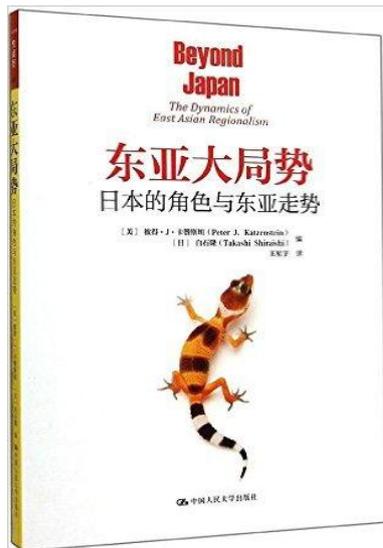
迎的声音。



[中]王缉思《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

“新型大国关系”目前还是一个开放的概念，需要中美双方在不同层面和领域，通过积极而艰苦的努力来填写实质内容。知名学者王缉思教授编著的《大国关系：中美分道扬镳，还是殊途同归？》，是国内第一部对此作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解读，并就可能的政策选择进行探讨的专著，很值得关心这一重要问题的人士阅读。处在新时期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发展方向，既需要内外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当政者的政治

决断和战略家的前瞻视野。人们在阅读王缉思教授编著的新作时，将受益于此书的立体思维，并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产生新的感悟。



[美、日]彼特·J·卡赞斯坦, 白石隆:《东亚大局势: 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王星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本书介绍了近年来东亚国家的力量对比新变化及其发展趋势, 重点分析了日本、美国、中国及东亚的新社会力量对东亚区域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 东亚已不再是以往一国主导的情形, 在日本以及中、美等其他国家影响的共同作用之下, 一个新的独特的东亚地区正在孕育形成。未来日本在东亚将扮演什么角色? 中、美等国在东亚将如何与日本相处? 《东亚大局势: 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预测。

[整理: 赵天畅、刘 志]

[责任编辑: 赵天畅]

· · · · · 上海合作组织乌法峰会 · · · · ·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15年7月10日在俄罗斯乌法召开。会议围绕上合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深化安全合作、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人文交流等进行了一系列安排。这些会议成果为上合组织下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此次峰会上, 各国元首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6年至2018年合作纲要》, 批准了启动《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制定工作, 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应对毒品问题的声明》, 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这些会议成果对强化共识、深化合作具有重要作用, 有利于安全合作的系统性、针对性、务实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

此次峰会上, 各国元首决定启动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的程序, 并同意白俄罗斯成为观察员国, 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柬埔寨、尼泊尔成为对话伙伴国, 标志着上合组织“扩员”程序正式启动。当然, 根据相关规定, 从候选国到成为正式成员国, 其接收过程需遵循协商一致原则, 需通过一系列谈判征得所有成员国同意, 这一过程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资料来源: 林永亮:《从乌法峰会看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前景》,《当代世界》,2015年第8期。

[整理: 周 扬、彭宁楠、宁鹏举]

[责任编辑: 宁鹏举]

♣ 学术交流 ♣

刘鸿武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并受聘南开兼职教授

(转自 南开新闻网讯) 6月25日,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鸿武做客“周恩来论坛”并受聘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副校长朱光磊出席并为刘鸿武致送聘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主持论坛和致聘仪式。



刘鸿武教授是国内著名非洲问题研究专家、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学术成果丰硕,曾获“中非友好贡献奖”,“感动非洲的十位中国人”等殊荣,为新形势下增进中非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坛上,刘鸿武以中国的非洲观、非洲战略和非洲研究3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为切入点,分析了非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与和平安全问题,指出非洲大陆本身日益牵动全球战略格局变化,非洲的发展理念与道路之争成为国际思想竞争与知识碰撞的高地,其背后包含着各种发展模式、发展理念与发展权益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的竞争,而“一带一路”的提出正在为这一过程注入全新力量。刘鸿武认为,中国应在秉承自身学术传统、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总结中非关系实践的基础之上建构发展具有非洲情怀、中国特色、全球视野的非洲研究,并就未来如何以中国方式展开创新研究、推进中非智库交流等具体问题介绍经验与对策。在互动环节,刘鸿武就如何处理中非合作中可能出现的矛盾、评估相关风险、保障中国海外权益等问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加深了师生对中非合作理论与实践、现状与未来的认识。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 南开新闻网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陈庆炎于6月29日至7月4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7月1日,陈庆炎及夫人一行访问我校,校长龚克代表学校向陈庆炎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学位授予仪式在东方艺术大楼举行。至此,南开又添一位卓越的校友。正如龚克在致辞中所说:我们今天对陈庆炎总统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必将有益于南开大学与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此次陈庆炎访问我校之际还做客“周恩来论坛”,就“中新关系”和“一带一路”发表演讲。据新加坡大使罗家良此前介绍,此次演讲是陈庆炎在华期间唯一一次公开演讲。

王正毅教授做客“周恩来论坛”

(转自 南开新闻网讯) 7月17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正毅做客“周恩来论坛”,带来一场题为“全球政治经济与中国崛起”的讲座。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主持讲座。

王正毅以现阶段中国同世界体系接轨的两大关键变量为切入点,提出中国终结还是发展既有世界体系这一核心问题,并以体系延续的四大动力为分析框架回答这一问题。他分析了世界体系中民族国家的竞合历史,归纳荷兰、英国与美国成功实现崛起的原因,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地图中的佼佼者,但同时面临四类挑战,中国若要持续崛起为世界强国,必须大力推进内部改革、积极参与国际既有机制,同时参与构建创新型国际新机制。

在提问环节,王正毅就美国信息革命的启示、中国作为金融大国转型的挑战,以及亚投行获得国际社会欢迎的原因表达看法并同在场师生深入交流。

♣ 师生活动 ♣

《新视界》编辑部经验交流会顺利举办

(通讯员: 丁敏潇、江昊宇) 2015年6月28日下午,《新视界》编辑部在校区主楼120举办了经验交流会。主编胡阳阳带领编辑部的成员宁鹏举、江昊宇、李天翼、丁敏潇,与2014级政治系的同学们就选专业、转专业、双辅修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交流。

主编胡阳阳首先就政治学与行政学和国际政治的特点进行介绍,为2014级即将选专业的同学们详细分析国际政治的学习方向。编辑部宣传组成员丁敏潇就双辅修问题与同学们进行探讨,分析双辅修的利弊并告诫2014级的同学们要审慎选择。宣传组组长江昊宇、联络组组长李天翼和后勤组组长宁鹏举分别与同学们分享大二、大三国际政治所学课程,详细介绍了授课老师的讲课习惯、课程要求以及考核方式,让即将正式进行国际政治专业学习的同学对学习课程有更深刻、明确的了解,所有编辑部成员就2014级的同学们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和详细的回答。会议最终,《新视界》主编胡阳阳希望更多热爱国际政治的同学加入到系刊编辑部,与其他国际政治专业的同学进行更深入的交流。

《新视界》编辑部经验交流会最终圆满完成,《新视界》编辑部也将会适时、适量的举办更多经验交流会,为更多同学提供便利,解答疑惑。希望2014级政治系的同学们能够进入自己喜欢的专业,并在专业学习中取得优异成绩。

♣ 校外短讯 ♣

清华大学

●2015年5月14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大使论坛”第十五场主题活动在伟清楼举行。以色列驻华大使Matan Vilnai先生就“China, Israel and the Changing Middle East: Perspective from the Israeli Ambassador”发表主题演讲。

复旦大学

●2015年6月28至29日,由新近成立的复旦-杜克全球社会政治态度研究中心组织的“全球民意调查研究高峰论坛”(Forum on Global Barometer Surveys; 2015 GBS Forum)在复旦大学成功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球风向标调查负责人和上海的相关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了该论坛,并运用全球民意调查

数据发表了研究成果,围绕中国崛起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交流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

●2015年7月5日,“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15: 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暨南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美国康奈尔大学、美国路易维尔大学以及中央外办、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外二十多家单位的四十余位权威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在主题讨论中,与会学者围绕“一带一路”的内涵、外交运筹、安全风险与保障以及“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理论创新等

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外交学院

●2015年6月15日,伊拉克外交部长易卜拉欣·贾法里(H. E. Dr. Ibrahim Al-Jaafari)率团到访外交学院沙河新校区,并发表题为“中伊关系、伊拉克及中东地区形势”的演讲。

北京大学

●2015年6月12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与全球治理论坛”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群英厅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机遇与挑战”。前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大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财政部亚太中心周强武副主任担任主讲嘉宾。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2015年7月14日至15日,“2015年欧盟法治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欧洲研究所主办,欧盟法研究室和《欧洲研究》编辑部承办。本次研讨会以“欧盟法治”为主

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对外经贸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山东大学、山东政法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浙江农林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理工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英吉利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和北京瑞银律师事务所的20余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2015年5月15日,法国高等国防研究院(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代表团到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并联合举办了《中法安全论坛:国际危机管控的经验》双边研讨会。中法学者先后围绕“一带一路和能源安全”,“海上危机管理和东亚局势”和“乌克兰危机及国际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由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鸣研究员和法国高等国防研究院院长De Courrèges四星上将共同主持。

[整理:丁敏潇、江昊宇、张璐瑜]

[责任编辑:丁敏潇]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科研简报

(2015年7月——2015年8月)

(文章按照第一作者姓名拼音顺序排列,相同作者按照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同一作者发表多篇文章时,只做一次介绍。)

1. 白达宁、迟永:《当前中意关系及其未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摘要: <正>意大利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国家,目前拥有6200万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被战争严重摧毁,但战后努力恢复了一些战前就较为发达的重要产业,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目前,意大利在世界经济中排名第九,是欧洲第二大工业和农业强国。2014年意大利贸易顺差已经达到430亿欧元,在欧盟国家的预算结余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德国。意大利当前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经低于3%,这两个数字的比例关系是衡量一国经济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欧盟总体经济环境的一种衡量,但我们仍需更加深入地理解其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关键词: 中意关系; 预算结余; 名第; 世界经济; 比例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 贸易顺差; 数字的; 中欧关系; 农业强国

作者简介: 白达宁(Alberto Bradanini),男,意大利共和国驻华大使。迟永,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4级博士研究生。

2. 迟永:《战略再保证是中美关系的稳定机制?——评<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

摘要: 随着中国实力的日渐增长,有关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学术研究逐渐活跃,美国学者詹姆斯·斯坦伯格和迈克尔·欧汉伦所著的《战略再保证与决心:21世纪的美中关系》就是这个领域一项较新且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书中阐述了“战略再保证”的概念与构成要素,在对中美两国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其原因与两国安全战略的决定因素进行描述后,两位作者又根据中美关系中的重要安全议题,详细阐释了实施战略再保证的政策建议。该书无疑深化了中美关系的研究,其重要意义在于试图破解大国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也为中美两国对外决策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同时,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突出了对个人层次的分析,这也符合学科发展的新趋势。然而,本文仍存在需要继续深化与改进的空间,如“克制”和“灵活”同“决心”存在矛盾关系,相对忽略了中美两国经济摩擦因素的影响,轻视国家意图的作用以及对中国一些国情的不了解。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战略再保证; 决心; 个人层次分析

3. 刘丰、董柞壮:《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摘要: 联盟政治与军事冲突的关系是国际安全领域的经典议题,既有研究聚焦于国际体系、国内政治、联盟双边关系等因素如何影响联盟介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产生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由于联盟会形成由成员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塑造着网络内外的国家之间互动的模式,特定的网络结构也会对联盟成员介入军事冲突的能力和意愿产生影响。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看,联盟网络的结构特征主要由中心势、结构洞数量(网络密度)和联盟内部子群数量决定。利用已有的联盟数据和军事冲突数据,作者系统检验了联盟网络特征与军事冲突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网络中心势与体系中的军事冲突数量呈负相关关系,而子群数量、网络密度与军事冲突的数量呈正相关关系。社会网络分析拓展了联盟政治与军事冲突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为系统探讨联盟政治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工具,可以与统计分析、案例研究和形式模型等研究方法的成果互为补充。

关键词: 联盟; 军事冲突; 社会网络分析; 国际安全

作者简介: 刘丰,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董柞壮,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2015级博士研究生。

4. 吴志成:《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深刻影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摘要: <正>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教授发表的《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秩序的影响》(《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一文认为,乌克兰危机的不断加剧不仅进一步激化了俄乌之间的既有矛盾,牵动着国际社会特别是整个欧洲大陆的紧张神经,美欧与俄罗斯的博弈较量也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国际社会积极寻求危机解决方案,俄乌两国也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但在当前形势下依然很难明确判断危机发展的前景。

关键词: 国际社会; 最终结局; 能源供应; 冷战思维; 军事冲突

作者简介: 吴志成,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5. 吴志成:《中国周边外交更加重视战略谋划》,《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摘要: <正>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吴志成教授发表的《中国周边外交需更加重视战略谋划》(《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1期)一文认为,周邻稳则国家安,周边安全在国家整体安全和外交全局中的作用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遵循“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总体布局,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战略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冷战大格局的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国对周边某些国家的外交政策曾具有一定的对抗色彩,甚至还与一些周边国家爆发过

军事冲突。

关键词：战略谋划；中国外交战略；吴志成；政府管理学院；现代国际关系；总体布局；中国综合国力；周边关系；命运共同体；伙伴关系

6. 杨雷：《“一带一路”凸显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3日。

摘要：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首次对外公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提出了建设性倡议和全面规划。这一愿景是中国所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实现步骤，它追求在国家间建立更为广泛的合作共赢关系，并与当前国际关系中仍然盛行的丛林法则形成鲜明对照。

作者简介：杨雷，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国际关系中文核心期刊最新电子论文篇目信息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

1. 王存刚：《论中国外交核心价值观》，第4-20+156页。
2. 袁胜育、汪伟民：《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的中亚政策》，第21-41+156-157页。
3. 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第42-57+157-158页。
4. 王玮：《权力变迁、责任协调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第58-78+158页。
5. 刘宏松、万天葳：《欧盟成员国外交政策欧洲化的因果机制》，第79-99+158-159页。
6. 叶成城：《重新审视地缘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视角》，第100-124+159-160页。
7. 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第125-155+160页。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6期

1. 赵汀阳：《以天下重新定义政治概念：问题、条件和方法》，第4-22+156页。
2. 李少军：《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第23-38+156-157页。
3. 庞珣、权家运：《回归权力的关系语境——国家社会性权力的网络分析与测量》，第26-64+157-158页。
4. 刘丰、董柞壮：《联盟网络与军事冲突：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考察》，第65-80+158页。
5. 杨辰博：《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社会网络分析》，第81-101+158-159页。
6. 陈小鼎、王亚琪：《战后欧洲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第102-122+159-160页。
7. 刘永涛：《身份政治驱使下的美国对外政策——以美国空袭叙利亚境内目标为例》，第123-137+160页。

8. 黄河:《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一带一路”》,第138-155+160页。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7期

1. 徐晏卓、薛力:《第五届亚洲研究论坛暨“‘一带一路’与亚洲共赢”会议简讯》,第2页。
2. 李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第4-23+155页。
3. 郑宇:《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办公室”——中印制度与经济发展模式比较》,第24-39+155-156页。
4. 孙德刚:《大国海外军事基地部署的条件分析》,第40-67+156-157页。
5. 凌胜利:《楔子战略与联盟预阻》,第68-89+157-158页。
6. 李开盛:《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第90-106+158页。
7. 刘建伟:《国家“归来”:自治失灵、安全化与互联网治理》,第107-125+159页。
8. 马德懿:《海洋航行自由的体系化解析》,第126-150+159-160页。
9. 时殷弘:《“一带一路”:祈愿审慎》,第126-150+159-160页。

《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

1. 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第4-37+156-157页。
2. 史田一:《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第38-60+157-158页。
3. 凌胜利:《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第61-81+158页。
4. 孔繁颖;李巍:《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第82-110+159页。
5. 王铁军:《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视角》,第111-129+159-160页。
6. 赵炜:《俄罗斯的边缘化身份及其对外交的影响》,第130-155+160页。

《国际观察》2015年第3期

1. 徐能武:《外层空间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实践建构与持续进化——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第1-16页。
2. 何奇松:《乌克兰危机下的美俄太空关系及其影响分析》,第17-30页。
3. 吴苑思:《试论联合国在外层空间治理中的角色》,第31-42页。
4. 张茗:《亚洲太空力量的崛起:现实与趋势》,第43-54页。
5. 仇华飞、方雅静:《中国周边外交的软实力战略》,第55-69页。
6. 吴瑛、张结海:《中国智库传播中国声音——基于国际媒体引用视角的评估》,第70-82页。
7. 郑先武、李峰:《国际社会与国家安全——传统英国学派安全思想探析》,第83-94页。
8. 陈宗权、谢红:《社会认同论与国家形象主体性生成理论的可能——兼论国家形象研究

范式及未来的研究纲领》，第 95-108 页。

9. 马丽蓉：《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安全环境中“疆独”问题影响评估》，第 109-120 页。

10. 岳汉景：《理论探析美国在叙利亚冲突中的利益》，第 121-131 页。

11. 熊李力、刘丹阳：《TTP 机制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兼容性分析》，第 132-145 页。

12. 张小峰、沈虹：《南非金融发展新动态与中南金融合作》，第 146-157 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1. 尹继武：《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第 1-25 页。

2. 唐晓阳、熊星翰：《中国海外投资与投资监管：以中国对非投资为例》，第 26-45 页。

3. 竺彩华、冯兴艳：《世界经济体系演进与巨型 FTA 谈判》，第 46-71 页。

4. 孙伊然：《隐含的利益交换：国际发展兴衰的逻辑》，第 72-103 页。

5. 尉秋实、张清敏：《国内权力结构变迁与对外关系的逻辑——兼及军队在对外决策中的作用》，第 104-127 页。

6. 方长平、宋宝雯：《共有观念、不对等关注与国际冲突的起源》，第 128-141 页。

7. 熊志勇、谷红玉：《试析美国问鼎世界时的实力》，第 142-156 页。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1. 王存刚、赵阳：《大数据与中国外交决策机制创新——基于组织决策理论的视角》，第 1-18 页。

2. 顾炜：《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第 19-44 页。

3. 吴琳：《南海危机与地区视野下的预防性外交——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第 45-60 页。

4. 蒋华杰：《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问题》，第 61-81 页。

5. 陈玉聃：《国际政治的文学透视：以莎士比亚〈亨利五世〉为例》，第 82-106 页。

6. 杨悦：《奥巴马政府对朝“战略忍耐”政策探析》，第 137-156 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3期

1. 傅梦孜、楼春豪：《关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若干思考》，第 1-8+63 页。

2. 韩献栋：《美国“亚太再平衡”背景下韩国的外交安全战略》，第 9-15+63 页。

3. 金灿荣、王博：《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军事关系》，第 16-23+63-64 页。

4. 陈新明、李源正：《驻阿美军撤离与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挑战及应对》，第 24-31 页。

5. 陈积敏：《2015 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平息》，第 32-38 页。

6. 唐彦林、张磊：《日本政局与中日关系走向》，第 39-45+64 页。

7. 刘凌旗、刘海潮：《日本 TPP 决策动因及日美谈判现状评估》，第 46-55 页。

8. 钮钦、钟新:《对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第56-62+31+64页。

《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

1. 周亚敏:《美国强化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环境条款及其影响》,第1-7+61页。
2. 刘畅:《试论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第8-13+61页。
3. 李智育:《从“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视角看土耳其“居兰运动”的发展》,第14-20页。
4. 唐小松:《加拿大反恐战略评析》,第21-27+50页。
5. 刘卫东:《“可控性解禁”:美国在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政策评析》,第28-35+60-62页。
6. 魏志江、庞加欣、郑昀:《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第36-43页。
7. 李艳:《当前国际互联网治理改革新动向探析》,第44-50+62页。
8. 王朔:《欧元区当前的经济困境及未来趋势》,第51-57+62页。
9. 周鑫宇:《第五届“公共外交北京论坛”会议综述》,第58-60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

1. 王毅:《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第1-6+126页。
2. 朱锋:《岛礁建设会改变南海局势现状吗?》,第7-20+126-127页。
3. 杨希雨:《中美关系中的朝核问题》,第21-35+127页。
4. 胡令远、高兰:《“积极和平主义”:日美同盟的福音?》,第36-50页。
5. 蓝建学:《新时期印度外交与中印关系》,第51-63页。
6. 邢骅:《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北约改革》,第64-74+127页。
7. 张磊:《欧盟政治体系中的议会间合作机制:发展与影响》,第75-87页。
8. 刘新生:《国际关系史上的不朽丰碑——纪念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第88-97页。
9. 邢丽菊:《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第98-110页。
10. 凌胜利:《太空治理与中国的参与战略》,第111-125页。

《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

1. 苏格:《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外交战略》,第1-13+131页。
2. 蔡鹏鸿:《中国—东盟海洋合作:进程、动因和前景》,第14-25+131页。
3. 鞠海龙、邵先成:《中国—东盟减贫合作:特点及深化路径》,第26-39页。
4. 刘宗义:《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和构建思路》,第40-53页。
5. 韦宗友:《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第54-67+132页。
6. 甄炳禧、李晓玉:《未来五年外部经济环境与中国对外开放新思路》,第68-81+132页。
7. 余翔:《美国经济增长新特征与前景》,第82-95页。

8. 甘均先:《“一带一路”:龙象独行抑或共舞?》,第96-113+132页。
9. 刘青建、方锦程:《恐怖主义的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第114-126页。
10. 路静:《“金砖国家组织机制化与澳门平台角色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第127-130页。

《美国研究》2015年第2期

1. 沈鹏、周琪:《美国对以色列和埃及的援助:动因、现状与比较》,第9-31+5页。
2. 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第32-51+5-6页。
3. 高奇琦:《美国的云计算战略及其对军事和国际关系的影响》,第52-67+6页。
4. 刘建华:《美国国家安全体制改革:历程、动力与特征》,第68-92+6-7页。
5. 仇朝兵:《美国与印度尼西亚“全面伙伴关系”评析》,第93-111+7页。
6. 陈宪奎、刘玉书:《付费墙:〈纽约时报〉的数字化转型与美国报业的发展》,第112-131+7页。
7. 曹峰、吴进进、邵东珂:《美国农业福利政策的演变(1862~2000)》,第132-149+8页。
8. 王立新:《中美关系史的新叙事——评徐国琦著〈中国人和美国人:一部共享的历史〉》,第150-157页。
9. 何维保:《“乌克兰危机与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研讨会综述》,第158-160页。

《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2期

1. 张清敏:《专题研究:全球卫生问题与卫生外交》,第9-10页。
2. 张清敏:《外交转型与全球卫生外交》,第11-32+5页。
3. 徐彤武:《埃博拉战争:危机、挑战与启示》,第33-60+5-6页。
4. 刘培龙、王昱:《中国对外卫生援助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演变》,第61-72+6页。
5. 曲鹏飞:《非洲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成因探析》,第73-83+6-7页。
6. 赵晨、赵纪周:《美欧防务“再平衡”评析》,第82-100+7页。
7. 员欣依:《从“安全困境”走向安全与生存——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阐释》,第101-117+7-8页。
8. 特约记者:《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李英桃教授访谈》,第118-134页。
9. 孔寒冰、张卓:《我亲历的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中国前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范乘祚先生访谈实录》,第135-146页。
10. 古莉亚:《中东欧国家的欧洲化研究述评》,第147-160页。

《欧洲研究》2015年第2期

1. 王展鹏:《“规范”和“市场”之间: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力量研究》,第1-15+165

页。

2. 赵柯:《欧盟亚太政策转向“新接触主义”?——理解欧盟国家加入亚投行的行为逻辑》,第16-28+5-6页。
3. 金玲:《中东欧国家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欧盟因素分析》,第29-41+6页。
4. 陈新:《欧元区重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析论》,第42-59+6页。
5. 李罡:《论英国的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对撒切尔结构性改革及其影响的再解读》,第60-80+6-7页。
6. 胡琨:《金融与货币一体化背景下欧洲中央银行的转型与创新》,第81-95+7页。
7. 孙彦红:《意大利公共债务问题评析》,第96-112+7页。
8. 陈淑梅、卞海丽:《中国—欧盟自由贸易区经济效应的国别比较——基于GTAP的模拟评估》,第113-129+7-8页。
9. 董青岭:《大数据外交:一场即将到来的外交革命?》,第130-144+8页。
10. 莫伟:《“2014中欧文化高峰论坛:迈向2015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综述》,第145-150页。
11. 陈楠、陈贵和:《“欧洲文化战略与中欧政治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51-154页。

《欧洲研究》2015年第3期

1. 郑春荣:《德国在中欧关系中的角色》,第1-14+165页。
2. 程卫东:《欧盟能源供应安全的国际战略及其困境》,第15-26+5页。
3. 任琳、程然然:《欧盟东南亚政策论析》,第27-42+5-6页。
4. 宋黎磊、任桑:《从科层制治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移——基于欧盟东部周边治理的分析》,第43-59+6页。
5. 周秋君:《欧盟网络安全战略分析》,第60-78+6-7页。
6. 柳丰华:《俄罗斯对乌克兰政策视角下的乌克兰危机》,第79-90+7页。
7. 夏路:《欧洲治理结构与德国和平统一》,第91-112+7页。
8. 岳鹏:《苏格兰独立公投视角下的民族主义结构矛盾》,第113-129+8页。
9. 于文杰、陆一歌:《〈大宪章〉与英国文明的研究方向——与英国历史学家对话》,第130-138+8页。
10. 刘作奎、鞠维伟:《“国际格局变化背景下的中欧和中东欧国家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39-144页。
11. 黄洋:《“英国大选及其影响”学术研讨会综述》,第145-152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

1. 达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化与操作化》,第1-24页。
2. 李巍、张哲馨:《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第25-53页。

3. 齐皓: 《中国学界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与分歧》, 第 54-77 页。
4. 刁大明: 《美国学界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 第 78-99 页。
5. 迟永: 《战略再保证是中美关系的稳定机制?》, 第 100-116 页。

《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2期

1. 杨迪、漆海霞: 《外国干涉族群冲突的研究综述》, 第 1-30 页。
2. 李东云、曹倩、田野: 《国际贸易对泰国政治参与的影响》, 第 31-65 页。
3. 李志斐: 《中国跨国界河流问题影响因素分析》, 第 66-92 页。
4. 外交改革课题组: 《拓展地方交流, 促进中美大国关系》, 第 93-117 页。
5. 唐健: 《系统、时间与社会进化》, 第 118-151 页。

国际关系英文核心期刊最新论文篇目信息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2

1. Jacob N. Shapiro, Nils B. Weidmann, "Is the Phone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Cellphones and Insurgent Violence in Iraq," pp. 247-274.
2. Stephen Chaudoin, Helen V. Milner, Xun Pang, "International Systems and Domestic Politics: Linking Complex Interactions with Empirical Model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p. 275-309.
3. Max Abrahms, Philip B.K. Potter, "Explaining Terrorism: Leadership Deficits and Militant Group Tactics," pp. 311-342.
4. Abel Escribà-Folch, Joseph Wright, "Human Rights Prosecutions and Autocratic Survival," pp. 343-373.
5. Michael M. Bechtel, Thomas Sattler, "What Is Litigation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orth?" pp. 375-403.
6. Wade M. Cole, "Mind the Gap: State Capacit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pp. 405-441.
7. Martin C. Steinwand, "Compete or Coordinate? Aid Fragmentation and Lead Donorship," pp. 443-472.
8. Alex Weisiger, Keren Yarhi-Milo,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73-495.
9. Sharanbir Grewal and Erik Voeten, "Are New Democracies Better Human Rights Compliers?" pp. 497-518.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9, No. 3

1. Virginia Page Fortna, "Do Terrorists Win? Rebels' Use of Terrorism and Civil War Outcomes," pp. 519-556.
2. Patrick J McDonald, "Great Powers, Hierarchy, and Endogenous Regimes: Rethinking the Domestic Causes of Peace," pp. 557-588.
3. Robert Powell, "Nuclear Brinkmanship, Limited War, and Military Power," pp. 589-626.
4. Sarah Blodgett Bermeo, David Leblang, "Migration and Foreign Aid," pp. 627-657.
5. Jonathan Renshon, "Losing Face and Sinking Cost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the Judgment of Political and Military Leaders," pp. 659-695.
6. Eric Grynviski, Amy Hsieh, "Hierarchy and Judicial Institutions: Arbitration and Ideology in the Hellenistic World," pp. 697-729.
7. Ryan D. Griffiths, "Between Dissolution and Blood: How Administrative Lines and Categories Shape Secessionist Outcomes," pp. 731-751.
8. Rose McDermott, "Sex and Death: Gender Differences in Aggression and Motivations for Violence," pp.753-775.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9, No. 3

1. Kyla Jo Mcentire, Michele Leiby, Matthew Krain,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as Agents of Change: An Experimental Examination of Framing and Micromobilization," pp. 407-426.
2. Alexandra Avdeenko, Michael J. Gilligan,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s to Build Social Capital: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Sudan," pp. 427-449.
3. James D. Fearon, Macartan Humphreys, Jeremy M. Weinstein, "How Doe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Affect Collective Action Capacity? Results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Post-Conflict Liberia," pp. 450-469.
4. Arun Agrawal, Ashwini Chhatre, Elisabeth R. Gerber, "Motivational Crowding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pp. 470-487.
5. Jakana L. Thomas, Kanisha D. Bon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Violent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pp. 488-506.
6. Simon F. Haeder, Susan Webb Yackee, "Influence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ss: Lobbying the U.S. President's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pp. 507-522.
7. Aaron L. Herold, "Tocqueville on Religion,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Democratic Soul," pp. 523-534.
8. Valerie M. Hudson, Donna Lee Bowen, Perpetua Lynne Nielsen, "Clan

Governance and State Stabil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Subordination and Political Order,” pp. 535-555.

9. Rachel M. Stein, “War and Revenge: Explaining Conflict Initiation by Democracies,” pp. 556-573.

10. John Gerring, Maxwell Palmer, Jan Teorell, Dominic Zarecki, “Demography and Democracy: A Global, District-level Analysis of Electoral Contestation,” pp. 574-591.

11. Todd A. Eisenstadt, A. Carl leVAN, Tofiqh Maboudi, “When Talk Trumps Text: The Democratizing Effects of Deliberation during Constitution-Making, 1974-2011,” pp. 592-612.

12. Haifeng Hua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and Domestic Evalu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ety: The case of China,” pp. 613-634.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1, No. 2

1. Kai Jonas Koddenbrock, “Strategies of critiqu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al Relations: From Foucault and Latour towards Marx,” pp. 243-266.

2. Markus Kornprobst, “Building agreements upon agreement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grand strategy,” pp. 267-292.

3. Phillip M. Ayoub, “Contested norms in new-adopter states: International determinants of LGBT rights legislation,” pp. 293-322.

4. Volha Charnysh, Paulette Lloyd, Beth A. Simmons, “Frames and consensus form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trafficking in persons,” pp. 323-351.

5. Szymon M. Stojek; Jaroslav Tir, “The supply side of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Trade ties and United Nations-led deployments to civil war states,” pp. 352-376.

6. Stephanie C. Hofmann; Andrew I. Yeo, “Business as usual: The role of norms in alliance management,” pp. 377-401.

7. Jessica Schmidt, “Intuitively neoliberal? Towards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pp. 402-426.

8. Einar Wigen, “Two-level language gam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lingual relations,” pp. 427-450.

9. A. Burcu Bayram, “What drives modern Diogenes? Individual values and cosmopolitan allegiance,” pp. 451-479.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0, No. 1

1. Francis J. Gavin, "Strategies of Inhibition: U.S. Grand Strategy, the Nuclear Revolution, and Nonproliferation," pp. 9-46.
2. Or Rabinowitz, Nicholas L. Miller, "Keeping the Bombs in the Basement: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oward Israel, South Africa, and Pakistan," pp. 47-86.
3. Mark S. Bell, "Beyond Emboldenment: How Acquiring Nuclear Weapons Can Change Foreign Policy," pp. 87-119.
4. Max Paul Friedman, Tom Long, "Soft Balancing in the Americas: Latin American Opposition to U.S. Intervention, 1898-1936," pp. 120-156.
5. Ron E. Hassner, Jason Wittenberg, "Barriers to Entry: Who Builds Fortified Boundaries and Why?" pp. 157-190.
6. Joel Brenner, Jon R. Lindsay, "Correspondence: Debating the Chinese Cyber Threat," pp. 191-195.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9, No. 2

1. Richard A. Nielsen and Beth A. Simmons, "Rewards for Ratification: Payoffs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Regime?" pp. 197-208.
2. Pierre-Hugues Verdier; Erik Voeten, "How do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Change? The Case of State Immunity," pp. 209-222.
3. Christopher S.P. Magee; John A. Doces, "Reconsidering Regime Type and Growth: Lies, Dictatorships, and Statistics," pp. 223-237.
4. Martin Binder; Monika Heupel, "The Legitimacy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Evidence from Recent General Assembly Debates," pp. 238-250.
5. Daniela Donno, Shawana K. Metzger; Bruce Russett, "Screening out Risk: IGOs, Member State Select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1951-2000," pp.251-263.
6. Xun Cao; Hugh Ward, "Winning Coalition Size, State Capacity and Time Horizons: An Application of Modified Selectorate Theory to Environment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pp. 264-279.
7. Michaela Mattes, Brett Ashley Leeds; Royce Carroll, "Leadership Turnover and Foreign Policy Change: Societal Interests,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Voting in the United Nations," pp. 280-290.
8. Andrey Tomashevskiy; Daniel Yuichi Kono, "Extra Credit: Preferential Trade Arrangements and Credit Rating," pp. 291-302.
9. Edward D. Mansfield; Diana C. Mutz; Laura R. Silver, "Men, Women, Trade, and Free Markets," pp. 303-315.
10. Adam Dean, "The Gilded Wage: Profit-Sharing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p. 316-329.

11. Moonhawk Kim, Amy H. Liu, Kim-Lee Tuxhorn, David Leblang, “Lingua Mercatoria: Languag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p. 330-343.

12. Chungshik Mo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Commitment Institutions, and Time Horizon: How Some Autocrats Do Better than Others,” pp. 344-356.

13. Melanie M. Hughes, Mona Lena Krook; Pamela Paxton,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and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Gender Quotas,” pp. 357-372.

14. Rebekah K. Tromble, Miriam Wouters, “Are We Talking With or Past One Another? Examining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Discourse across Western-Muslim ‘Divides’,” pp. 373-386.

15. Michaël Tatham, “Regional Voic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Subnational Influence in Multilevel Politics,” pp. 387-400.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5

1. Corinna Jentsch, Stathis N. Kalyvas, and Livia Isabella Schubiger, “Militias in Civil Wars,” pp. 755-769.

2. Paul Staniland, “Militias, Ideology, and the State,” pp. 770-793.

3. Ben Oppenheim, Abbey Steele, Juan F. Vargas, and Michael Weintraub, “True Believers, Deserters, and Traitors: Who Leaves Insurgent Groups and Why,” pp. 794-823.

4. Jonathan Filip Forney, “Who Can We Trust with a Gun?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Adverse Selection in Militia Recruitment,” pp. 824-849.

5. Sabine C. Carey, Michael P. Colaresi, and Neil J. Mitchell, “Governments, Informal Links to Militias, and Accountability,” pp. 850-876.

6. Dara Kay Cohen and Ragnhild Nordas, “Do States Delegate Shameful Violence to Militias? Patterns of Sexual Violence in Recent Armed Conflicts,” pp. 877-898.

7. Jessica A. Stanton, “Regulating Militias: Governments, Militias, and Civilian Targeting in Civil War,” pp. 899-923.

8. Kristine Eck, “Repression by Proxy: How Military Purges and Insurgency Impact the Delegation of Coercion,” pp. 924-946.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9, No. 6

1. Andrew Cheon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Escaping Oil’s Stranglehold When Do States Invest in Energy Security?” pp. 953-983.

2. Havard Hegre and Havard Mogleiv Nygard, “Governance and Conflict Relapse,”

pp. 984-1016.

3. HeeMin Kim, Jenifer Whitten-Woodring, and Patrick James, "The Role of Media in the Repression-Protest Nexus: A Game-theoretic Model," pp. 1017-1042.
4. Joseph M. Brown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Picking Treaties, Picking Winners: International Treaty Negotiations and the Strategic Mobilization of Domestic Interests," pp. 1043-1073.
5. Patrick Bayer, Christopher Marcoux, and Johannes Urpelainen, "Whe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argain: Evidence from the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pp. 1074-1100.
6. Sebastian Schutte, "Geography, Outcome, and Casualties: A Unified Model of Insurgency," pp. 1101-1128.
7. Nils B. Weidmann, "On the Accuracy of Media-based Conflict Event Data," pp. 1129-1149.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22, No. 3

1. David Howarth, Lucia Quagli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 area's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f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p. 457-484.
2. Lucia Quaglia, Sebastian Royo, "Bank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in Italy and Spain," pp. 485-507.
3. Deborah Mabbett, Waltraud Schelkle, "What difference does Euro membership make to stabi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 revisited," pp. 508-534.
4. Juliet Johnson, Andrew Barnes, "Financial nationalism and its international enablers: The Hungarian experience," pp. 535-569.
5. Dermot Hodson, "The IMF as a de facto institution of the EU: A multiple supervisor approach," pp. 570-598.
6. Daniela Schwarzer, "Building the euro area's debt crisis management capacity with the IMF," pp. 599-625.
7. Michele Chang, Patrick Leblond, "All in: Market expectations of eurozone integrity in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pp. 626-655.

Security Studies, Vol. 24, No. 2

1. James Mahoney, "Process Tracing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pp. 200-218.
2. Nina Tannenwald, "Process Tracing and Security Studies," pp. 210-227.

3. Andrew Bennett, "Using Process Tracing to Improve Policy Making: The (Negative) Case of the 2003 Intervention in Iraq," pp. 228-238.
4. David Waldner, "Process Tracing and Qualitative Causal Inference," pp. 239-250.
5. Stefano Recchia, "Soldiers, Civilians, and Multilateral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pp. 251-283.
6. Daniel Altman, "The Strategist's Curse: A Theory of False Optimism as a Cause of War," pp. 284-315.
7. Erik Gartzke, Jon R. Lindsay, "Weaving Tangled Webs: Offense, Defense, and Deception in Cyberspace," pp. 316-348.
8. Alex Braithwaite, "Transnational Terrorism a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a Military Footprint," pp. 349-375.

World Politics, Vol. 67, No. 3

1. Thomas B. Pepinsky, "Trade Competition and American Decolonization," pp. 287-422.
2. Deniz Aksoy, David B. Carter and Joseph Wright, "Terrorism and the Fate of Dictators," pp. 423-468.
3. Christian Houle, "Ethnic Inequality and the Dismantling of Democracy: A Global Analysis," pp. 469-505.
4. Prerna Singh, "Subnatio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ndian States," pp. 506-562.
5. Thandika Mkandawire, "Neopatrimonialism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Africa: Critical Reflections," pp. 563-612.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3

1. James Brassett, Lena Rethel, "Sexy money: the hetero-normative politics of global finance," pp. 429-449.
2. Lisa Maria Dellmuth, Jonas Tallberg, "The social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s: Interest representation,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and confidence extrapolation in the United Nations," pp. 451-475.
3. Luke Cooper,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imagined community': Explaining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genesis of the Chinese nation," pp. 477-501.
4. Shiera S. el-Malik, "Why Orientalism still matters: Reading 'casual forgetting' and 'active remembering' as neoliberal forms of contest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503-525.

5. David Hughes, "Unmaking an exception: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US exceptionalism," pp. 527-551.
6. Jason Ralph, Adrian Gallagher, "Legitimacy faultline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prosecute after Libya," pp. 553-573.
7. Gregorio Bettiza, "Constructing civilisations: Embedding and reproducing the 'Muslim world'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s since 9/11," pp. 575-600.
8. Kilian Spandler, "The politic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ange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institutions," pp. 601-622.
9. Tom Bentley, "The sorrow of empire: Rituals of legitimation and 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s of liberalism," pp.623-645.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8, No. 3

1. Peter Harris, "Editor's Choice: The Imminent US Strategic Adjustment to China," pp. 219-250.
2. Xu Jin, Du Zheyuan, "The Dominant Thinking Sets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A Criticism," pp. 251-279.
3. Cameron G. Thies, "China's Rise and the Socialisation of Rising Powers," pp. 281-300.
4. Yongjin Zhang, "China and the Struggle for Legitimacy of a Rising Power," pp. 301-322.

[整理: 彭宁楠、周 扬、宁鹏举]

[责任编辑: 宁鹏举]

读编往来

【编者按】国关系刊《新视界》自创刊以来，一直致力于开拓国关人的视野，展现国关人的风采。在往期的读编往来栏目中，小编收到了许多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祝福与建议。在本期的读编往来中，小编也会选取几封热心读者的来信，与大家一起分享对于阅读的心得和对于系刊的建议。

读者言论

▽——▽▽——▽▽——▽▽——▽▽——▽▽——▽▽——▽▽——▽▽——▽▽——

▽

乔徽青（南开大学 2014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在 2015 年夏季号的《新视界》中，《“后危机”时代的欧盟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前景》给我带来许多收获。这是一篇演讲稿，分别从债务危机定义与欧债危机、后危机时代与日本化、未来欧盟经济形势以及希腊是否会退出欧元区四个方面非常完整的阐述、介绍、解释了论题。读过之后，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的转折点、欧洲经济呈现出增长乏力、债务负担沉重、通货紧缩等日本化特征认识更加深刻。虽然身体没有参与该次讲座，却能更清晰地理解问题。希望这样的栏目可以延续下去。

张释元（南开大学 2014 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生）：由于在大一的一年我们属于政治学大类，因此对于国际政治和政治学与行政学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学习。看到了国际政治专业的系刊《新视界》的时候，我从里面了解到更多与国际政治有关的知识，开阔了思考国际问题时的视野。拿 2013 年的秋季号来说，其中的学术论文栏目的文章《联盟类型、机制设置与联盟可靠性》恰好与大一上学期的国际关系概论的课程有相互衔接的内容，让我对于联盟的形成、管理、维持和瓦解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成本与收

益的核算、成本与收益的分配和降低成本的努力有了更多的了解，掌握了许多与课本相延伸的内容。衷心希望《新视界》能够越来越好，继续给对国际政治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一个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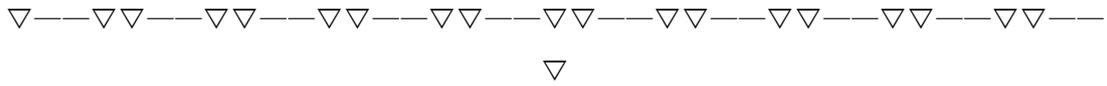
徐秀雪（南开大学 2013 级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新视界》作为国关系的系刊，一直是同学们的良师益友。其中，我个人最喜欢“时事观察”、“科研简报”和“新书架”这几个栏目。在国际关系的学习中，时刻保持对国际动态的敏感性、关注国际新闻时事并结合专业理论进行分析思考有助于我们对相关知识的进一步消化和吸收，逐步培养运用国关视角分析时事的专业素养。

“时事观察”栏目就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种平台——每一期都针对当前热点问题给予了深刻、精辟而全面的分析，让读者们受益匪浅。“科研简报”和“新书架”则分别通过最新专业期刊论文汇总和主题书目推荐大大丰富了同学们的课外读物选择，尤其是核心期刊论文篇目信息非常有助于同学们了解学术前沿动态，提高专业素养。

非常期待《新视界》能够在博客、人人之后继续推出微信公众平台，相信会更加方便同学们的阅读，吸引更多的读者。最后，

感谢国关学习中有《新视界》的陪伴，感谢 编者们的用心良苦，祝贵刊越办越好！

小编总结



十分感谢几位同学的来信，你们的支持 与建议传递给我们，也分享给更多的人。在
和关注正是《新视界》不断发展的动力。小 未来的路上，希望《新视界》能够一直陪伴
编希望能够在系刊上更多地看到大家的文 你们。
字，将你们对于系刊、对于国际关系的思考

《新视界》信箱：

把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改善栏目的建议，以及希望得到我们解答的疑惑，
发给我们吧！来信请发：newvision@mail.nankai.edu.cn。我们将尽可能迅速和详细地
回答你的提问。

[整理：杨至远、李 漩]

[责任编辑：李 漩]

南开大学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

一、总 则

1. 正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 每页依序重新编号。
2. 注释格式: 中文字体为宋体, 英文字体为 Times New Roman, 字号小五, 单倍行距。
3. 学位论文后必须列出“参考文献”, 课程论文一般不做要求。
4. 所引资料务必真实、准确、规范。

二、中文注释

(一) 著作

1. 专著: 著者, 文献名, 卷册序号, 出版地, 出版机构, 出版时间, 页码。若出版机构名称已包含地名, 不必重复注出。

秦亚青: 《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 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第 201 页。

2. 编著: 应在编者姓名后加“编”或“主编”、“编著”。

王逸舟主编: 《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60-68 页。

3. 译著: 在著者姓名前可以“[]”标明著者国别; 在文献名之后, 可标明译者。

[英]赫德利·布尔: 《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4. 如著者、编者为二人, 两者姓名之间以顿号间隔; 如为三人以上, 可省略为“×××(第一责任者姓名)等(编)”。

宇燕、盛洪: 《旧邦新命》, 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 第 146、158 页。

吴志成、薛晓源主编: 《欧洲研究前沿报告》,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陈志瑞等主编: 《开放的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英国学派》,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49 页。

(二) 文章

1. 文集论文: 著者, 文章题目(加书名号), 文集编者名称, 文集名, 出版地、出版单位及版次, 页码。

[美]威廉·沃尔福思: 《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 载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 《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9-117 页。

2. 期刊论文

张睿壮：《“人道干涉”神话与美国意识形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第109-117页。

3. 会议论文

任东来：《对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理解和翻译》，“全球化与亚太区域化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天津：南开大学，2000年6月15-17日，第3页。

4. 学位论文

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论文，1999年4月，第55页。

5. 报纸

刘丰：《联盟政治研究的进展与方向》，《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6月6日，第B03版。

（三）其他

如引用资料来自政府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例如：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页。

《中国与八国财长就全球经济发展等问题进行对话》，新华社莫斯科2006年2月12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研究室：《中国外交——2006年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560页。

三、外文注释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释出，可参照相应文献释出的通约惯例。

（一）著作

专著：著者，文献名（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著作者姓名以名前姓后的顺序书写。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8.

如为编著，则编者姓名后加“ed.”（编者为一入）或“eds.”（编者为二人以上）。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2003, Chapter 3.

如著作者为三人以上，第一责任者姓名之后可省略为“et al.”（意即 and others）。例如：

Judith L. Goldstein,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1, p. 160.

Walter Carlsnaes, et al.,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pp. 354-355.

（二）文章

1. 文集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文集编者，文集名称（斜体），出版地、出版机构及版次，页码。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1997, p. 169.

2. 期刊论文：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刊物名称（斜体），刊物出版卷次、期号及年份，页码。例如：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January 2009, pp. 188-213.

3. 报纸文章：作者、文章标题（加双引号）、报纸名称（斜体）及具体出版日期，如能注明版面更好。

Joseph S. Nye Jr., “Lessons in Imperialism,”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02.

4. 会议论文

David Shambaugh, “The 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U.S. Relations”, Beijing, China, November 3-4, 2005.

5. 学位论文

Ruizhuang Zhang,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Motives: National Interest vs. Ideolog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7, p. 9.

(三) 其他

如引用政府或国际组织出版物、通讯社消息、未刊手稿、缩微胶卷等,其注释也应尽量标明编辑者、文献名、出版地、出版机构和时间、页码,或者文献性质、收藏地点、收藏编号等。如无需或不便标明著作者/编辑者,则标明其他类项也可。

Daniel Landau, "The Economic Impact of Military Expenditur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138,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1993, p. 55.

四、重复引用和转引

(一) 重复引用

如重复引用同一文献,不论中外文,只需注明著作者、文献名和页码。

沃尔福思:《单极世界中的美国战略》,第101页。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113.

(二) 转引

1. 中文文献

先将转引文献按上述注释方式释出,以句号结束。再以“转引自”把载有转引文献的来源文献按相应方式释出。

[美]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与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转引自胡鞍钢:《中国崛起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2. 外文文献

Hans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 194. Quoted in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2001, p. 19.

五、互联网资料

使用互联网资料时,著作者、文献名称等类项同上述相应体例,同时注明详细网址和访问时间。有作者注明作者,没有则注明文题即可。

《中美联合声明》,新华网,2009年11月17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11/17/content_12475620.htm (最后访问时间:2009年12月)

10日)。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Global Trends 2025: A Transformed World,"
http://www.dni.gov/nic/PDF_2025/2025_Global_Trends_Final_Report.pdf (最后访问时间: 2009年
12月14日)。

六、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供制作学位论文的参考文献时参考。

(一) 中文部分

中文参考文献的书写体例同中文注释体例, 文献排序规则如下:

1. 中文作者按照姓氏拼音排列;
2. 译著按照作者中译名顺序排列。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期刊和文集集中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1.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3.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年版。
4.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5.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3 期, 第 165-176 页。
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一卷)》,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年版。

(二) 外文部分

这一部分的说明和举例以英文文献为准。其他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俄文等文献的, 可参照相应文献的通约惯例。书写体例如下:

1. 第一著作者姓名以姓前名后的顺序书写, 姓名以逗号间隔;

2. 以第一作者英文姓氏顺序排列, 首行缩进2字符;
3. 同一作者的多篇文献, 以专著、编著、论文为类依次排列, 同一类文献按出版时间升序排列;
4. 同一作者姓名多次出现以“——”代替;
5. 期刊和文集的论文须注明起始页码。

示例如下:

-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art II."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4): 323-353.
- .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4): 1151-1169.
-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2001.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1967.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 .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4-41.
- . 2002. "Intimations of Multipolarity." in Birthe Hansen and Bertel Heurlin eds. *The New World Order: Contrasting Theories*. London: Macmillan. pp. 1-18.

征稿启事

《新视界》(季刊)是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主管,国际关系系学生自筹自办、倡导学术性和生活性相结合的学生刊物。本刊秉承“知识性、交流性、原创性”原则,以“我的视界我做主”为理念,旨在为师生搭建交流的平台、营造学术的争鸣氛围,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助力。“立足于南开,但又不限于南开”,我们热忱欢迎校内外和国内外学人和同学惠赐佳作。

本刊主要有学人访谈/学术讲堂、学术论文、书山有路、国关人物、他山之石、新书架、英采飞扬等固定栏目。另外,根据学科发展及国际形势变化,本刊还适时增设论文工作坊、学界动态、聚焦、笔谈等浮动栏目。本刊欢迎学术性论文(包括书评),国内外国际关系学者访谈、学术历程介绍及轶事,新书评介及学术动态等方面的稿件。来稿正文字数在10000字以内为宜。

投稿须知:

1. 本刊来稿一律要求原创首发,文责自负,反对剽窃、抄袭等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由于本刊**内部发行,不影响**作者**转投**其他公开性学术刊物)。本刊将竭诚为作者进一步研究提供交流平台。
2. 来稿需为 Word 文档格式,注释采用脚注,格式参阅本刊附录《国际关系系论文注释体例》。投稿请作者把稿件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至本刊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并请提供 200 字以内作者基本信息(姓名,性别,教育背景,单位,职称,邮箱,电话,通信地址等)。
3. 首次涉及的外国人民、地名、机构名及其他专有名词,中译名请参照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并在中译名后括号内注明原文。
4. 所有学术性来稿采取双向匿名审稿制度,将在一个月内审读来稿并告知作者是否采用。对拟采用的稿件,编辑部将请作者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在出刊后向作者寄送该刊物两本。另外,本刊根据栏目需要有权对来稿酌情删改,如不同意请在来稿中注明。
5. 编辑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同砚路 38 号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新视界》编辑部(300350)

邮箱: newvision@mail.nankai.edu.cn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nkirnewvision>

主页: <http://nknewvision.yolasite.com/>

New Vision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国际关系系 主管
《新视界》编辑部 主办